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紅色中國的判徒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905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他的中國

劉紹唐

CENTRAL

955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5645
類號 630.4/7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空 圖書館
登 5645
類號 868/7220.1
576.25

作者的幾點說明

匆匆地寫完這本書，又匆匆地付印，自已覺得這僅能算是我在中共部隊中，生活體驗和觀感的一部份。有關遺陋部份而未及補充的，我願做以下的幾點說明：

（一）我雖未敢說，自已是十足的自由主義者，但從西南聯大到北京大學，作者確是一個受過多年自由主義教育的人。這本書，從某種程度來看，可以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極權統治機構的生活體驗。

（二）我由「新華社」到「四野總政治部」，一直生活在所謂高高在上的大機關裡，大機關是指「四野」最高的設計與領導機構，因而我所知道的，也僅是這個大機關及其幹部的輪廓。

（三）我的記述大部份限於極權統治者，用以對付大城市知識份子的一套辦法，但不等於對中小城市和農村，知識份子或非知識份子，所加控制的全部。

（四）我自信，這本書的報導，絕無任何誇大意味。我認爲唯有這樣，才更能有助於眞實地瞭解共產主義者的所做所爲。不然的話，任何過高或過低地估計敵人，都將會使自已的力量蒙受損害。

（五）以我所經歷的事實來劃分，這本書包括了以下的三個階段：學習階段，記者生活階段和幹部工作階段，我無須明顯地指出來讀者自可體會。

（六）因爲倉促出版，字句上遺陋、錯誤、以及因分段發表過而前後重複的地方，只有留待以後有再版機會，連同必須補充的內容，一併補足和修正。

最後，對於曾幫助我鼓勵我寫作，及關心這本書出版的先生和朋友們，作者謹致以最大的感激。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5645
類號 576.75/7220

576.75
8763
37

目次

不願丟棄的包袱……一
鐵幕以內的鐵幕……四
提供內容的自傳……八
千言萬語工、農、小、……十二
一個羣衆的悲哀……十六
光榮的忘願參軍……二〇
馬列主義第一課……二四
低級趣味新估價……二八
一個朋友的故事……三二
背叛革命的一羣……三六
與老幹部一夕談……四〇
關於學習的總結……四四
和談聲中上火線……四七

國家圖書館
002849055

走進鐵幕的中樞……五一
一些不愉快的回憶……五四
民主紀念地的傳奇……五八
人民記者處女作……六一
有冕的無冕皇帝……六五
被批判的與被表揚的……六八
中原地區印象記……七一
反對喀里空運動……七四
革命的男女關係……七七
被壓迫者的鬬爭……八二
未除政治武裝的敵人……八六
落後與進步的抉擇……八九
紀律的學習與實踐……九三
天堂中的鄙語……九七
人民經濟的風波……一〇〇

共患難不能共安樂……一（
革命實際種種……
罪惡與腐化的學習……一一〇
為人民流血是光榮的？……一一五
游擊習氣舉例……一二〇
被開刀的人……一二四
個別的腐化現象……一二九
小廣播之累……一三三
井岡山的騾子……一三八
人類悲劇的犧牲者……一四二
被謳歌的英雄事蹟……一四六
新社會的寵兒……一五〇
劃分階級的煩惱……一五四
未完成的終身大事……一五七
俄羅斯的月亮……一六一
講怪話的戰士們……一六五

一對戀人的幻想曲……一六九
隱蔽嘴牙的侵略者……一七四
關於人民藝術……一七八
在改造中的平劇……一八二
一部巨片的上演……一八六
清道夫與藝術家……一八九
鬪爭經驗與稿家底……一九三
兩件記憶猶新的事……一九七
我所知道的林彪……二〇二
信教自由三部曲……二〇六
協理員與我……二一一
瘋人的啓示……二一五
被粉碎的理想及其他……二二〇
一個睏倦的旅人……二二五
同路人與小鬼……二二八
第一次見到陽光……二三一

不願丟棄的「包袱」

在着手寫這一篇報導之前，我必須向正在爲人類的自由與民主而努力的人們表示最大的歉意與懺悔。因爲一年多的時間裏，我曾首由被欺矇，繼而被脅迫，留在中共部隊中，擔任過一些違反自由與民主的工作。假如我的文字，還有助於自由世界的人民，認清極權統治者的僞善面貌，以及他們怎樣在企圖摧毀人性和消滅個人存在，怎樣剝奪人類的自由和精神生活，那麼，將是我引爲最大欣慰的事了。

共產主義者，雖然在瘋狂地進行着對人類自由天地的侵犯，幹着以恐怖手段，剝奪人民思想，言論，行動自由的勾當，可是他們卻用盡了所有動聽的漂亮的名詞，藉以掩飾那些無可原宥的罪行，而這些動聽的詞句，正如鴉片一樣地，麻醉着他們已征服了地區的人民，更不斷向鐵幕以外的人民擴散與滲透。

他們談「民主」，標榜民主，任何決定都通過一個或幾個似乎瀰漫着民主空氣的會議。但是實質上，這正如他們自所解釋的，是集中的民主，服從的民主，貫澈命令的民主，替少數人的決定找理由的民主。如果不順從規定的民主而民主，他們將使用專政的民主。

他們談「自由」，讓我借用中共教育部長接管北平輔仁大學時，關於「信教自由」的幾句話：「我們規定了信教自由，但不等於沒有不信教的自由，也不等於沒有反對信教的自由！」這就是極權統治者所謂自由的邏輯。

他們談「和平」，他們却高唱：「我們需要戰爭，用戰爭來爭取解放，用戰爭來爭取和平！」（一首非常流行軍歌中的兩句話），想盡藉口來擴張和增强軍隊，對厭戰的士兵不斷地進行挑撥戰火的教育，以

「階級仇恨」製造對鐵幕以外人民的敵視，原因是爲了和平，爲了「保衛和平」。

他們談「獨立」，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接着就頒佈了倒向蘇聯的「國策」，一面倒的獨立。

他們也談「光榮」，是參加共產組織的光榮。

他們也談「快樂」，是服從共產組織的快樂。

他們也談「幸福」，是犧牲個人消滅個人的幸福。

他們也談「理想」，是百年前一個德國人一篇宣言所規定好了的，萬民必須一致的理想。

總之，自由世界所有的，他們都「有」，自由世界所沒有的，他們也「有」，可是美麗的動聽的，却並不能持久，人間沒有拆不穿的謊言，迷惑於美麗而動聽言詞的，那僅是有幸徘徊於鐵幕之外的一些人。

關於這些，我記起一個陳腐的故事：

有這樣一個買酒的人，到一家酒店去，他首先拿了一瓶白蘭地酒，可是經過一陣猶豫，他請求調換一瓶同樣售價的威士忌，店主人毫無疑義地答應了他的請求。這時，買酒的人拿起酒來便走，店主非常禮貌地請他付款，這個不禮貌的顧客却理直氣壯地說：

「我的酒是以白蘭地換得的！」

「可是，白蘭地你並沒有付款呀！」

「我並沒有要你的白蘭地。」買酒的人，依然是理直氣壯的。

可憐這位忠實的店主，一時竟再也找不出理由向他的顧客索取酒款了。

買酒的人似乎言之成理，可是誰都知道他分明是個狡猾的騙子。這故事足以幫助我來說明，共產主義者在說些什麼，在幹些什麼。

紅色中國的統治者，是極權主義者的新夥伴，是克里姆林宮的忠實臣子。他們以「組織」與「幹部」編結了一張赤色的網，我慶幸自己是一條漏網的魚。

他們將會以最狠毒的言詞，譴責我是一個叛徒，說我背着一個丟不掉的「包袱」，背叛了「革命」。但是，親愛的讀者，假如你是一個十分公正的檢查員，我這裡願意毫無隱藏地公開我的「包袱」。你將會發覺，我這不願丟棄的「包袱」裡面，僅有兩件不願丟棄的東西，那就是自由與民主。

以後的篇幅，我將記述一年來親身的經歷和觀感，但請不必爲缺乏故作玄虛之筆和聳人聽聞的故事，而感到失望。我絕不否認，這是一篇極其平凡的記述，可是，平凡的，往往就是一般的，在平凡中也許會發現更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許正代表着並不平凡的意義。

鐵幕以內的鐵幕

三十七年冬天，共軍以壓倒的兵力向平津進犯，北平的守將，迷惑於敵人假道南下的謠言，夢想着做一次覆巢下的完卵。

謠言不攻自破，北平是在隆隆砲聲之中，「和平解放」的。

守將被囚在一間小房子裏，去坦白和悔過。

隨着軍事的佔領，外籍記者被迫停發電訊，原有的報社和通訊社分別在「反動集團主兇」與「幫兇」的罪名下，被查封被接管。

只此一家的通訊社開始發佈有利「人民」的消息，只此一家的報紙，每日午後不定時出版。俄式鐵幕出現在北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古都，遭到史無前例的大封鎖。

朋友們見了面，都相互詢問：「有消息沒有？」言外之意，非常渴望知道一點鐵幕以外的消息。

新聞封鎖，是極權統治的第一個信號，人民的恐怖與不安只開了一個端。

那時我正在北京大學補修幾個未完的學分，並在學校秘書處兼做職員。

一位過去喜歡聽佳木斯廣播，北平「解放」後又喜歡聽南京廣播的老同事，在辦公室曾說過一句：「國民黨也許會打回來的！」的話，三天以後被派駐在學校裏的軍事代表下令解職，據說是隔壁辦公室裏，一個掃地擦桌子的工友報告的，這位工友「同志」，沒有人會相信他是四年以上的黨員。

老同事被解職後的一星期，我也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暫予停職」的通知書，同事們議論紛紛。都在幫

助我追憶，「翻身」前後是否說錯什麼話，做錯了什麼事？或是得罪了什麼人？最終，我鼓起勇氣去見軍事代表，他看看給我的「通知書」，然後說：

「有意見嗎？」顯然在故意地問我。

我介紹了自己的情形，並告訴他，我的學分早經念完了，兼職已經成爲過去了的事實。他猶豫了一下說：

「這是上級決定的，總之，兼職兼差都是「反動」政府下不合理的東西」。

當時我還不知道極權統治機構，有更多的兼職兼差的例子，只是爲了以後的生活問題曾向他再三的解釋和要求，他終於答應我再進一次「大學」，學習時期自三個月至一年半，由個別情形來決定。

意外的打擊使我煩惱，我爲此後的出路而徬徨，北大的「民主廣場」上，出現了白紙黑字的巨幅廣告以後，我才感到有了一線希望，廣告上清清楚楚地寫着：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即日成立「南下工作團」，廣爲招募團員，除了孕婦和目不識丁的以外，都可以「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的條件，必須持有街政府，職工會，或是學生會所開具的介紹信。

介紹信唯一的內容，是「保證政治清白」。在訪客出門都要多加小心的時代，這樣一封形同保結的介紹信，是頗爲不易獲得的，尤其是一個有「舊社會」工作經驗的人，豐富的履歷再也不值得驕傲，而只是代表着數不清的「罪惡」。一位失業的朋友，他自信素與政治無關，爲了想求得「清白」的介紹信，曾自動向街長去坦白，結果爲了一個私立中學訓育主任的履歷，非但遭到拒絕，並被「引渡」到他離職很久的學校去，幹部先生說：「冤有頭，債有主，請各位同學發表意見！」終於因爲學生們已不認識他那陌生的

面孔，才算不了了之。

有人批評統治者的幹部行政效能太差，這是不無原因的。除了對一般常識的欠缺，他們在每個不同的面孔上，用了太多的「研究」工夫。那怕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他們都不惜一再重複地來盤問，當然這種反覆的盤問被認爲是「人民政治」的基本工作。

爲了生活，我曾冒被「研究」之險，在軍事代表那裏，交涉到一封類似的介紹信，我之所以能輕易得到，因爲我被停職的當時，他曾經應允過，介紹我進「大學」的緣故。同時，我總算是沾了半個學生的光，只有學生才算是比較容易取信的一種人。

在舊同事的送別會上，有人爲我憂，也有人爲我喜。爲我憂的，擔心我此後將不知去過一種怎樣的生活，更不知將被派送到什麼地方去；爲我喜的，說我畢竟找到了一個可以謀得工作的機會，他們的憂喜，在我心中，佔有同樣的份量。

南下工作團還只是一個空架子，幹部正在遴選中，我們已被集中在一個曾爲「帝國主義兵營」的地方，開始「體驗生活」。

兵營裡，只有一個奉派來管理伙食的幹部，這唯一的幹部，是有着十年以上的「革命功勛」，只因爲「文化水平」太差，才屈就這記豆腐帳的工作。

第一天晚上，就有機會領教他的講話，他很健談，三小時的冗長談話裏，反覆地告訴我們一件事。他說：老百姓還沒有「覺悟」，「反動份子」太多，叮囑我們自己看「文件」和寫「自傳」。

這時，我開始知道有所謂「積極份子」的一種人，當時爲了某種原因，這些人還是以無黨無派的「賢

達」姿態出現的（黨團公開以後，才正式暴露組織關係）。正當我好容易盼得的頭一個禮拜六，不甘寂寞的「積極份子」，發起了勞動渡週末的辦法，發起時是採用「民主挑戰」的方式，人與人的，組與組的，東一個「自願書」，西一個「自願書」，自願不自願，實在令人難解難分。「積極份子」在編制上是分散的，在作用上却是集中的。挑戰的結果，誰也不願意「落後」，「一致」贊成將大門鎖起來，把禮拜六捐給「毛主席」。

「民主挑戰」盡可不必參與，但是「民主決議」必須服從，我以極度勉强和失望的心情，接受這「民主」的第一課。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已置身於屬於鐵幕以內的，另一層鐵幕之中了。

「提供」內容的自傳

最初的十幾天，我們除了剷草，拾糞，擦地板和開會以外，空下來的時間，就是趕寫一篇極難通過的自傳。也許有人以爲所謂自傳，不外乎是記述自己過去生活和經歷的一篇文字，這樣想法與當時我提筆寫自傳時，完全一樣，不過，我却爲此而遭到嚴厲的批評。批評中竟指出，我照實來的自傳，是一篇「無立場無原則無內容」的東西，當時，我感到非常驚恐與不安。幸好受到這樣批評的，不止我一個人。第一次的自傳遭到普遍的退票後，每個人都戰戰兢兢愼重其事地寫第二遍，有個年歲小的女同學，因爲寫不出與第一次自傳兩樣的自傳，而伏在桌上痛哭。有人爲了寫自傳，跑到東安市場書攤上買了將近十個袁大頭的參考書。有些「積極份子」則向馬、恩、列、斯、毛的自傳上開刀，想挖出一點「內容」來。一本「怎樣寫自傳」的小冊子走了紅運，一天廿四個小時，都排好預約的名單，借閱的時間，由半天縮短爲二小時。在這樣緊張愼重的情形下，但是有些人的自傳，還是寫了九遍之多。

總算天無絕人之路，最後，女指導員用諷刺和嘲笑知識份子的口吻，向我們「提供」了一些關於自傳的「內容」。

這裏，我簡單地介紹一點：

（一）必須說出自己屬於什麼「階級」，剝削人的或是被剝削的。如屬前者，必須寫出剝削過什麼人，怎樣剝削的；屬於後者，則要寫被什麼人剝削過和怎樣被剝削的。假造是不行的，因爲一定要負責介紹所指對象是什麼人，是怎樣的一個人。

（二）如果是過去的政府人員，首先必須承認自己是「反動統治階級幫兇」，承認以後，必須再具體說出「幫過什麼兇」，做過那些「違反人民迫害人民」的事情。假如說沒有，當然也是不可能的，因爲已經承認「幫兇」在先了。（不承認就是沒有「覺悟」，自傳更是通不過的。）

單單這兩個已經夠寫了，既承認自己是什麼「階級」或「幫兇」，就必須絞盡腦汁來想「事實」，這些「事實」實在比無中生有還要難一些。

一個當過警察的人，在自傳上招認「剝削」過三輪車夫，具體事實是拿過車夫的墊子，並强迫車夫停止拉客。

一個家境比較富裕的女同學，在自傳上說，除了屬於上一代的「剝削」，留待以後「清算」外，她自己就打過傭人，罵過比她窮的同學。

一個年歲很少的學生說，使他一生最爲不安的，是「剝削」過一個很窮的同學的鉛筆和橡皮。最初是借，可是借了以後就沒有還。

一個在稅局做過職員的，他說曾接受過局長的「花紅」，並强調所謂花紅，完全是「勞動人民血汗的剝削品」。

最動聽的是一個曾攜帶細軟拐逃過的姨太太，她說這是給「剝削階級」一種無情的打擊，而爲被「剝削」的家庭婦女，開闢一條新生的道路。她的自傳被宣讀時，曾贏得普遍的掌聲。

我毫無增損地介紹幾個例子，以存其眞，這一階段中，許多人還不會運用更多的「政治詞彙」，只能在「剝削」兩個字上做文章。自傳的「內容」還不僅於此：

（三）假如過去是學生，首先須坦白出參加過國民黨或三青團沒有，參加過的當然麻煩就更多。就是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的，也要說明當時爲什麼沒有參加「反美扶日」「反飢餓」一類遊行的原因，想不出原因的至少要「認錯」，說當時因爲受「反動」宣傳的影響，沒有機會「覺悟」。

（四）自傳中必須用很大的篇幅來寫「思想轉變」的經過，憑空是不行的，「唯物論者」要的是「事實」。比如「對人民軍隊怎樣發生好感的？」「對新政府怎樣認識的？」「對美蘇兩大陣容是怎樣看法？」一類問題的答案，都可以作爲「思想轉變」的根據。

不過，答覆這些問題必須「連繫自己思想」，說一方面的好，也必須說另一方面的壞，僅說好與壞是不夠的，必須具體地說「怎麼好」「怎麼壞」。假如你說「有好有壞」「不好不壞」，或者說「我只是爲生活問題來找一份工作」，「我根本沒有什麼認識」一類的話，當然絕不會被接受，而說你思想還沒有「搞通」。

（五）自傳中必須包括對家庭，朋友和過去學校的「批判」，對家庭做「批評」，主要對象是過去認爲一家之主的父親，讀了若干年的「大義滅親」，此時此地可以應用了，因爲不如此無足以顯示「覺悟與進步」，當然家庭的成份，生活方式和經濟來源也都在「批判」之列。

（六）毫無疑義地，要非常瑣碎地紀述你過去的生活與經驗，每提到一件事，單純記述是不行的，必須寫出動機和造成的原因，並給予「批判」。比如你「爲什麼抽烟」，「爲什麼渴酒」，「爲什麼」同某一些人有社交關係，「爲什麼」……。

（七）婚姻大事也是上級最關注的一件事，如果你有一個女友，你必須要坦白出「爲什麼」要愛她，

愛她「什麼」，她是不是「悟覺」了？沒有「覺悟」的話，是爲了什麼？你是否還打算　她長久相愛下去？當然，既未結婚，又無女友的人，要算被認爲「乾淨」的一種人了。

請原諒我的記憶，我僅做如上所述地，介紹一些這篇自傳應有內容的大概，對於想明白極權統治者關於思想控制的人，就是這內容的大概或許已經夠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千言萬語工、農、小、

我們被劃分了許多小組，「積極份子」被指派爲小組長，小組的人數，由四人到十一人不等。這種不規則的劃分，最初使我頗爲不解，後來知道，編制人數是一致的，各小組的「空額」，乃是爲了政治的目的，留給即將由東北調來的，和正在北平各學校幹「動員」工作的幹部「同志」的。

管理幹部盛讚我們對「勞動觀點」有了新的認識，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有了半個月「體力勞動」的經驗，兵營之內的枯草剷光了，操場上再也找不到一點瓦片和馬糞的痕跡，擦亮了所有的地板和玻璃窗。牆報（即壁報）上大事表揚的，是一位清華大學女同學，用手洗滌公用抽水馬桶的故事。牆報的編輯說：她已經剷除「小資產階級」意識，樹立了爲工農兵服務的「新勞動作風」。

「人民日報」以五行大字刊出，清華大學盛澄華教授，參加「南下工作團」的消息（這位教授原是清華園默默無聞的人物，「解放」後不甘寂寞而被「動員」參加的，也是北平著名學府中，參加南下工作團僅有的一個教授）。統治者所以如此重視，絕不是爲了教授專攻紀德的「反動知識」，據說是因爲教授對那還在猶豫、猜疑、觀望的北平知識青年，起了「帶頭作用」。

參加「南下工作團」（簡稱南工團）的人逐漸多起來了，除了我們這些來自各大學而被稱爲「文化水平」較高者外，其餘的大部份是機關職員，工友，中小學教員，學生，工廠工人，小販，警察……正如統治者所說都是「來自各階層的人民」。

知識份子集中編爲一個大隊，北平各大學教職員學生（包括流亡在平的東北大學，長白師院，東北中

正大學，由西大學等在內），總數不是四百人，約佔全大隊的半數。

編隊以後，逐步正規化了。主持隊務的，是新派來的女指導員，一如其他的知識份子老幹部，有兩片說不破的嘴唇，和滿腹的「馬列經綸」。她是四川籍的「長征」幹部，已年逾三十，據說患着嚴重的肺結核，人瘦得弱不禁風的樣子。關於這個女指導員，大隊裏有着各式各樣的傳說，有人說她嫁過四次，結果都離異了。離異的原因，是不滿意「組織上」（幹部對黨支部習用「組織」或「組織上」的稱呼）給她物色的對象，這些對象往往是年齡懸殊而比她資格更老的老幹部。但是她絕不能夠公開違抗「組織」，只有用「開情緒」，而採取消極離異的辦法。有人說「組織上」派給她的隨身警衛員，通訊員（勤務兵），對她生活上的服侍，很能貼體入微，這兩個兵都是「翻身」農民參軍的關東大漢。又有人說，她的肺病很嚴重，「組織上」勸她休養，她不肯，她自知不久人世了，要「爲人民服務」到最後的一口氣。總之，這位玉型的女指導員，很快地變爲大家談話的資料，直到小組長奉命「整肅」這種「小資產階級惡劣作風」以後，才不敢再公開談起。

我們正式開始了「小組生活」，每天三次會，早飯前，午飯後，和晚上。上午多半是上「大課」，或是集體到外面去聽「報告」。

大課是由大隊長，指導員，或南工團副總團長輪流擔任，大課的內容，偏重「組織紀律」的講授，所謂紀律，只包含着一個意義，那就是「服從組織」。不過，講來講去總是千篇一律。有一次，副總團長自己講得不好意思了，曾說：「共產黨人只有這麼一套，不過，知道這一套，已經足夠了。毛主席曾說：加强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大家對老幹部冗長乏味的大課，早已不感覺興趣，但仍得打起精神來聽，否則就會遭到嚴厲的批評。有一天，在上大課的教室門口，有人用粉筆寫了一付對聯，上聯是「千言萬語工農小」（工、農、小指所謂三個友人，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聯是「翻來覆去官帝封」（官、帝、封指所謂三個敵人，即「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大家鼓掌叫好，結果觸怒了副總隊長，扳起面孔訓了一個上午，但是他一邊訓，大家一邊笑，因爲那將近四小時的訓話，翻來覆去還是脫不了「工農小」和「官帝封」。

聽「報告」算是比較有興趣的一件事，因爲只有聽報告，才有機會走出那沉悶的兵營，集體到朝陽大學廣場，或是中山公園的草坪去。路上也許還可以找個機會「開小差」，直到報告完了再歸隊。不開小差的，至少也可以看看大街上的景緻（當一個人失去自由的時候，才會體會到有機會在大街上走走，是多麼愉快的事！）。另外一個發生興趣的原因，就是奉命來做「報告」的人，多是思想還沒有十分搞通的「民主人士」，他們的講話，聽起來總比老幹部的「大課」要輕鬆有趣一些。

「報告」聽多了，也還是那一套，因爲所謂「民主人士」，在被指定的學習中，漸漸地也都「搞通了思想」。

後來我們對「民主人士」的報告，不但不再感到興趣，反而有比上「大課」更多的惡感。這些被「搞通思想」的「民主人士」，有時裝做比老幹部還要「進步」的樣子，這「進步」的樣子是令人吃驚而怕人的。

當時備受保護的郭沫若，曾以「完成統一領導抗戰的中國共產黨」爲題，做過一次屬於創造與發明的

「歷史報告」。所謂「完成統一」是指被稱爲「大革命」的北伐，共產黨怎樣領導北伐和領導抗戰，是不能以「反動史實」來衡量的，除了「本質領導」部份，我們像聽一個聞所未聞的傳奇故事。記得聽講的當時，就有人傳遞了一個未署名的紙條：「郭先生，你在重慶時是不是也這樣說？」被質問的郭先生，非常老練地笑着說：「不錯，我在重慶的時候，就是這樣說。」不滿二十歲的聽衆，這時更加佩服郭先生的一貫「革命」，不過，假如有人曾在抗戰時代的陪都，見過這位穿着「反動戎裝」，出進政治部第三廳的郭先生，並曾領教過他的演講的話，那麼，我們將會爲那些所謂「民主文化人」，而感到羞辱。

以「民主教授」聞名的鄧初民，在他那「吃飯與睡覺」的演講中，曾一再地高呼「萬歲」，從那些生硬而給人以唐突之感的動作，我看不出絲毫的「進步」意義。假定不是由於「進步」，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這樣令人惡心的故事多着呢，這不過是一兩個例子罷了！

一個「羣衆」的悲哀

自傳被認可以後，首先拿到小組裏公開「研究」，由於這次「研究」，我才明白了「積極份子」都是一些什麼樣的人物，我才知道了一點，統治者二十年來所謂「地下鬪爭」的片面，我也深深地悔悟到過去對政府的宣傳，採取保留或懷疑態度的不該。因爲在「研究」自傳的時候，我發現小組裡十一個人之中，有六個人就是過去所謂的「職業學生」。當然，此刻該是他們揚眉吐氣的時候了，每個人都不厭求詳地，誇耀他們「地下鬪爭」時代的「功績」。

我不必夾雜任何一點傳聞，就以我所在小組的六個人的情形，簡單地寫一點出來，也就夠令人驚訝的了。

小組長，是北平師範大學三年級的學生，浙江人，曾幹過青年軍，青年軍復員時，被保送到師大的。記得當時在北平有些無所謂的人，感到一批青年軍復員的學生，有太濃烈的政治氣息，當然這些無所謂的觀察家，是指他們都是過於接近，或直接參加國民黨的組織，因而這些人，在當時的學校裏，曾受到「進步」學生的歧視。可是萬萬想不到，他們之中，竟有着許多「傑出」的共產黨「地下幹部」。我們的小組長，就是如此傑出的一個，他曾利用被人視爲當然的政治身份，做過許多有「建樹意義」的破壞工作。在他三十年的生命中，可以用一半的時間，來計算他的「布爾希維克」濃度，當然，過去因爲環境影響，他的「組織關係」是時斷時續的。下面說是他那「不平凡」的歷史：他小學畢業以後，因家境不好，到一家[illegible]

個二等兵的缺，他士兵有着比普通較高的知識，頗引起同連的關機槍手的注意，後來經過機關槍手半年多的「考核」與「教育」，終於在一個月明之夜他宣誓入黨。以後他由文書上士調做師部的通訊員，據說在這通訊員的任內，曾替「組織」做過不少的工作。在一次國共局部衝突中，他做了新四軍的俘虜，當然這個戰俘，很快地就變爲了入幕之賓。皖南事變後，他又被國軍收編，那時他已經當了連長，抗戰勝利前，調在青年軍某部做分隊長，一直到復員。

我們小組裏唯一的女「同志」，也是歷史頗久的「功臣」。許多燕大的同學，只知道她是一個喜歡穿西裝褲子短大衣的上海小姐，並以跳「命巴」與「探戈」而聞名全校的。可是她自己却說，她在無錫一個紗廠做事的時候，便加入了「組織」，後來在上海念大學的階段中，「組織」上便派她做負責介紹青年學生去蘇北的連絡工作，直到被政府注意而險遭逮捕時，才轉學到北平來，到北平後，經常以華貴裝束沉醉歌舞的姿態來掩護她的身份，不過，她一直還是做着連絡去「解放區」的工作。

另一個是一九四七年北大畢業後，在天津稅局做職員的「同志」，他介紹了自己加入「組織」經過以後，把他在稅局時的「工作」，縷述爲三大類，那就是「破壞反動稅務」，「供給情報」和「擴充組織」。在天津易手前的兩個月，曾因案被捕入獄，直到「解放」的前一天，才釋放出來。

還有一個河南人，在家鄉一個小縣份裏念初中的時候，就加入了「組織」。加入不久，那位「介紹人」便被捕了，他的「關係」也就因而中斷，直到後來到開封「搞學運」才接起來。

與這個河南人相彷的，是一個亦商亦學的人物，曾利用自治會的關係，在北大開過一個左傾思想販賣部（原名是文化服務社，專售左派書籍，和代訂「解放區」報紙和雜誌），這是當時全華北的所謂「學

運」中心，而這個販賣部的主持人，也就是中心的中心人物。他是抗戰時在重慶參加「組織」的，當他被吸收做「預備黨員」時，跟他連絡「關係」的人，曾叫他到憲警林立的臨江門去貼過「打倒×××」和「反對特務組織」的標語，用以考驗他的決心。當然，他當時不會意識到，這兩張標語，也就是「特務組織」的敲門磚，而他的「地下生活」也就始於此。

最後一個是北京大學「劇藝社」的人物，「歷史」很淺，只是在舞臺上和舞臺下，做過一些搖旗吶喊的工作。

這僅僅是六個人故事的片斷，在一部「新左傳」之中，這星星點點的事跡，實在是太渺小了。不過，我能夠獲知這星星點點的秘密，實在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事後我們的小組曾遭受「組織性不强」的批評，因爲黨員團員的自傳，只是對「組織內」公開，暴露給沒有組織關係的「羣衆」，被認爲是「無組織紀律」的行爲。在這以前，大隊裡還從來沒有聽到過「黨員」與「羣衆」一類的名詞，我更不知道，自己就是一個任何黨員與團員，都有「教育」與「改造」義務的對象——即所謂一個「羣衆」。

我以極不愉快和感到莫大侮辱的心情，來接受「羣衆」的頭銜，對「積極份子」來說，「羣衆」更只是表示不足道與理應賤視的許多意義。

一方面「熱心」，一方面「不知趣」，大隊裡，發生了「黨員」與「羣衆」互不見容的摩擦，黨員團員，都有一股自高自大凌人的盛氣，處處表示特殊，處處想享有特權。可是，不幸他們所遇到的「羣衆」，實在不夠理想。不但不俯首貼耳來接受「改造」與「教育」，竟膽敢打擊、諷刺這些「功在革命」的人。

這互不見容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了，普遍到各學校，各「大學」，各工廠，各個機關。北大四院會有人不顧一切地大聲疾呼：「黨員退出學校！」結果這「誤解」學術自由的一些人，只是換得了殺無赦的「國特」罪名。

打擊諷刺的終於失敗，在「論功行賞」的時代，做爲「羣衆」的人畢竟是可悲的，因爲「功在革命」的人，確有太多與「革命」俱來的特權，而各級「組織」的另眼「照顧」，已被視爲當然的事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光榮的「志願」參軍

大隊裏發生了一次空前的騷動，原因是在我們思想被認爲將近搞通的階段，補行了一次開學典禮，在這個隆重的大會上，出現了許多「隆重」的人物，尤其是一向被認爲神秘的傳奇人物林彪，事先每個人都以好奇與興奮的心情，準備見識這些「隆重」的人物。可是經過這第一次的實際會面以後，却立即變爲不愉快的印象，因爲這個握有百萬以上兵權的統帥者，在他那富於煽動性而帶有濃重湖北口音的演講中，宣佈了一件意想不到關於大家「志願參軍」的消息，雖然他以自己認爲非常巧妙的邏輯來宣佈的，但是大家情緒的浮動，還是無法遏止的。這以前，許多人還只是迷惑於「南下工作」的字樣，「志願參軍」這件事，實在是突如其來，也是前所未想到的事情。不過，共產黨人幹工作就是講究痛快，沒有想過的趕快想，想不通的「幫助」通，通了以後，那就與人無尤的「志願」了。且看統帥者「幫助」打通思想的邏輯：

「諸位同志都是來革命的，是不是？」

「積極份子」帶頭喊「是」，事實上，不喊「是」的人，也沒有辦法否認這個既冠冕又堂皇的大前提，因爲大家都已經吃了所謂「革命」的飯。

「革命的人，就應該服從革命的需要，而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這些接着而來推論，也是不容否認的。

「現在革命最需要你們到部隊中去！」

原定而帶有强制性的結論來了，不但被迫接受，並立即當場兌現：

「我鄭重地宣佈：從今天起，你們再也不是一個懦弱的知識份子，而正式做了爲兵服務的文化戰士；今天開學典禮的意義，也就是諸位「參軍」的開始，而今天的大會也可以說是南下工作團的光榮誓師大會！」好一篇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演講！接着就是不容分辯地，由副總團長領頭喊「響應號召」「服從組織決定」一類的口號，大會就在同學們面面相覷的低沉氣氛中結束。

處於這種情形下，我以及與我同一目的想找工作做的許多人，便光榮的「志願參軍」了。開會回來，中隊長把已準備好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白布黑字的胸章拿出來，細心地教我們怎樣把它縫上去。

佈置盡管嚴密，可是大衆情緒上的空缺，仍是沒有辦法彌補的，從那天起，騷動與渙散的空氣充滿了整個大隊，和整個南下工作團。

「積極份子」也免不了要「鬧情緒」，因爲事先他們也是被閣在鼓裏。有些人打腫臉充胖子，咬咬牙說：「當然服從組織決定。」有些人則表現得非常不「積極」。

不屬於「積極份子」的我們，有的要交涉不幹了，有的要設計開小差（這是不大容易的一件事），有的則準備消極怠工，有的則準備故作思想不通。當然，統治者是不會束手無策的，首先說服了「積極份子」（「說服」的內容不詳，辦法總不外「利誘」與「威脅」。）讓「積極份子」起「帶頭作用」。

對於其他的人，主要地是分化，所謂「個別解決」。對統治者來說，「團結就是力量」的口號不但已是過了時，更要設法來破壞「團結」，消滅「力量」藉而減輕它所帶給他們的新威脅。

報上出現了「割尾巴」運動。

指導員非常熟練地（前此她當然處理過很多「强制而志願參軍」的事件，連她自己都承認最初也是如

此「志願」而到部隊裏來的）分析了這件事：「這並不是大家不想「參軍」，只是每個人拖了一條「尾巴的原故，所以大隊裏發起一個「割尾巴」的運動。」

她接着又分析所謂「尾巴」：一種是「家庭的尾巴」，嬌妻愛子恩父慈母的「尾巴」，爲留戀家庭所以有些人不願參軍；一種是舊社會的「尾巴」，爲顧及過去「舊社會」的關係和地位，所以有些人也不肯「參軍」，第三種是「舊意識的尾巴」，任何不想和不願「參軍」的理由都可被解釋爲「舊意識」。關於「舊意識」，她並舉了很多的例子，比如：強調個人志趣；強調個人的健康；鄉土觀念以及對部隊工作的不正常心理……。總之，在個人自由被澈底否定的時代，任何拒絕參軍的理由，都被她那張傳佈肺病細菌的嘴（她確是嚴重肺結核病的患者）歪曲爲「舊意識」。當時我還爲此與她爭辯過，其實，今天想來，這種爭辯簡直是多餘的，因爲「志願參軍」，乃是必須貫澈的命令，而這位可憐的肺病鬼，只是被指定負責運用一些「大帽子」和「大教條」來「打通思想」，她只能在貫澈命令的時候，做一正面「說服解釋」的工作而已，至於與命令不一致的問題，又豈是她所能決定的事？所謂「打通思想」的妙用也就在這裏。打通思想的過程中，被打通者的任何解釋都是毫無疑義的「舊意識」；任何理由都會變成一種不容分辯的「罪名」。所謂「割尾巴」，不過是「打通思想」的另一種說法。

不願「參軍」的，都被肯定地指出，是拖有「尾巴」的人。「拖尾巴」來「革命」的代表着十足不光榮的意義。統治者爲了被統治者的「光榮」起見，特備利刃若干把，請自己動手割「尾巴」，當然不自己動手的，便會有人代勞。

牆報上又在表揚「割尾巴」的好漢了：

說某某人已經同他才結婚不滿一年，因爲一舊意識」而使他們恩愛過的太太離了婚。

說某某人將孤苦伶仃的妹妹，付託給街政府，並在街政府的「大力照顧」中。

說某某人已把「革命意識」帶進了他那「封建家庭」，在單槍匹馬的「鬪爭」中，他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說某某人退回了父親送來的錢，因爲他發現慣於行賄的父親，企圖用罪惡的錢來阻子「參軍」。

說某某人拒絕接見遠路探訪的老母親。

……。

這是一連串不忍卒讀的悲劇。

成千成萬個人的故事，我沒有辦法在有限的篇幅中來講完它，上面只是幾個平凡的例子而已。我說「某某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此刻正分散在中國大陸上，或是國外的戰場上，繼續幹着「志願參軍」工作的青年朋友，無可避免地，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許在難以瞑目的「志願」中犧牲了。這被犧牲的一些人，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也許是你們的朋友，請爲我們的朋友寄以無限的同情吧！因爲我們畢竟有機會知道了他們是怎樣「志願參軍」的。

「馬列主義」第一課

「學習」一個多月了，我們還停滯在學習「學習方法」的階段中，特別是知識份子，對於所謂「學習方法」，務必要下一番「脫胎換骨」的工夫，才能學有所獲。據說屬於「無產階級」的工農份子，對於這門學問却有着天賦的聰明，可以無師自通的。

這也許是很難令人相信的「眞理」，不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請看下面的事實：如果知識份子有幸參加這個政黨的話，必須要一年到三年的「後補期」，但對於工農份子來說，那僅是三個月到半年的事情，如果是一個什麼目不識丁的「典型英雄」之類，更會有「立即批准入黨」的奇跡出現。所以，在我週圍的「積極份子」，都非常懊悔自己當年爲什麼被送進學校而學了一身「毛病」呢？這樣想時，那已經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上一代，又多了一重「罪過」。不過，知識份子的知識，還算是有了一點用處，他們畢竟懂得了上一代是受到「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毒素」的影響，實難與問罪都已與事無補了。逝者如斯，今後只有致力於「無產階級」的學習。因此，他們改用無限敬仰與羨慕的眼光，來親近他們過去不屑一顧的一群人。但是不巧得很，在我們所住兵營範圍之內，竟找不到一個像「文件」上所刻畫的「具有高度階級覺悟」的工人或農人，不得已再求其次，於是那兩個爲女指導員保鏢的「翻身」農民和三個出身鐵匠泥瓦匠的「炊事員」（伙夫）便交了好運。一向被認爲起「帶頭作用」的牆報，以「學習無產階級作風」爲題出了專刊，說那兩個保鏢的農民，是以「無產階級的感情」照料着女指導員的生活。「積極份子」更誇大地說，在柴薪艱難的情形下，炊事員同志是以「階級熱情」來完成燒飯的任務的。接着，下一期的牆報

又發起「慰問勞苦功高炊事員同志」的運動，單純的慰問不夠具體，「響應號召」的「積極份子」發[illegible]了捐贈實物，於是有人捐毯子、捐毛巾、有的捐筆、捐錶、捐戒子、我也把「上級」照顧給我的兩塊肥皂捐了出去，因爲沒有人肯放棄，這一類足以表示「進步」和「覺悟」的機會。晚會上也空前有了炊事員同志「唱軍歌」「學狗叫」的節目，直到每個小組選派代表，携帶實物正式舉行慰問儀式後，這個轟轟烈烈的「運動」才宣告平息。這是三個整天爲烟火迷着淚眼的炊事員，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恩寵」，此後他們當然還是默默地過着那烟火瀰漫的灶邊生活，不會再被人提起了。不過，我却爲他們因而獲到一點意外的實惠，而感到欣慰。

當這個被認爲學習方法之一的「運動」結束以後的第二天，副總團長告訴我們，將在當天的下午宣佈一件事，也就是馬列主義的第一課。所謂第一課，無疑地還是屬於學習方法之類。

不過，那怕是一點「馬列主義」的皮毛，我也是頗感興趣，因爲幾個以前的老同事，來探望我的時候，曾屢次低聲問我：「你當了這麼多天的「八路」，究竟學了些什麼東西？我除了用苦笑來回答他們，再也沒有辦法能夠滿足他們的關懷與好奇。「漸變」「突變」「矛盾」「統一」「辯證法」「唯物論」只是一些人云亦云的時髦名詞而已，有時受着求知心的驅使，想翻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類的「巨著」時，便會遭到「啃理論」的批評，因爲「啃理論」，被認爲是不切實際，而隨時有犯「教條主義」的可能。

當天的下午，我興緻勃勃地，跟着隊伍走進上大課的教室，準備洗耳恭聽這入團以來，第一次關於理論的講授。

這位曾經是「李立三路線」（李立三路線是指江西時代主張城市暴動而被整肅的所謂左傾冒險主義的

思想）紅人的副總團長，春風滿面地開始了他的演講。

結果却令我失望了，這時我才明白了所謂「馬列主義第一課」是什麼樣的內容，雖然以後的日子裏，我曾上過許多次類似的「第一課」，但當時究屬初次，確使我感到啼笑皆非。

副總團長，在他的演講中，三分之二的時間，來讚揚我們在「學習」中的「進步」，並一改以前的口吻，說知識份子雖然是妥協的動搖的，但畢竟是比較容易接受「進步思想」的一種人。接着又說，接受「進步思想」，只是進步的一面，重要的一面，必須要拿事實來表現的。

繞了一個大圈子，後來方說出他所指的「事實」：

原來是統治者認爲，在這被稱爲文化發源地的平津地區，南工團所「吸收」的人數實在不夠理想，雖然想盡了辦法，不惜以官報的頭條新聞，代替了招生廣告，不惜以「高官厚祿」的謊言做食餌，不惜派許多幹部和「積極份子」，到各機關學校去專搞「動員」工作，結果人數還是不多，許多知識青年還是不「覺悟」，這實在不能不認爲是一件憾事。所以新的如意算盤來了，想叫我們已有的四千多人（平津兩地）普遍地做「動員」工作，如果每個人能夠回到機關，回到學校，回到家庭，回到親友群中去「動員」幾個人來，人數不是很可觀了麼？爲了完成這個「光榮任務」，緊接着我們有了一整天空前未有的假期，最後，副總團長才特別强調地說：這就是爲「人民」服務的「實踐」，也就是「馬列主義的第一課」。

我不必再記述，響應號召的「積極份子」，又有一番怎樣緊張熱烈的演出。這裏，我只想交代一下這件事情的結果，雖然有人把家裏的老婆子，守寡多年的嫂嫂，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以及目不識丁的芳鄰（這時目不識丁已不在限制之內了），都「動員」來了。但據說還不足「上級要求」的三分之一，至於我

呢？對於這「馬列主義第一課」，只是無可奈何地交了白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低級趣味新估價

這是事事物物「翻身」的大時代，一部五千年來的歷史要從頭寫起。五千年以前茹毛飲血的史料則予珍藏，並發揚光大，據說這與極權主義者所指的人類遠景極其相近，因而茹毛飲血的人類襁褓時代，被稱爲「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原諒我不是一個史家，我所謂「五千年以來」的意思，是指從人類開始有思想有言論的那一天算起）。統治者不惜用比修建萬里長城還艱巨的工作，來從事歷史的「改造」。在「改造」歷史的過程中，不但是陳勝、吳廣、張獻忠、李自成被尊稱爲歷史上僅有的「人民領袖」，就是現社會裏的一切事物，也都有了新評價。

一個多月的生活，使我知道了自己一條睡過三年的毯子，從此刻算起是「人民」的氈子，穿了兩年多的衣服，也被算做是「人民」的衣服。自從被宣佈「志願」參軍以後，我們也有幸被稱爲是「人民隊伍」。人民，這是多麼壯嚴而肅穆的名稱！可是當我知道了「人民」的確切意義，以及太多誤用與濫用的情形以後，實在爲這個嚴肅的名稱而叫屈。

我曾誤以輕鬆和調劑生活的心情，參加過第一次的晚會，這時，我才懂得，精神生活對於講「存在」的唯物論者，早已是不存在的東西了。在那次晚會裡，我領教了比置身戰場更濃烈的火藥味，比聽政治性演講更多的政治詞彙，就是所謂輕鬆的節目中，也必須夾雜着所謂「階級意識」。

晚會是在總團長領導之下，經過所有的幹部和「積極份子」大力籌備的，爲了使他們籌備晚會的希望不致於落空，下面我介紹幾個被認爲有學習價值的節目：

鳴鑼開幕，第一個節目是十幾個眞刀眞槍抹着紅臉的兵，一個個湧現在舞臺上，經過「立正」「稍息」「一二三」，便面對觀衆坐成了一個扇面型，爲首的班長說了幾句話，大家說好好好，一個僅面部化裝的指導員被請出來講話，這位演指導員的人，好像頗有一點舞臺經驗，半面對舞臺，半面對觀衆，開始了他那帶有戲劇性（我所指的是他的聲調）的演講，大意是說：「形勢發展得很快，要準備向江南進軍」。我當時以爲這是節目的開始，不料他的講話却長達三十五分鐘之久，講完了，臺上鼓掌，臺下也鼓掌，便打鑼閉幕了，是一個節目就此結束。

第二個節目總算好一點，有了一個女主角，雖然不是一個時裝小姐，却正如劇本所要求的一樣，她生有一付令人喜愛的面孔，燙頭髮，穿着一身「列寧裝」，扮演一個不脫「小資產階級」作風而已入了「黨」的俄國女兵。據說這是蘇聯名作家的名劇本，劇本中僅有的第二個人是一個男詩人，故事發生在某一個偏僻的小島上，詩人是女兵的非黨朋友，詩人用朗誦的詩句讚美他的家鄉、家庭以及幻想同一個理想伴侶結婚的美滿，一字一句都打動在女兵的心坎上，她用激動的表情和語言，接受那詩人的挑情。最後她竟不顧一切地跑過去狂吻了那個詩人，詩人立即向她求婚，她却陷於極端矛盾極端痛苦的狀態中。突然（當時我感到的比你所感到的還要突然）倒退兩步，拔出槍來打死了那個詩人。劇本到此爲止，據說這是表現共產黨員的「堅强組織性」，這是她打死向她挑發的第四十一個男人，這個劇本的名字就叫第「四十一」。

以上是節目中僅有的兩幕劇。

其他只是一些標語口號的朗誦詩，合唱或獨唱的軍歌，這些詩和歌，唯一的特點是均屬於政治性的「名詞遊戲」之作。

在節目進行當中，會臨時請一個老幹部講了一個「放屁」故事，故事內容我已不復記憶了，不過故事的結語是：「地主階級的屁是臭的，農民的屁是香的」。也許有人嫌我太庸俗了，不過，假如不是我親耳聽到這樣的故事，而曾爲此引起軒然大波的話，我原意也不想敘述這一類的瑣事。

晚會也被認爲是「學習方法」之一的，節目完了以後，接着就是觀衆與演員合開的檢討會，在檢討會中有人提出了這個放屁的故事，提意見的人，像我一樣是一個「羣衆」，他指出這個故事太庸俗，太低級趣味了。就爲了這極其普通的簡短批評，引起了「幹部同志」和「積極份子」的普遍反感並大發宏論。

有人說：提意見的人是過去「資產階級」的論調，所指庸俗與低級趣味，正是「無產階級」最熟悉的東西。

有人說：今天對所謂低級趣味的東西要重新估價。

有人說：「地主屁是臭的，農民屁是香的」，這種說法的「階級意識」，非常正確。

有人說：「學習工農階級」絕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工人農民的粗魯語言，正可以表示他們的「階級語言」，也正是我們應該善加學習的東西。

有人說：學習所謂低級趣味的語言，正是「知識份子工農化」的敲門磚。

有人把魯迅在某一篇文章中，所提到「他媽的」爲「國罵」的幾句話，搬出來做佐證，並說應該普遍提倡所謂低級趣味的東西。

有人用考證的口物來附合上面的意見，說魯迅提到「他媽的」的時候，指出「他媽的」三個字只是一種省略語，全句應在「他媽的」上面加上個動詞，下面加上個賓詞。

女指導員在議論紛紛中，做了一面倒的總結：

「對低級趣味的重新估價，是絕對正確的！」

此後「他媽的」像「人民」兩個字一樣，流行在大隊之間。尤其是一般女「同志」，過去認爲羞於出口而經過此次「解放」之後，幾乎每一句話都用上不止一個「他媽的」。我在以後的日子裏，所以能夠容忍任何老幹部對我開口就是「他媽的」這一類不禮貌的行爲，也完全是由於這次「學習」的結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一個朋友的故事

被認爲拖着「尾巴」來參軍的一羣，經過「打通思想」的整肅後，雖然有些人只好悶頭「鬧情緒」，但有些人畢竟認爲這條「尾巴」是血肉連身的東西，不能毫無來由地犧牲掉。試想誰無溫暖的家庭？誰無恩愛的父母？誰無嬌愛的妻子？人性與感情編結而成的所謂「尾巴」，是任何外力所不能斬斷的。統治者縱然擺在每個人面前一把鋒利的刀，但是爲了不願割掉「尾巴」，而寧願「從容就義」的竟大有人在。我這裏僅是敍述一兩個「從容就義」的例子。

在敍述之前，我想先介紹關於我以前一個朋友的故事，當時我曾以這個故事來鼓勵，或勸阻過幾個想要「脫離革命」的朋友。

事情發生在北平「解放」的前半年，我的朋友是被瀋陽兵工廠遣散的一個職員，以老校友的關係，住閙在北京大學的宿舍裏。在瀋陽的時候，就有些「關心」他的人，勸他到佳木斯去，可惜他却是一個被認爲「不覺悟」的「無所謂」的人，對去佳木斯非但毫無興趣，反而對去北[illegible]感到本能上的溫暖，因而滿懷興緻地來到了北平。當時的北平，擠滿了各地撤退來的公敎人員、學生、和難民，失業問題在通貨膨脹的情形下，更顯得嚴重，毫無例外地，他到了北平也就失業了。最初靠着朋友的關係還勉强地混過了一些時候，可是後來嚴重得朝無夕糧了，熱心的朋友沒有辦法，有辦法的朋友未必熱心，他生活在這種情形下，自然十分苦惱。不過，好在他是一個個性直率比較達觀的人，談諧而好放大砲，見了面還可以用說說笑笑，來掩飾他的愁眉苦臉。但是現實問題畢竟是不容情的，最後他不得已還是接受了當時對失學、失業、

失戀、都表示莫大「關心」的一些人的「關心」，作爲朋友的我們都沒有機會和他話別，只知道他是「走」了。

事隔五個月，他忽然出現在我的宿舍裏，穿着一身非常單薄的，他出走時所穿的那套衣服。見了面，彼此一時都說不出什麼話來，只是相對緊緊地握着手，我爲他找了一點冬天的衣服，到景山東街的一家小麵館裏，盪熱了幾兩白乾，然後，我以聽一部傳奇似的神情，來聽他訴說他五個月以來的情形。首先他承認，他出走以前，有人給了他一個袁大頭，並叮囑他立即到離北平四十里的一個小鎮上某一家小客棧去報到，據說那家小客棧，就是當時共產黨所設立的「平津同學招待站」，那個小鎮雖距「解放區」僅有十幾分鐘的路程，但仍在國軍的防守中。他以僅有的隨身行李，償付了一宿的店費，第二天他同兩個年紀很小的中學生，被客棧的主人送到了「解放區」的某部政治部去。

他所遭受的恐怖，已使他失去了以前的那一份詼諧，他以極其憤恨的語調，講述他這幾個月的遭遇。太難忘記了，他告訴我，他是以最大的容忍，和極端不愉快的心情，而被迫「體驗部隊生活」。他除了只能看到一張半個月以前，在張家口出版的報紙以外，其他的任何書籍雜誌，對他都是「密件」，因爲他是一個與「組織」無關的「羣衆」。

在軍中，爲了他過去的履歷和年紀，使他吃了不少的苦頭。他像一個犯人一樣在幾百人的大會上，被當做了「鬪爭」的對象，做主席的幹部用煽動羣衆的口吻，說他既在國民黨兵工廠做過組長，必定參加過「反動組織」，必定是「×統」一類的人物，膽敢混在「人民隊伍」裏，而不坦白地承認過去的罪行。並說他今年卅五歲，又在國民黨機關裏當過「官」，必定有許多小老婆，可是他在自傳上却說沒有結婚，

分明是企圖矇蔽「人民」的眼睛，而另有用心。他的任何辯白，都被認爲是掩飾身份的遁詞。他發誓，他當然還不知道發誓已被認爲屬於「封建道德」一類的東西）地說，他已經一字不遺而絕對誠實地，在自傳中記載了自己的過去。他絕不是什麼「國特」，只是在北平失了業而想來找一份工作的。這種對「革命」毫無認識的說法，更激怒了他週圍的「幹部同志」。他們對於一如罪犯的我的朋友，已毫不考慮了。只是在檢討開會的當時，羣衆情緒爲什麼沒有掌握得住？檢討的結果，認爲有再開會的必要。於是，我這位可憐的朋友，也就再第二次第三次，被當做犯人一樣地拖到會場，他在這所謂「鬪爭大會」上，已感到無話可說，而被逼得痛哭失聲。這一哭算是有了結果，做主席的幹部向大家宣佈：說我這位曾在國內著名大學畢業而素無黨派色彩的朋友，已經向「人民」懺悔了，這是他「悔過」的初步。爲「鬪爭」我這個朋友而出的牆報專刊，在沒有材料可尋的情形下，也只好對他的「哭」做了許多「新」的解釋。這種歪曲的解釋，雖爲我的朋友所不肯接受，但他認爲總比「鬪爭」的進行當中，有人大喊「拉出去槍斃」的時候，感到輕鬆了許多。最後，「幹部同志」把他交給一個連隊的指導員看管，說是幫助他「進步」。

指導員並沒有幫助他「進步」，他却幫助指導員做了許多文書工作。指導員除了指責他的「包袱」丟不掉以外，有時也不得不敬佩他那優越的工作成績。

可是那些恐怖的記憶，日常所接觸的無情的冷面孔，以及不斷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使他沒有辦法安心「革命」。最後他經過了半個月的苦心，才達成了偷渡封鎖線的目的，而做了「背叛革命」的「反革命份子」。

他講完了這個故事，帶有一點酒意地拍着我的肩膀說：他在前一天的日記上寫了這樣的一句話：「終

於我又背着我那小資產階級的包袱回到了北平！」

不幸，他回到北平的一個月，北平就「解放」了。他像嚇破了膽子的老鼠一樣，又在許多朋友不知不覺中失了踪。

當我到南工團以前，曾以這個寓言的故事同幾位教授談爲的是這恐怖的事件，曾使我不敢吃「革命」的飯，不料這些「準露臉」的教授却輕描淡寫地說：「假使眞有這樣的事情，只不過是「低級幹部」的「個別情形」而已。

事實上證明，僅在我們兵營範圍之內，就發生過不止一次這所謂的「個別情形」。

背叛「革命」的一羣

我在上節所提到不肯割掉血肉連身的「尾巴」，而寧願「從容就義」的，就是指那些不甘「志願參軍」而公開反抗的人。他們都是有血性有個性的年青人。冒着「背叛革命」「反抗組織」之險，而予極權統治者以重大打擊的。只可惜，我這裡所能叙述地，僅是當時被公開處理的一兩個例子而已。

與我同組的一個北大同學，讀法律的，平素對戲劇有過很大的興趣，他曾誤以「爲藝術而藝術」的目的，加入過北大劇藝社，那時北大劇藝社是所謂「地下工作者」的大本營之一，他却毫無所知，無形中做過許多搖旗吶喊的工作，一直到「地下工作者」暴露身份以後，他才恍如大夢初醒。當然在那些「地下工作者」邀功的時候，他仍只是被當做一個可憐的「群衆」。自從他聽到「參軍」的消息以後，屢次設法想退出南工團，結果非但沒有如願，而且替他自己以及家庭，招惹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煩惱。他非常坦白地在自傳上寫道：父親做過一任河北省小縣份的縣長，在家鄉有一所房子和十幾畝田，他是父親第二個太太生的，家鄉「解放」後，房子和土地被「鬪爭」光了，年逾七十的父親和五十八歲的生母逃來北平，指望這唯一的兒子能夠賺錢扶養他們，苟延他們的晚年。因此這位同學顧不了還差幾個月就可畢業的大學學籍，南工團來想找一份可以養活老人的工作。在「舊」社會這是一件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在「跑到新」社會裏，他的想法却被認爲太天眞，天眞得近於荒唐。他年邁的母親一天兩次地，來探望着已經「志願」當兵了的兒子，熱淚浸濕了兒子所穿的「人民」的衣裝，做母親的一邊哭一邊訴說，父親已經把那多年不開身的皮袍子送進了當舖，她那前幾年，就做好了而準備「孝老」用的衣服（即壽衣），也被父親拿去

賣了，爲的是想多延續幾天這兩個已失去生產能力的老人的生命。他會爲此幾個晚上不能睡覺，三番兩次地見過指導員和總團長，想請求准予離開南工團而另外去找工作。最初女指導員還是勸慰他說：一個「新」知識份子，不應再拖有「盡忠盡孝舊意識」的尾巴（當然，忠孝節義的思想有如地主的財產一樣，要澈底被「清算」的）。繼而警告他：「如果不割掉這些舊意識的尾巴，在新社會裡將無法生存下去。」

這時，他已深深懂得脫離「革命」，絕不像參加「革命」那樣地容易，被逼得沒有辦法時，他不再提脫離「革命」的事，而說當兵確是「志願」，但希望「組織」上，給他兩個老人一點「優待軍屬」的米糧，或者把他們介紹到難民救濟所去，指導員却拿「還沒有爲人民立功，就要先向人民索取報酬了」一類的話嘲諷他。我這個同學本來以最大的容忍，想委曲求全而能使兩位老人免於凍餒，結果各種努力都宣告失敗。他在最後一次找指導員的時候，竟跟她衝突起來，據說他同指導員說「共產黨只是說得而不幹正經事情！」，同時他非常氣憤地，責問她是不是父母生的？從此他自動地不參加小組會，不參加學習，白天睡覺夜晚則到處亂走，像一個瘋病的患者。大家都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情，果然第三天的早晨，在一個緊急召開的大會上，我們看到他低頭坐在主席位子的旁邊，指導員宣佈要大家用「民主」的方式處理一個「背叛革命」企圖「開小差」的份子，並說是昨天晚上在他企圖逃走之前被衛兵抓回的，他是不是眞的企圖逃走，我沒有辦法知道，因爲從那時起，我便失去了任何同他談話的機會。

情緒是慢慢培養的，理由也是慢慢找出來的，經過一陣可怕的沉默後，「積極份子」發言了：有人說：他這幾天以來，一直就想逃走，對「組織」的寬大與教育，竟無動於衷。

有人說：他一向是「自由散漫」而沒有「組織觀念」的一個人。

這只是一個開端，嚴重的和緊張的場面跟踵而來：

有人說他老子做過官，一定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傢伙」，他又是封建地主的兒子，思想意識「落後」，是有着一定的歷史根源。

有人說他是小老婆生的，來到這社會上，已經是不夠光榮的了。

這些還不夠具體，具體的「事實」來了：

有人證實他過去同敵僞學生來往最多，後來又同「反動」的黨團學生關係很深，他的「清白」是大可懷疑的。

有人證實他的父母是×縣逃亡出走的地主，縣裏的農會正在踏破鐵鞋無覓處，應該把他們解回本縣去處理。

後來，大會在「群情激奮」中，做了判決性的總結。

他在當天上午就與我們分手了，事後聽說「組織」上送他到東北去「學習」，他所念念不忘的老人被送回了原籍。

還有一個女同學的故事，她是從爲「擴充學員」而放假的一天起便沒有回來。「組織」對她的失踪，會表示過莫大的關切，關切的原因，絕不是爲了她個人的安危，而是「照顧」她所留下來不好的影響。許多天以後在街政府的協助下才把她找着了，她哭腫了眼睛，也免不了要開一個被認爲有「教育意義」的「會，關於她，以前的情形我知道得很少，只聽見她在大會上說會向指導員請過幾次假，可是指導員都一概不准，她從那天以後就不再想「革命」了。這次的大會，只有指導員發言，她說她不忘情於那做「反動大

軍官，已不明去處的未婚夫，極端的自私心促使她背叛「革命」，組織上雖幾經「教育說服」，她都不知悔改，封建的「貞節觀念」與「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造成了一個解不開的「包袱」，假使她再不知「覺悟」，這個「包袱」將是她最好的殉葬的禮品。指導員並宣佈准許她離開南工團，爲了使她能在「新」社會做人，並決定給她安排一個另外的「學習機會」。

聽了我的敘述，也許有人會感到非常的不滿足。不過，做爲一個「群衆」的我，事實上也只能知道這麼一點枝枝葉葉的東西。當時我常常聽到說某些人調到東北去「學習」了，某些人調到什麼地方去了，某些人因爲不堪「改造」而准他走了，我却從沒有過機會能夠同當事人說上幾句話，而屬於那些傳聞的消息，也都是當事者走了以後，才由所謂「積極份子」宣佈的。至於怎樣走的？走到那裏去？走以後的情形怎麼樣？不僅是當時，就是以後的日子裡我也沒有聽人說起過。

與老幹部一夕談

我正在參加開會的一個晚上，門房「同志」（門房「同志」都是在「華北大學」受過訓的幹部）送來一張紙條，說有個老幹部來看我，在以認識老幹部爲榮的風尚下，小組長帶有幾分驚奇與羨慕的眼光准了我的假，我匆匆地走到門口，一個長髮短鬚穿着厚棉襖的人跑過來拉着我的手說：

「不認識了吧？老樣子，你還是老樣子！」

我立即想起這是我在上海時，曾在一起生活過四年的老同學，不自禁地緊緊握着他的手。

「是你！什麼時候參加的？怎麼知道我在這裏？聽說共產黨人是六親不認的？難爲你還來看看老同學！」

「笑話，笑話，你還是那麼幽默。」

「老幹部的派頭十足！」我仔細地打量他說：「那一年參軍的？」

「八一三以後到蘇北去的。昨天聽說你在這裏，又聽說你學習得很好，很想看看你。」

「笑話，笑話」我模仿着他的口吻說：「根本沒學到東西，好，更談不到，只不過是很聽話而已。」

「你還是脫不了過去的那一套，怎麼改不掉？」

「改不掉！這許多日子，像生活在牢獄裏一樣。」

「不過，知識份子的改造，是要經過一個痛苦的過程，非要脫胎換骨不行，我最初的時候比你還不如。」

「現在呢？」

「十二年了，當然習慣得多了。」

我請他在石階上坐下，掏出一包過去老同事慰問我的美國烟，遞給他一支，他非常吃驚地說：

「這叫革什麼命！還抽這麼好的烟？」

「好什麼？美帝的東西。我們是新的志願軍，當然比你們闊一點，不瞞你說，我還積有一些舊社會的錢呢！」

「你眞是本性難移，幽默這一類的東西，都是屬于小資產階級趣味的！」

「本性難移不是唯物論者的說法，我看你的思想還有些欠通的地方吧？」

「所以我說你學習得很好。」

「老朋友見了面，我們都不必講「教條」扣「帽子」，我正有許多問題想同你談談，並且希望知道你一點眞實的情形和感想。」

「眞實？」

「因爲我覺得一個共產黨員的談話，往往都是文件上可以看到的那一套，我認爲這絕不是眞實的感情。」

「眞實感情並不一定是正確的！」

「我知道你所謂正確的意思，不過，你是不是還有一些不正確的情感呢？」

「有當然有，這是隨時都要想辦法來克服的。所以改造這件事，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也許是一輩子

的事情。」

「你所謂不正確的東西，正是我所指的有關人性的部份，消滅也好，克服也好，我認爲越澈底越不可能，也就越不合理」。

他猶豫了一下說：

「你這問題的提法就不對！」這是老幹部窮於辯論的擋箭牌之一，他所謂「提法不對」，就是不應該以這個問題與我來辯，原因是他根本否認我所說「眞實感情」和「人性」一類的東西。比如我同女指導員曾有過一次關於中蘇條約（指一九四五年所簽訂的）的辯論，我說：「無論如何這是蘇聯對中國人民的一種侵略行爲。」她就同樣地利用這個擋箭牌，使辯論不能繼續進行，因爲她在根本認識上，就否認蘇俄這樣國家會有侵略的行爲（這是不講事實，只講認識的時候了，「意識」決定「存在」也有了用處）。這是極權統治者對思想控制的方法之一，遇到他們所不能以及所不願解答的問題，就抹殺了這些問題的存在。問題的「提法」對不對，「提法」不對的，就不承認其爲問題，這在自由世界，確是聞所未聞的問題。

統治者還有一種習用的詭辯技倆，比如過去以寫詩聞名的艾青（如今已是統治者的重要幹部），在當時清華大學公開演講時，就有人提出這樣問題：過去共產黨攻擊政府打內戰，發動學生「反內戰」，今天爲什麼要把「進軍江南」和「擴大戰爭」當做「眞理」一樣的宣傳呢？提問題的人並補充一句說：「我們今天是不是可以再來反內戰呢？」這位以無病呻吟起家的詩人，一時被問得一怔，窮於應付時，只說了「本質不同」四個字。「本質不同」是用來「解釋」過去用以攻擊政府，而所謂「解放」後依然存在或是更爲嚴重的許多現象的。比如過去編了一個「五塊錢的鈔票沒有人要」的歌，來攻擊政府當時的金融政策，

不料，在北平「解放」僅一個月的時間，「人民幣」不但一塊五塊的沒有人要，連十塊百塊的很快就變成了最小額的籌碼。可是，假如有人再高唱一曲「五塊錢的鈔票沒有人要」，那一定會被當做「國特」問罪的。

下面仍是我們談話的繼續：

「不過，我想知道你到底想不想家？」我問。

「很久不通信了，有時難免會想到。」

我知道他還沒有結婚後，便直率地問他：

「那麼，難道你也不想找個女朋友？」

「這要等組織決定的。」

「我問的是想不想？」

「你的問題越來越不像話了，不談這些好不好？」

……

這只是我們當晚談話的一部份，這次談話，雖然他盡了煩縈廻避的能事，但已頗有助於我瞭解一個所謂共產黨員的輪廓。他們都是在極端矛盾與痛苦中，還殘留一點人類的眞實感情，不過，就這僅有的一點也還是被當做繼續「改造」的對象，這是一個極其殘酷的悲劇，我不僅爲我這孩提時代天眞無邪的朋友的被「改造」而悲，我更爲這一代的青年朋友而感到莫大的不幸。

關於「學習」的「總結」

你也許嫌我用太多的篇幅來記述一些瑣事，很少提到關於「學習」的事情，尤其在這被認爲是「學習」階段的最初兩個月。假如這樣想時，恕我冒昧地說一句，你是連所謂「學習」的意義還沒有弄清楚。學習，的確是嚴肅而誘人的東西。許多人以高度的希望和緊張的心情，準備迎接「學習」，有的人不惜賣掉他的「全部家當」，來換取幾本參考書；有的人購置了名貴的鋼筆和大瓶裝的墨水，有人甚至買了比大學四年所用還要多的筆記本，希望儘量接受「學習」。結果在我們被調走之前，除了偶而翻過幾本有如傳單的小冊子以外，其他的都是原封未動，「革命」的人四海爲家，原封未動的東西，也就很快地變成了必須拋棄的「包袱」！有些人「自動」地捐給了「上級」，有些人則轉贈給留在北平而沒有參加「學習」的朋友們。

多讀、多寫、多研究，那只是「半知識份子」的「舊傳統」（所謂舊社會的讀書人統被稱爲「半知識份子」）。對於被稱爲「新」知識份子的我們，「學習」則是多方面的，我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形容詞來概括，或具體化我所說的「多方面」。總之，「社會就是大學」這句話，你該不太生疏罷？對我們來說，還是稍嫌範圍小了一點，你也許想宇宙之大社會之繁，絕不是個人精力所能學得了的，那麼，你又錯了，「求甚解」是屬於「舊」範疇的東西，我們只限於對事事物物的「新」定義「新」名詞的「學習」，假如一個幹部學會了運用「反動」與「人民」兩件名詞的法寶，他的「學習」已經差不多了，其餘部份則是對「服從組織」的「學習」。

我最初就是裝了一肚子，被批評爲「正統派學習觀念」而參加「學習」的，除了聽過幾次「大課」和「報告」以外，一直覺得「學習」還沒有開始。不料有一次「上級」却要我們寫一篇「關於學習的總結」，我眞急得要繳白卷了，心裏想既沒有開始學，拿什麼東西來總結？怎樣做這個總結呢？小組長帶有幾分誇耀地向我說：「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最善於總結的」。

「總結」是所謂代替「反動」的考試制度，不過以它的强制性與時間性來看，事實上，與考試制度絕無分別。只是總結的內容不確定，上下若干年，縱橫若干里的東西都可以寫，唯一而必要的條件是「聯繫自己思想」，聯繫思想的作用，主要是以既定不變的思想來統「見仁見智」的思想，見仁見智的時代，早已成爲過去，紅旗底下，永遠是一個「看法一致」的社會。所謂「總結」，實質上就是思想的檢查制度。

總算有機會參考了一下「積極份子」的總結，使我明了「究竟學了些什麼？」和「怎樣做總結？」

拾糞草，擦地板，當然是「學習」。

學了些什麼？「勞動是偉大的」，「勞動創造了一切」，「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是不可分的」。在「總結」上則要寫明這些都是通過自己思想所認識的問題（問題當然不只我所提的三個，凡是謳歌勞動的都可以寫，批評與反對的意見則不能寫）。

吃高粱米飯和東北運來的乾菜也是「學習」，有人說最初吃不慣，完全是過去的「小資產階級」作風，接着就得說現在已經非常習慣了，而且非常喜歡吃。然後再補充一點關於這屬於「思想轉變」的經過，說已正確地認識了「無產階級」的偉大作風。有人說高粱米與乾菜都是東北人民對「革命」的熱情捐輸，吃了以後，要切記將「革命進行到底」。有人說吃高粱米以後，體重普遍增加，體重增加意味着「無產

階級糧食」，確含有極其豐富的營養量。

我們曾發過一條蘇聯出品的內褲，有些，拿這條內褲來大作文章，說這是「老大哥」的「盛情」，接着就得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生硬結論。只要「正確」，生硬是沒有關係的。

關於墻報所表揚的，和所發起的「運動」，也是「學習」。

看戲和舉行晚會以後，不但要開討論會來「學習」，就是討論會的本身也算是「學習」。

「上大課」，「聽報告」更是當然的一「學習」。

總之，一天之內除了睡覺以外，所有的事情都屬於「學習」的範圍。「舊」東西有「新」的看法，要「學習」；「新」的事物，當然更有「學習」的必要。

我一直對這些應該「學習」的東西竟毫無所知，不過，經過「參考」與「指示」以後，我擔心寫完這將近兩個月諸如這類「學習」的東西，絕不是三萬字五萬字而能竟其功的。

關於「學習」，有些人過去也許曾以「正統派的觀念」（如我所被批評的一樣），存有一些幻想和興趣，不過，一旦有機會明白了「學習」的究竟，我相信將不再會有人感到絲毫的興趣。也不再會寄與任何新奇的幻想了。其實，我所談的，還僅是統治者對大城市中知識份子，所採用較爲「文明」的一套，在鄉鎮在農村，或是在文化低落的部隊中，學習兩個字的應用，那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和談」聲中上火線

和談代表，帶給北平人民無限興奮，只可惜，興奮的事轉瞬即逝。因爲中共的權威人士，在對我們的講話中，已道盡了和談的「誠意」，並即席宣佈爲和談代表所安排的「學習」與「遊覽」的節目。那個權威幹部在結束他的講話時說：「擺在和談代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追隨死硬派反動到底，一條是向人民陣營靠攏，死亡與新生，他們有充份的選擇權利！」許多在北平的朋友已意味着，不管和談代表會不會發生「質變」的問題，但和談的結果必是繼續打下去。事實上，從統治者的備戰情緒上，我們絲毫也看不到一點「和」的跡象。報紙上盡量介紹各部隊整訓的成就，大字表揚士兵「解放江南的決心書」，各學校各機關「志願支援戰爭」的函電有如雪片飛來，不明內幕的人，在這些內容一律的函電上，只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統治者原無意於戰爭，不過，迫於「人民」要求，勢必要繼續打下去。但對知識份子來說，玩弄民意者的技倆並不高明，因爲沒有人會相信這件事。和談代表被關在北京飯店裏，他們已經失去了和談的對象，同時，更失去了行動的自由，正如那位權威幹部所說，他們除了「遊覽」，便只有「學習」。張文白在以後「悔過」的文章中曾證實了這些，他說這是他幾十年來的戎馬生活中首次感到無事可做的煩惱。他又說在這期間他「遊覽」了所有北平的名勝古蹟，聽遍了所有名角的京戲。最後他提到毛澤東曾非常嚴肅地向他說：「你們不必回南京去了，我們再來一次國共合作吧！」只是他沒有提到這「嚴肅」兩個字，是包含着多少恐怖與强制的成份，更沒有說明他是身負和談重任的代表，却感到無事可做的原因。

就是在北平報紙上，登出二十四個「和平條款」的那天，中隊長和指導員叫我準備第二天清早出發，出發到什麼地方去，去幹什麼工作，都屬於軍事機密，我是無權過問的。「服從組織」是「組織紀律」，「服從命令」是「民主集中」，「紀律」與「民主」，豈容講價還價，說走就得走，僅有不足二十四個小時的時間，不容多所考慮。如此意外的一件事，不僅是我個人覺得突如其來和過於急迫，其他的人，也沒有一個不感到奇怪的，因爲頭天晚上我們還在討論一些非常瑣屑的生活問題，而在整個大隊裏也沒有一點調動的預感。

中隊長並告訴我，當天的下午我同其他調走的幾個人，可以「集體外出」，晚上必須集體回來。最後他問我還有沒有什麼話說，這時，他彷彿是以關心與徵求意見的口吻來問我。不過，我已經熟習了他那一套，我縱然有天大的理由，也絕不可能扭轉他的所謂「命令」，只不過想以徵詢意見爲名，來打通一下思想而已。雖然如此，我還是提出幾個不願意去的理由和問題。下面是我同他最後的一次談話：

我：「我參加工作的當時，只想找一份工作，那怕職位再小，我需要的是安定。」

他：「難道你到現在，還不知道這是不正確的僱傭觀念麼？過往的事，不再提了。」

我：「那麼這次調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到前面去，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

我：「我是北方人，我從沒有想離開北方的打算。」

他：「小組裡反映，說你學習得很好，怎麼還拖有狹隘地域觀念的尾巴呢？」

我：「可是，我的妹妹在北方，她必須由我來扶養的。」

他：「丟不掉的包袱又來了，妹妹可以做工，可以參加學習，用一句舊話說，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了。」

我：「但是，這個包袱是必須要解決的呀！」

他：「組織上可以寫封信給縣政府，託他們代爲照顧一下。」（以後證明他當時只是一種敷衍）。

我：「我認爲我不能擔任任何新的工作，因爲我根本沒有學到一點東西。」

他：「這只是你很虛心。」

我：「那麼，我究竟學到了些什麼？」

他：「那也不妨，以後在部隊裏，還可以學習，活到老，學不了的。」

我：「唔，原來是這樣的學習！」

他：「我們就是主張隨時隨地要學習的。」

我：「那麼調我去做什麼工作呢？上火線麼？」

他：「當然是到前方去，也許是幹文字工作，我不大知道。」

我：「可是，我對文字工作根本沒興趣。」

他：「個人興趣是不能提的。」

我：「我的痔瘡很嚴重，怎能長途行軍呢？」

他：「前面（指途中）有醫院，組織上會照顧的。」（我的痔瘡果然在行軍途中嚴重起來，除了一兩

個同「志」的精神「照顧」以外，我得不到一點藥物，一直拖了兩個多月。）

我：「爲什麼調動幹部要這樣機密和急促呢？」

他：「這些我都不知道。」

以後的日子裏，我找到了這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極權統治者調動幹部，所以機密與急迫的原因，是避免幹部强調個人志趣有所選擇，或不願去而「鬧情緒」，當然，這只是剝奪就業自由的一種輔助手段而已。事實上所謂「命令」是早經安排妥當，臨時（有時僅在調動的前幾小時或是即時就必須捲舖蓋出發的）宣佈，是不允有任何考慮時間的，同時領導幹部再以所謂「革命」大道理的「教條」和「帽子」，來激將或打通思想，等被調動的人，能冷靜地想一下時已經是太晚了。這樣「高明」的辦法，當然還僅是限於對付所謂知識份子幹部的。

當時他是用空前未有的笑臉，來達到他完成「打通思想」的任務，他並告訴我，按照我的國立大學教職員的資歷，「組織」已決定在以後的工作中酌爲提高我的「生活待遇」，這在他認爲也許更能幫助打通我的思想。就這樣，我同來自各個大隊的三十二個「同志」，在「和平談判」宣告決裂的那天早晨，被裝上南下的火車，報紙上已經顯著地刊有朱毛的「渡江命令」了。

走進鐵幕的中樞

有人把極權統治者，在中國大陸上，所建立與外間世界隔絕的屏障叫做「竹幕」，認爲比指稱蘇聯的鐵幕更適宜於中國。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中共所建立的屏障，遠不如蘇聯以及其他衛星國那樣堅強，因爲漫長而脆弱的海岸線，和留居海外爲數甚衆的華僑，將使這屏障產生一些無可避免的漏洞。從某一時期的現象上來看，這一類的說法也許是不無道理的，但殊不知中國大陸統治者正致力於堵塞陋洞工作，自從我逃出鐵幕而來到海外時，深深感覺得兩個世界隔絕的程度絕非「竹幕」的意義所能概括。固然，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關於大陸的消息，但就我所能證實的部份看來，大部份是大陸上已被公開的一些消息，和憑個人主觀的些微傳聞，如果把這些消息和傳聞當做鐵幕的漏洞，我認爲是無助於瞭解極權統治者的眞面貌的。在中英交界的深圳，携有一份香港出版的報紙，是足以影響到舉家安危的。在東南沿海的任何一個地方，許多僑眷談論來自海外或國民黨的消息時，也經常被逮捕而當「國特」問罪。這只是屬於封鎖的一面，形成鐵幕的另一面（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極權區內的新聞控制了。被尊稱爲「人民」的人民，絕可不能從新聞的夾縫中，窺測統治者的眞實動向，任何臆斷和揣測都足以構成嚴重的犯罪。

新聞控制是極權統治者最狠毒的武器，是抹殺事實、歪曲事實、欺騙人民、愚矇人民，最有効的工具。在中國大陸上，包辦這「新聞控制」工作的，是屬於鐵幕神經中樞的「新華通訊社」。

「新華社」是僅次於「塔斯社」，規模最大的「新聞製造公司」。

經過了一整夜的火車旅程，我知道已經被派在這家大公司的一個支店裏當一名夥計。公司的全名是「

新華社第四野戰軍總分社」，我們的職別是「隨軍記者」。宣佈這個消息的幹部曾特別强調地指出，我們都是屬於「見習性質」，因爲今天我們做了「人民記者」，與過去「帮兇」與「帮閒」的「反動記者」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

在火車上我們卅二個人，重新被劃分了三個小組，這次派來的小組長，並不像以前那些所謂「積極份子」的「地下工作者」，這次派來的三個人，都是有着十年以上「歷史」的老幹部，而且都是或多或少有些新聞工作經驗的。三個小組的總領導人物，是一個「新華總社特派記者」，據說是一個頗得「中央」重視的「新聞作家」。當我們三十幾個人擠在半節車廂中，他的專用小車佔有了另外的一半，前一節車中，還有他的寫作間，另外歸他節制的是一個臨時性的車中電臺。我最初和他在車站上見面的時候，已經知道他是一個「大人物」了，他穿着一身畢挺的羅斯福呢軍便裝，外面披了一件美軍茄克，從他紅白分明的面孔和文雅而嚴肅的風度上，我們可以預測一點關於他生活優異的情形，同時他絕不是如「組織」上所要求的出身工農或是參與實際勞動的老幹部。後來證實了我的看法，他是所謂「吃小灶」的「師級幹部」，是抗戰前在上海寫文章，抗戰後在延安寫文章的一個「文化人」，列車中有他專用的炊事員、警衛員、通訊員和司機。

一晝夜的車中生活（一晝夜僅指時間，行程只是由北平經天津而停在楊柳青），我已和同命運的三十幾個「同志」，曾有過「廣泛的交談」。

我們一行是南工團一萬多個人中，首次被調赴前線的一批。

我們被調遣的主要原因，據說是每個人在自傳中，都提到有文字工作的經驗。我的自傳中，就寫有曾爲重慶某報寫過通訊的幾句話。

我們以各式各樣的心情，來接受「新」的工作。

「積極份子」感到做一個「人民記者」是「上級」特予的「殊榮」。

「文化水準」差一點的人（其中有二個東北流亡的中學生），爲這個「嚴肅」的工作而感到不能勝任的「不愉快」。

「思想」不大「通」的人，對這未經徵求同意的工作不感到興趣。

「思想不通」的人，聽說「人民記者」也是僅供食宿的所謂「供給制」而感到失望。

……。

有些人就在「廣泛交談」中都不表示任何意見，擠在車廂的一角睡悶頭覺。

我們雖然走進了鐵幕的神經中樞，但是「人民記者」幹些什麼？「新工作」的內容又是什麼？還有待於第二個「謎」的揭曉，以往的經驗教訓了我們，有根據或無根據的推測，都只有招致被「批評」的後果而於事無補的。

一些不愉快的回憶

在北平的時候，曾經有個年歲小的女同學，在指導員面前玩皮地學着「扭秧歌」的步調，唱着她自編的詞句：「高粱米飯難下嚥，翻身要喊一二三」。雖然遭到指導員的「思想整肅」，而被認爲充份暴露了「小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但這兩句話確確實實是我們當時生活的寫照。「高粱米飯難下嚥」的事實，經過「學習」後已轉變爲「喜歡下嚥」和「下嚥了都一致說好」的階段，可是睡覺問題始終沒有辦法解決，每人一尺不到的地板床位，只好在互相容忍與緊縮的情形下方可以「一宿無話」，假如有人要翻一個身，那却萬萬使不得，牽一髮而動全局，除非叫醒全條陣線的睡覺「同志」，經過「一二三」分解而一致的動作後才能達成目的。這跟我們睡在南下的火車裏的情形不相上下，白天我們還能遵照指定的坐位擠在「硬席」上（共區火車已無一二三等之分，而用「軟席」「硬席」表示其等級，不過，我們所乘的那節車廂只是有蓋的貨車，我所指「硬席」乃車板之謂），晚上便只好肩靠肩，背靠背地睡一下，假如有人放肆地伸出一條腿去，那落脚地方一定是另外一個人的臉上。我們三十二個所謂「人民記者」中，是包括了十一個女同業。車中生活正像後來一位燕大新聞系女同學所記述的，「像搖煤球一樣的」，當然她的文章也不免要遭到「思想性不强」與「帮閑趣味」的批評。（在這被認爲「人民翻身大時代」中，執筆寫文章那怕是無關緊要一兩個字的形容詞，也必須考慮到所謂「階級意識」，不如此便失去了「立場」）。

列車中的擁擠，只限於新幹部和低級人員，因爲「領導幹部」曾諄諄地告誡我們說：「苦難是英雄試鍊的麵包！」「吃得苦中苦」這半句話還是有它一定的用處，雖然接連而來的半句是被澈底地否定了。也

正如領導幹部怕我們誤想做「英雄」時，而予「英雄」兩個字的新解釋一樣。他指出他所謂「英雄」是「人民英雄」，是「集體英雄主義」的「英雄」。

當我們以「人民英雄」自居時，對於在列車中，那些佔有寬濶地位的非「英雄」人物，也就毫無怨言了。事實上我們更知道假如對「首長」或「首長愛人」（已婚稱「愛人」，未婚稱「同志」），計較生活上的待遇時，那是犯了一種所謂「平均主義」的嚴重錯誤。

這時是北中國的寒寒季節，炭酸氣和貼身的擁擠，造成了車廂中的「溫暖」，我同幾個沒有「組織關係」的同業又開始了「海闊天空地誇誇其談」（工農幹部指責知識份子的習用語），在「暖室」中，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又在發酵了。

大家不約而同地談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就是在離開北平的前夕，我們被「鑑定」的情形。那天晚上我們都會分別參與自己小組的「鑑定會」，與會的人都必須對調走的「同志」有所「批判」，當然會中「積極份子」的發言將做爲第二步「組織鑑定」的依據。

一個在大學做過助教的「同志」，告訴我關於他的「鑑定」。

「……一直到現在他還保有「洋奴主義」的「鍍金思想」，這是「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官僚買辦階級」，所遺留給他的「毒素」。當這「毒素」還沒有清除的時候，他不可能更進一步的「覺悟」。」

一個家庭比較富裕的女「同志」，非常不服氣「組織」所給她的「鑑定」，因爲在她的「鑑定書」上，寫有這樣幾句她認爲非常恐怖的話：

「她是從父親貪污來的錢堆裏，和農民的血汗中滾起來的所謂「大家閨秀」，左奴右婢的生活使她不

敢面對現實，她是把參加「革命」竟當做了生命的冒險。……」

一個清華大學外語系的華僑學生的「鑑定」：

「他躺在馬來亞橡園中的沙發上時，從沒有意識到「人民革命」是怎麼回事。「帝國主義」的長期統制，使他已非常習慣於殖民地的生活，這次他顯然是抱着「來看看」的態度而參加「革命」的，結果總算好，是「看」進來了。不過，一直到現在他還有一種嚴重的「不入伍思想」……。」

一個年僅十九歲的東北流亡學生的「鑑定」：

「他是「封建」地主的兒子，東北「解放」後，爲了逃避「人民」的「清算」，跑到了北平，可是「革命」形勢的發展，將追踪他到天涯海角……經過了兩個月的「學習」，他總算有了一點「進步」，今後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將是他向「人民贖罪」的僅有機會了……」。

這是每個人必須承受的一套，關於我的「鑑定」，還記得有這麼幾句話：

「賤視「勞動」的「舊」知識份子，帶有不正確的「僱傭觀念」來參加「革命」的，「舊」社會的影響使他「消極」，一個「無原則」和缺乏「鬪爭性」的「好人主義」者……」

因爲我是既無家庭又無黨派而被認爲相當「乾淨」的一個人，獲有「鑑定」特權的「積極份子」，只好向我本身開刀，「僱傭觀念」是指我單純爲找工作而來的「不正確」思想。

「無原則」是說我從未把「積極份子」與「群衆」從「本質」上分開來看，對所謂「落後」的「群衆」不進行「鬪爭」，而見面時竟與「積極份子」同等看待，這就叫做缺乏「鬪爭性」。

「好人主義」在「新」社會裏是一個不好的名詞。

「鑑定書」是各級幹部調職（辭職與離職是不被准許的）前，必須獲得的「證件」，也是調任以後的機構，對幹部做承先啓後的「考核」的重要資料。

在火車中，我們曾以太多的時間談論這已成過去的一些事情，每個人都非常不愉快而且不服氣，又非常擔心這樣惡劣的「鑑定」不知將帶來甚麼樣的後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民主」紀念地的傳奇

火車又經過了一晝夜，停在滄縣以南的一個小站——泊頭，我們有機會下車來，舒展一下蜷曲兩晝夜的身體。這是華北平原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走到附近一條小河邊去洗洗臉，感到說不出的輕鬆。我們小組長（我已被編入新聞工作隊第三小組），在幾個女同業（同業兩個字被認爲是「無原則」的稱呼，原諒我還是非常習慣地沿用它）面前，指手劃脚地講着「革命」的掌故。據說這個僅有幾間茅草房的小車站，以是當年「民主人物」進出口的轉運站。許多平津一帶的青年，由這裏向西南步行幾十里後，可以到所謂「冀南邊區」去，或是由這裏沿鐵路線南下，可到華東一帶的「老解放區」去。正如石家莊附近的正定，不及北平到通州路上的一個小村鎭（鎭名我已不復記憶），同樣被稱爲是「民主紀念地」。也正是當年在學校裏，機關裏，工廠裏，鼓動罷課罷工的「地下工作」份子地遁的洞口，和許多被欺矇與被誘騙的青年失踪的牢門。

泊頭，一如津浦路其他小站一樣的荒凉，可是却會使罪惡的人感到愉快，愉快的人感到恐怖的一個竟平凡的地方。小組長興緻勃勃地，攜同小組裡幾個女「同志」，到車站附近小村落去，做一次「紀念地」的巡禮。

我們小組長是四川人，初中畢業，做過幾年小學教員，以後便參加了「革命」。對出身北平著名學府的新知識份子「同志」，有無限羨慕，也有無限嫉妒，是一個自視頗高的小「作家」，不脫「小資產階級」的老調，在延安「整三風」（所謂黨風、文風、學風）的時候，聽說他吃過一些苦頭。他的「自由主

義」作風，使他做過苦工，參加過「整肅」訓練。毛澤東曾宣佈過「自由主義」者的十一大「罪狀」，據說他在「整三風」「杏思想」的時候，竟被認爲是一身犯有十大「罪狀」的幹部。因此在他的「革命功勛」上，也大大地打了折扣，現在還只是一個「營級幹部」，他還不夠「結婚」的資格，所以對女「同志」有着本能上的興趣，尤其是那個被認爲出身「大家閨秀」的蘇州小妞。

我隨在後面，參加了那次關於「民主」紀念地的巡禮。當小組長注意到我時，立即變爲嚴厲地對我說：「人民記者要隨時隨地搜集材料，今天就作爲我們採訪的第一課好吧？」

我點點頭，接着他非常熟習地告訴我們，他所手指的一座草棚，當年曾有一個「覺悟」程度很高的老大娘，和她的獨生子住在裡面，以賣鹹鷄蛋和茶水爲掩護，主持「轉運」工作。車站站長和憲警，都和她們混得很熟悉，沒有列車經過的時候，他們都喜歡到草棚裏和她們母子倆聊天，一杯茶水兩隻鹹蛋的「賄賂」，曾解決過她不少「工作」上的困難。當時我非常想看看這位具有「高度階級覺悟」的老大娘是什麼樣子，小組長卻說她現在已經做了「農會」的主席，還曾經到北平去見過許多「大人物」，兒子也做了「縣委」，分了田，討了老婆。小組長又低聲地說，這個老大娘的樣子，像其他村婦一樣，可是非常能幹，在敵僞時代爲了「工作」上的便利，曾開過一家烟館，生意很不壞，也很替「組織」上賺過一些錢。最後他才告訴我們說，這個老大娘還是「五四時代」裹小腳，念過洋學堂的知識份子，後來同丈夫離了婚才加入「組織」的，她以前不僅是一個「轉運者」，而且是一個「組織者」。單單在泊頭一個地方，就有不止十年的工作歷史了。

另外他又講了一個故事，說有青年夫婦兩個人，攜同他們的孩子，經過「介紹」到這裏來，過多的行

李和孩子變成了他們的絆脚石，夫婦兩人在小客棧裏，爭吵不休，後來經過「組織」的仲裁，才將女的送到延安去，男的則被送到葉挺的部下去做幹部，小孩子和行李由「組織」主留下，當時主持仲裁的就是那位老大娘，而那個做「縣委」的幹部，也就是當年那對青年夫婦所遺棄的孩子。

幾個女同業，幾乎是屏止了呼吸來聽完這些近於傳奇的故事，不過，我却有些懷疑這故事的眞實性。小組長在大家追問的情形下，他終於說出了這個故事的來源，在抗戰勝利後，他本人曾被派去北平做「工作」，並曾在老大娘的家裏歇過脚，同時這次在北平時，又專訪過那位老大娘。

「那一對青年夫婦的消息呢？」一個女同業問。

「現在還沒有辦法知道。」小組長忽然收斂了他那付興奮的精神，因爲他已意識到自己又犯了一次所謂「自由主義」的毛病。

這個故事，一直到現在，還留給我非常鮮明的記憶，這裡，我簡單地把它寫出來，希望能藉此瞭解一點極權統治者的陰謀奪取政權，已是蓄意很久很久的事了。

「人民記者」處女作

沒有人會知道我們的行程將終止在那裏，每個人只是糢糊地意識到正在「南下途中」，也正如一首被認爲足以「鼓舞鬪志」的歌詞中告訴我們的一樣：「無數，無數，無數的英雄，無數的行列！」接連還有一句：「前進，前進，向南方，向着南方！」（無數與南方的確切意義當然都屬於軍事秘密）有人在火車上偶而感傷地關懷着自己的命運時，他將會得到一個幽默的答案：「跟隨着「無數」向「南方」前進！」

車中無日夜！又是一天的早上我們經過了泰安在南驛下車，據說是爲了躲警報。利用躲警報的時間，我們被指定做第一次的採訪。自宣佈的那天起，我們已經做了「人民」的記者，一方面聘用，一方面同意那是完全屬於「形式主義」的東西，「一言爲定」代替了「就職」的任何手續。我們這時都已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一點所謂「人民記者」的內容，採訪與寫新聞，這與「舊」社會是相同的，「本質」上不同而是「集體採訪」和「指定採訪」（自由採訪是不被准許的）；新聞寫就以後，還得要經過小組「研究」和「組織」通過。這一些必要的業務常識，要感謝那個份屬老同業的小組長，他曾一再地對我們講解過所謂「人民記者」。

小組長指定我們每三個人一小組，到附近村落去採訪，回來以後每個人必須寫一篇報告。他並强調地說：採訪的對象雖屬相同，但每個人的文章不一定相同，因爲必須「聯繫自己思想」。這也許不難看出所謂「採訪」絕不是單純地去找新聞，新聞中必須包含「有立場」的評論，並聯繫被認爲是自己的，實質上大家必須一致的思想。當然，我們都是一些「人民採訪」的生手，還都在「思想意識」中，所謂「ネ

乾淨」的東西，這時自然還可藉此來被剔除一下。

南驛是泰山南部的一個小鎮，舉目四望，我們很難找到夠分配的村落，好在晚上才會開車，我們三人小組邊走邊談地去發掘「對象」。三個人中，只有我算是一個北方人，一個是曾在上海做過銀號職員的女「積極份子」，一口比溫州話還難懂的浙江口音，另一個是清華畢業的華僑學生，原籍福建，不過，他還可以講一點我可以聽得懂的國語，三個人一致決定，由我來權充通譯。

走了多少路，已經不記得了，我們總算找到了一個村落，非常意外地村中不是鷄犬相聞，而是靜悄悄地猫雀無聲。我們冒昧地撞進一個有炊烟而沒有房門的人家去，有位老大娘在拉「風箱」，當她揉揉眼睛看清楚我們三個人的時候，却吃了一驚，請注意我同其他兩個「同志」，都是穿着所謂「人民解放軍」的軍裝的。爲了免除她的驚懼，我說我們只是來討一點水喝的。

她從鍋裏取出三大碗滾熱的水，我們自己拉過一條凳子坐下來，二三個流着鼻涕，手脚都是皮包骨，却生有像患膨脹病一樣大肚子的小孩子，帶着又好奇又害怕的神情，站在門檻外面看着我們。

女「積極份子」首先發言：

「老大娘，你對「解放」後有什麼感想呀？現在是老百姓「翻身」啦！」

雖爲了這個通譯，因爲我所遭遇的困難不單是語言，而是「通俗化」的問題。想了一會兒，我改換幾個字眼才向那位老大娘做了「傳達」，但是她是南驛土生土長的老太婆，對我這只能算是普通話的國語也並不能完全接受。總算我一再重複地說，並加上許多手式，她才明白了一點。但她對「解放」竟毫無所知只聽說打過一次仗，聽見過幾聲砲響，知道又來了軍隊，又要繳糧，如是而已。

女「積極」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像逼問口供似地說：

「你們對「解放軍」怎麼樣？」

老太婆看看她又看看我，還沒等我傳譯就連聲地說：「好，好，好！」

「怎麼好？」女同業在做進一步的「採訪」。

「好，好！」老太婆顯然是沒聽懂她的話，有點又恐懼又不勝其煩地在忙着她自己的事情。因爲她那開了鍋的水又冷了，鍋底的柴燼也熄了。

我示意給那位女同業請她代爲拉「風箱」，老太婆才坐過來同我談了幾句話，她告訴我，丈夫生前給人家做短工，現在家裏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出去幫工去了，全家的財產只是這麼一間殘破的草房，田地連一壠都沒有，她自己紡線和兒子做工勉强混日子過。

老太婆爲了表示感謝我那位女同業，曾誤叫了一聲「太太」，頗使我們的女同業不愉快，我們也就這樣地離開了那個農家，歸途中她還有點餘怒未息地對我說：

「這個老大娘怎麼這樣地不覺悟？」

「可是，她的「階級成份」（指是屬於所謂貧僱農一類的人家）倒非常好。」我微笑着對她說。

走回車站我們已經是最後的三個人，其餘的「同志」，在第一組的小組長領導下開「檢討會」。聽說有三個人竟跑進高大院牆的人家去採訪，還喝了人家的茶，抽了人家的烟。小組長指出：這是沒有站穩「立場」的「受賄行爲」。他又說：「高大院牆顯然是地主之家；同這幾千年來的封建孽主打交代，是革命所不准許的，而且是犯了原則上的嚴重錯誤……」

這時，女「積極份子」走近我的身邊，笑着對我說：

「今天我們所採訪的對象，倒是非常的正確！」

我沒有說話，我却在擔心怎樣來完成這第一篇「人民採訪」的報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有冕的無冕皇帝

新聞記者在「舊」社會是一種高尚的自由職業，記者本人可以不必染有任何政治色彩，置身新聞之外，將所發生的事件，向他的讀者們作客觀的報導與分析。正因爲這樣，記者才有了崇高的社會地位，但是，也正因爲這樣，在所謂「新社會」中，才有了不可原恕的「罪名」。老百姓的「落後意識」，以及「死硬到底的不覺悟」，記者是僅次於「舊統治階級」的「幫兇」。這原是不足爲奇的，正如極權統治者自己所說：在這「翻天覆地」的大時代中，萬事萬物必須更「新」。自由被否定了，自由職業的名詞當然也就在紅色字典被剔除，何況職業二字被認爲含有太濃厚的「僱傭觀念」呢？

過去被認爲高尚的自由職業者如律師、醫生教授和新聞記者，如今都有了改變。律師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連「自新」或「改造」的機會都沒有；醫生也被迫把政治元素揉進西藥和針水裏去；教授和教員們則做了「宣揚政策」的工具；新聞記者們（包括編採人員），也險些是連「被改造」的機會都找不到，以前的工作經驗和理論基礎都必須當「包袱」一樣地丟掉。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教授們，可能開宗明義地就告誡過他的學生：「新聞不是評論！」（News is not Reviews）在「人民世紀」裡首先被批判的，也就是這些「無立場」的「有聞必錄」的觀點。因而，被尊稱爲無冕之王的新聞記者，很難得有機會在「新」社會裏能夠復業的。假如是天無絕人之路，有了復業的「生機」（那必是經過「學習」「改造」而「覺悟」「進步」的少數），一定要被迫接受極權統治者所給予的「新冕」，無冕皇帝的名字千萬不能再提起，因爲已經做了「人民記者」。「人民」這頂漂亮的帽子，一如它的各種用處一樣，乃是指一定的「政治意義」。

在鄭州時，我曾與一個在重慶新華日報做過外勤記者的幹部，談過新聞的準確性與時間性必須兼顧一類的問題，他就特殊强調過新聞的「準確性」。我毫無成見反對新聞的必須準確，只不過他所謂的「準確性」，並不是指忠實的報導，而是說新聞的「正確性」，所謂「正確」，就是必須與統治者的意見一致，正如他所解釋構成「正確」的三個條件：「無產階級」的「立場」；「唯物論」的「觀點」；和「辯證」的寫作方法。假如你明白了這些，對所謂「人民」記者的「殊榮」，也就未必敢領教了。

這位曾以一張名片，在重慶向各黨派和各機關刺探過「新聞」的記者，非常自負地同我說：「資產階級」的記者只能「說明」世界，我們的記者乃是「改造」世界。

「改造」世界，是多麼動聽的名詞！可是我在以後的實踐中，明白了所謂「改造」只是把一切「舊」事物給予「新」評價而已，過去認爲不合理的要改爲合理，過去認爲合理的要改爲不合理，新的變舊，舊的變新，「改造」世界的關鍵就在魔術師的那張氈子。魔術師靠着那張氈子曾吸引過很多的觀衆並賺過他們不少的錢。

南下途中，我們聽過不少「大人物」關於「人民新聞事業」的高見：

一個專門搞「群衆運動」起家的宣傳部長說：「新」的新聞工作，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人民」。具體的內容必須是「宣揚政策」和「鼓舞鬪志」（包括戰爭與一般階級鬪爭）。

唯一留美的「中央委員」洛甫「同志」，在講述「人民記者」的「鬪爭性」，「宣傳性」與「組織性」以後，更赤裸裸地說：「人民記者」的具體任務，也就是黨的政策傳達者。

領導幹部曾鄭重地宣佈：記者是「中央」最重視的工作，一經做了記者，就是一輩子的工作，改行是

不可能的（辭職更不可能了），任何調動都必須得到「中央」的批准（如此重視，眞令人受「寵」着驚，因爲我們都是在火車上才被宣佈爲記者的，當時，許多人聽到一輩子不能改行的話，確有說不出的恐怖）。

中原地區「機關報」的經理「同志」更坦白地說：在新聞工作上花費了這樣大的本錢，爲什麼？正是我們把軍中新聞工作當做戰鬪力的一部份，「鼓舞鬪志」的工作是贏得戰爭的必要條件。

我毫無增損地介紹了這些人的「高見」，是想說明極權統治區內的新聞記者，已不再是什麼自由職業的無冕之王了，而被迫做了統治者的宣傳員。所謂帶着「人民」之冕的記者，其政治意義也就可以在這裏找到答案了。

當然，在這曹孟德變爲「民族英雄」，潘金蓮做了「婦女領袖」的大時代，豈止是新聞記者有了「本質」上的改變，所有執筆寫文章的人，有那一個能逃脫這同一的命運呢？

被批評的與被表揚的

我們一篇「人民記者」的處女作，到鄭州的時候才完成，三十幾篇文章果如所要求的那樣，各有巧妙不同，有人記述從北平到鄭州的觀感，有人只敘述一兩個小故事或被訪問的一兩個人，有人則綜合了沿途同樣性質的事情，寫成一篇「典型」的報導。

文章交卷以後，經過小組「研究」，再拿到大組去「研究」。過去一些不願意人家看她們文章的女「同志」，此刻也只好壯大了膽子緊張地去接受別人的「批判」。

一個女「同志」在她的文章中，提到十年之中走過了兩次津浦路而有無限感慨，不料「無限感慨」四個字，竟引起了軒然大波，而那位女「同志」也就變成了衆矢之的。小組長質問她「感慨」兩個字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她却又羞又緊張地說不出話來。

組長接着嚴厲地指出：感慨兩個字是含有留戀過去的情緒，也就是說「新」的一切不如「舊」的，這是一種嚴重的「不覺悟」的詞句。

「積極份子」支持組長的意見說：假如這位女「同志」有一定的「覺悟」程度的話，應該發現今天同過去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新」社會的事物，給她的絕不是「無限感慨」，而應該是「無限興奮」。

開會必須普遍發言，發言的結果，一致贊成上面的分析。

最後，由一個「好人主義者」帶有原宥的口吻來做了結束。他說：這是屬於「舊」社會文人無病呻的一類東西，也許還不致於牽扯到作者的「立場」問題。

另一篇有問題的文章也是女「同志」的，她用太多的篇幅記述一些沿途的風景和越走雨水越多的天氣。組長提出意見：這是只談風月不談政治的「舊」意識，是避重就輕不敢暴露自己思想的文字。

經過分析後，他又直接質問原作者，問她寫這篇報導的意思，究竟是贊成什麼？或是反對什麼？「贊成什麼？反對什麼？」是「人民」記者在任何報導中必須具有的「內容」，這「內容」必須明顯地表示出作者的態度。小組長「同志」，幾乎在每篇文章，甚至於每句話被「研究」時，都提出這兩個問題，一直要得到他認爲滿意的答覆爲止，因爲不贊成什麼不反對什麼的作者，是被認爲沒有「思想」的。這兩句話，以後幾乎變成了我們的口頭禪，當你每說一句話的時候，就會有人質問你，贊成什麼和反對什麼？

當然，這些只是極其輕微的。嚴重一些的，譬如有人寫了某一個戰士害怕到南方並非常懷念家鄉；有人介紹洛陽「解放」後一個搶來的真實故事，那是更遭到嚴厲的「批評」。

有人在文章中寫了這樣一句話：這次行軍使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光明面」。

這句話也受有了很大的「批評」，組長是用邏輯上的道理來找出這句話的毛病，他提出了兩個問題質問原作者：行軍以前沒有看見過「新」中國的「光明面」麼？難道「新」中國還有黑暗的一面麼？

「人民」記者的專職是「歌頌革命」與「鼓舞鬪志」的，「黑暗面」是根本不許提的，同時也是被認爲在「革命陣營」中不存在的東西。我曾與小組長談過這一類的問題，他認爲黑暗兩個字，是「資產階級」字典裏專有的名詞，絕不適宜於「革命陣營」的。「革命隊伍」可能有的，那只是缺點與錯誤。我當時忍住了氣，接受了他的結論，不過，我覺得自負自驕的病態心理，將是極權統治者的致命傷。

受表揚的當然是屬於那歌頌「光明」的作品了。

最受表揚的是一篇以「中原人民熱烈支前」爲題的文章，其中被認爲最能代表「人民感情」的一段，是作者記述在徐州時曾有許多農民和工人紛紛向他表示：

「寧願挨餓受凍，也要支援打反動派！」

「把反動派澈底消滅，我們可有好日子過了，就是再討幾年飯，我們都高興！」。

「組織上」對他能把工人農人的「熱烈支前的感情」綜合成一個極能代表「人民」語言的標語也備加讚揚，這標語就是：「全心全意全力全面支援前線！」

許多人都自嘆不如，並非常佩服他的「觀察」深刻和「接觸」廣泛。在他的文章裏面不斷地出現工人農人對他怎樣說，而這些表示和談話都做了我們這些「同志」所要寫的中心材料，這時「組織」七當然不會苛求，那些工人農人的詳細住址和確實姓名了。

幸好我有機會與這位作者做了同路人，不然的話，我也將要被他的文章所感動，我原意打算寫一點津浦隴海沿線農民苦況的文章，也可能因此而擱筆了。

中原地區印象記

被稱爲「中原區」的地方，東起津浦路的蚌埠，西止秦嶺；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包括二百二十個縣，五千五百萬人口。我們在這個區內走過了三條鐵路幹線（津浦、隴海、平漢）和五個省份（部份或全部）。這地區正是過去李先念，劉伯承打游擊起家的地方，而現在又被統治者認爲，想起家的游擊部隊最多的地方。統治者在「剿」不勝「剿」的時候，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帶的民性強悍，當地的老百姓，不是「誰來了就給誰納進」；而是「誰來了就與誰爲敵。」

從北平南下，雖然感到天氣慢慢地暖了，雨水也慢慢地多了，但是，大半還是北方風味。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北方人，我睡過黃土坑，吃過高粱麵的饃饃，我有過北方農村生活的經歷。自滄縣以南，我也經常有機會走進農家，可是，一片淒凉的景象已經使我有幾分陌生。我的一身「戎裝」帶給老百姓的，只有驚懼和不理睬，難怪有些所謂「積壞份子」，要咒詛當地人民的「覺悟」程度不夠了。

經過天津車站的時候，我看到很多沒人收容的病兵和乞丐，披着破舊的麻袋，躲在車站上避風的一角有的冷得發抖，有的在呻吟。我正非常同情地望着他們，小組長走上前來，對我發表意見。那些可憐的病兵，他認爲都曾是「爲非作歹」的「反動派爪牙」，現在的下場是「罪有應得」，絕不能無原則地可憐他們。關於乞丐，他却非常肯定地說：「這是新區，老解放區就沒有乞丐了！」可是當我在所謂「老區」的德州看見更多貧窮無依的乞丐時，我非常興奮地拉着他出去看，他却首先批評了我的態度，然後才低聲地說：「這都是國民黨放過來的！」我想你也許可以明白，我的興奮僅僅是在找到可以揭穿謊言的證據時，

所難免的一種情緒。在山東境內，糧食和壯年男人，已是難得見到的了，揀柴拾糞挑水下田都是一些婦女和上了年紀的老人。榆樹葉子變成了他們一天兩餐「稀糊粥」的主要原料，對他們來說吃得飽已經是奢侈的事，他們只是用一點流汁的東西來延續生命，內心則默禱着另外一個好的天年。一條耕牛，有如中小城市的出租汽車一樣的稀罕，農村中，除了偶而看到幾隻小鷄，很難再找到其他的家畜。從小孩子的臘黃面色，和皮包骨的四肢，可以充份地說明了當地生活的飢苦，這確是比旱災水災還要慘重的荒年。

車過徐州，隴海路沿線，散佈着更多河南籍的乞丐。有些是已形同乞丐的難民，都從民權中牟等縣份走到，或是偷坐不花錢的火車來到蘇北。用僅有的農具和傢什，換一些豆餅，花生餅（都是榨油剩下來的渣滓）和連殼子黑亮磨成的高粱麵，回到家鄉去，這些東西都會成爲他們生活上的珍品。這連年戰爭與災害所造成的苦難徐州，已變爲河南農民的天堂，農民們再也不指望，那田裏種的土裏長的東西，把僅有的農具賣掉或換掉的決心，已足夠道出他們內心的痛苦和生活的絕境。

除了擔負過重的「支前」徵斂以外，我們過境的時候，他們又多了一層「送往迎來」的擔子，劉伯承鄧小平的百萬大軍南下，他們被迫而「歡送」，林彪羅榮桓的百萬大軍換防，他們又被迫而「歡迎」，送往迎來絕不是俗上的客套，而是必須要出糧出錢出人，才可以完成的「任務」。

統治者曾驕傲地說：「這是比二萬五千里長征，更要偉大的場面，幾百萬大軍徒步（作戰部隊多半是走路），從東北從華北赤脚走到了長江邊，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壯舉！」可是，苦難的中原人民，黃河的災害猶新，「人海」的侵擾又接連而來了。

窮忍是有限度的，窮困的農民有些被逼而起，把生命當做了最後的賭注，鄭州洛陽在「解放」初期，

有過好幾次公開的暴動，搶米的風潮日有數起，我的一位天眞的「同業」，曾因爲記述這一類的事情而受了批評，雖然他在記述這些眞實的故事以後，有意做了「這都是國特所唆使的！」結論，也還是遭到不容分辯的封鎖。在鄉下，幹部失踪，抗繳「徵借」和拒用「新」幣的許多事實，更使統治者大傷腦筋，一個「老紅軍」出身的民運部部長，在告訴我十一個幹部在信陽被殺害的消息後，他曾搖着頭分析過這一帶地區「不好搞」的原因，他告訴我這一帶：（一）民性太强悍，小孩女人都會打槍，二十歲以上的人大半都當過兵。（二）幫會組織太强，「封建」勢力濃厚，會門中都是「反革命」的地方武裝。（三）土匪太多一種是佔山爲王的，有相當實力很難「剿」，一種是客串性質的，農閒的時候到豫鄂邊界一帶去殺人越貨，有所搶獲以後，便回家過太平日子，很難被發覺。

這位部長沉思了一下，他發覺這樣的分析，是過高的估計了「敵人」的力量，犯了所謂「客觀主義」的毛病，接着他又分一二三點向我做了解釋，他强調地指出，這是暫時的現象。暴動和抗拒的造因，是由於國民黨的有計劃行動，企圖阻礙大軍過江，另外是由於地方治安幹部減少，控制力減弱；最後他也不得不承認地方太窮，經不起「橫徵暴斂」，有些是被逼反了的。不過他所謂「橫徵暴斂」是另有所指的，他把這責任完全歸咎於留用的舊保甲人員。

爲了怕動搖我對「革命」的信心，他又補充地說：「等到治安幹部加强，和人民的覺悟程度提高就可基本扭轉的。」不過，從當時他的面部上，我却看不出他對自己的話，含有幾分信心。

任何彌蓋和註釋都是多餘的，事實畢竟是不容抹殺，這次行車，我同許多人的心情都感到非常的沉重我們不但寫不出一篇「人民大力支前」的傑作來，看到報紙上關於「熱烈支前」的一類消息，反而有說不出的反感。

反對「喀里空」運動

爲了那篇「中原人民熱烈支前」的文章受到很大的表揚，以後我們寫文章時，也經常引用「一個工人如此說」「一個農民如此說」一類的句子，來表達自己的意思，但是老調用多了連自己也覺得沒有趣。那個被認爲作風不好的「大家閙秀」，曾把在開封寫的文章，到鄭州以後僅改換地名又做了第二次的報導，「組織」上發覺了，認爲此風不可長，領導幹部提出了「反對喀里空運動」，喀里空其人，據說是蘇聯的一個以虛構新聞出名的記者。對我們來說大家都認爲不「喀里空」，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一則，是寫作的尺度問題，再則是缺乏實際生活的體驗。早夕三次會，幾乎佔有了我們的全部時間，尤其是那個主持會的小組長，是同其他老幹部一樣沒有時間觀念的，我很難說出我們開會的準確時間，早晨的會是起床以後（有時是起床就開）到吃午飯爲止（午飯時間也是不確定的，大概從上午十點到十二點之間），晚上的會由晚飯後開始到過半數的人有睡意時爲止，下午則是午飯到晚飯之間，人湊齊了就開，會的性質通常都是學習討論和生活檢討之類。在這種情形下，要寫東西除了開會的紀錄以外，實在只有「喀里空」一下才可以完成「任務」。

新聞尺度是「原則」問題，同時也是因爲我們的「覺悟」程度不夠，不予考慮。關於實際生活，「組織」上終算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替我們安排了「參觀中原日報」和「訪問勞動英雄」的兩個節目。

中原日報當時是華中地區的「總機關報」（後來改由漢口的長江日報擔任），也是當時全區五千五百萬人口唯一的「新聞」讀物（開封的河南日報，濟南的大衆日報，雖然後來相繼出版，但實際上僅是中原

日報的開封版，濟南版而已，出版的目的只是爲了解決運送上的困難），所有「中央」政令和文件都是通過它來傳達，地方新聞和學習資料，也都是由它來配給的。它與「新華社中原總分社」「新華書店中原總分店」是三位一體，統由中原區最高統治機構的「中原局黨委會」來直接領導（除中原日報外，其他有關「中原」字樣後來都改爲「中南」了）。

這張對開報紙，使用了太多的幹部，除了「新華社」駐社辦公兼辦採訪外，編輯部還有時事組，城市組，農村組，民運組，服務組，資料組和副刊組等七個部份，每一組均有十個以上的幹部，校對和電務人員還沒有計算在內。

報社裡的幹部大部份是在中原地區「起家」的，與被老百姓批評爲捲土重來的「奉軍」或「東北軍」的我們，大不相同。他們保有太多的所謂「游擊習氣」，幹部都穿着破舊的藍色或灰色的土布制服，長年的「游擊習氣」使他們的生活非常隨便，隨處都可以看到女「同志」坦胸露乳在奶她的「革命產物」，就連我們那些出身「小資產階級」的女「積極」，也都覺得不大像樣子。一走進這據有堂皇大厦的報社，我們就看到不止十個奶小孩子的女「同志」，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非常新奇而又不敢談論的事情，因爲我們是第一次聯想到「革命」的男女關係問題。

男幹部大多是敞開上衣的頭兩三個鈕子，長長的頭髮和長長的鬍子，拖着一雙有異臭的膠鞋（禮貌與衛生都被認爲是屬於「舊」社會裝點門面的東西）。不過，人不可貌相，這些其貌不揚的男「同志」，却都是中原機關報的首腦人物，而且有些是經過所謂「長征」的老幹部，後來我們知道連那些女「同志」，也都是當地最高機構「首長」的「愛人」。

經過領導幹部帶有煽染性的介紹，我們對這些男女同業，實在不能不另眼相看。事實上，一如那張被重視的報紙一樣，他們確是頗獲重視的一些人。我對這家報社的最初印象，覺得幹部太多繼而覺得它不像一個報社，像一個負其他特殊任務的機關。出版報紙，充其量只不過是工作的一部份而已。後來證實，我的看法沒有錯，這被稱爲機關報的報社，除了擔負全區的「新聞」配給工作以外，更是當時城市工作與農村民運的組織者與領導者。

「慶祝南京解放」的大會上，我們被指定去採訪「勞動英雄」，我們滿懷高興地跑進了會場，結果是一無所獲地失望而歸。那些被稱爲「勞動英雄」的人物，對我們的集體採訪，頗感被包圍的威脅，同時他們很坦白地說：「組織上並沒有告訴我們說甚麼話，我們也沒有甚麼可說的，我們今後一定多多向你們解放軍同志學習！」一位女同業會一再地向他們解釋，說「解放軍」與工人都是「一家人」，結果他們還是皺皺眉頭拒絕了我們的要求。

後來我們知道任何採訪都要携帶「組織」上的「介紹信」，否則一紙「禁止接見中外記者」的通令，是包括所謂「一家人」的我們在內，而那一次，我們的小組長却疏忽了「介紹信」的事。

「革命」的男女關係

在極權統治者偏居延安的時候，據說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二百比一，不但是外來的少數女知識份子被爲天人外，連「邊區」的所有村婦也莫不被當做「貂蟬」一樣地稀罕。這「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使人與人的關係都有了失常的改變，製造了史前例的廣大的曠夫群，四十五歲以上而終生未婚的老幹部隨處都可遇到，他們都是在「革命隊伍」中消耗了可貴的青春，在「馬列主義」的教條和極權統治者的威力下有些人已習慣了獨身的生活，把結婚當做不高貴和不「革命」的事情，（至少，在我的一般接觸中，曾聽過不少這樣的論調）。本來，這也是不足爲奇的，在把家庭觀念當做「背句袱」一樣地犯罪時，男女之間也僅剩下了一點本能上關係。不過，就這一點使統治者無可如何的本能上的關係，就常常在「革命隊伍」裡做祟，所以「革命的男女關係」，也還是時常被人提起的課題。

當然，物盡其用是「唯物論者」的拿手好戲，許多過去跑到延安追求「天堂」的女知識份子，在「覺悟」的開始階段，就被「組織」上「說服」嫁給了工農出身而年齡懸殊的老紅軍幹部（我所謂「嫁」絕不能用成家的意義來解釋的，只是被指可以與某某人發生關係而已），就是陝北一帶的鄉女也都「有幸」做了當時被稱爲老幹部（今天的老幹部還是當時的新人）的「革命老婆」了（或稱「愛人」，至於太太與夫人，已被批判爲「封建意識」的稱謂了）。

我們一些新「同志」，尤其是比我年歲要小得多的一些人，他們是把「革命」美化爲一個不見烟火的「天堂」，誰也不敢和不好意談男女問題，甚致於把它當做不屑一談的庸俗事情（當然，誰都更知道下級

幹部「關男女關係」是一種嚴重的犯罪）。在行軍途中，我們爲了怕被「不覺悟」的老百姓謀害而通宵守衛的時候，我同其他兩個「同志」，有機會同領導幹部的「新聞作家」第一次談起這一類的問題。

我們的「作家」是以中國的愛倫堡自居而非常自負的（愛倫堡是蘇聯的一個因善罵美國人而成名的大作家，曾以其「巴黎的陷落」一書獲得史達林的賞識），他房中掛有兩張照片，一張是口銜烟斗屹立海灘的愛倫堡像，一張是口銜烟斗屹立海灘的我們「作家」的像（他平時是不吸烟的）。他對於新「同志」的「工農化」問題非常重視而非常苛求，而他自己却非常喜歡一些比「舊」文化人還「舊」的氣息。

他用慢吞吞的語調談了一些「兒女情長」的事，他首先對我們三個人都還沒有「舊」社會的「愛人」表示驚異，接着他像似鼓勵又像感慨萬端地說：「本來，在這偉大的時代中，個人是不足道的一件事！」（「個人」「個性」和「個體」都被認爲是屬於淘汰之列的東西）。

他繼續談「革命」的男女關係：「革命同志的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男的對女的，女的對男的，也絕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正確的戀愛觀，必須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與政治認識爲基礎的！」

他所謂「立場」是指「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是指「勞動觀點」（亦即所謂爲工農兵役服務的觀點），良好的「作風」是指反對「自由主義作風」的意思。

「至於那些强調個性和興趣的事，在革命隊伍裡是沒有的。所謂「門當戶對」「郎才女貌」更是屬於封建意識的一些東西了！」

最初他有如一個背誦法律條文的法官，態度是嚴肅的，後來才慢慢地「溫情」起來，他談起他自己的「愛人」，並出示那隨身携帶的照片給我們看，當我知道了他「愛人」的出身和看過照片以後，我是非常驚異我們的「作家」，在只講「立場」和「作風」的婚姻中，居然竟遇到如此文雅而美麗的女人。

他告訴我們，爲了「革命大業」，他們很少有在一起的機會，他「愛人」在東北某一家報社裡做編輯，工作很忙，前此在東北見面的時候，也很少有機會好好地談談。

他畢竟是「舊」社會出身的人物，對於一個美滿的家庭生活還是寄予無限的幻想的，對當前的無法獲得，更顯露一些無可如何的怨艾。

在那次談話中，記得他曾講過如下的一個故事：

故事發生在抗戰時代所謂「邊區」中心的延安，一位歷經千辛萬苦，而剛到達不久的浙江大學的女學生，經過「組織介紹」嫁給了一個出身佃農的老幹部，這位「革命」熱情很高的女大學生，最初在「服從組織決定」的大道理下，也沒有十分計較這些不高貴的事情，照例每星期六回一次那個老幹部所住的窰洞他們見了面往往都是一宿無話。日子久了她逐漸對這所謂婚後生活感到不滿，但這不滿的情緒，在「組織」不斷地「教育」下被控制着。一個皓月當空星期六的晚上，她走過田野，走過小溪回到那窰洞之家，沿途上她爲那美麗的月色，勾起無限的往事，也有無限的傷感。鐵打的現實是突不破的，她不敢也不願正視本身的問題，只是想回到「家」去，邀她的「幹部先生」做一次輕鬆地月下散步，藉以排遣一下她那搞不通的思想。當她走到窰洞的門口，遲疑了一會兒，才進去用兩句謊言騙她的幹部先生到洞外來，她指着

皓潔的月色，請求他到外面去散散步。

不料她那個農出身的幹部先生却說；

「月亮有什麼好，圓圓的活像一個燒餅。」

幹部先生又以「白天幹了那麼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亂走有什麼意思？」的言詞，拒絕了他那出身小資階級「愛人」的要求。

她感到希望的破滅，哭紅了兩隻眼睛，在第二天早上離開了她的「家」，並留下四行字給她的幹部先生：

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將明月比燒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

從那一次起，女大學生便也不「歸宿」了，急得她那幹部先生沒有辦法，而去要求「組織」解決。可是「組織」再也說服不了這個女大學生，據說這場官司一直打到毛澤東那裡去，這故事正代表了當時延安所有女知識份子，對「幹部丈夫」普遍不滿的情緒，毛澤東發現到這件事情的普遍性，才親自寫了四行字回敬這位女大學生，而爲他的工農幹部們辯護：

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寒來花月不能衣，飢時一餅勝千金。

故事到此爲止，請原諒說故事的人是身負宣傳重任的幹部，不可能再告訴我一些宣傳以外的事實以及此後的發展。

假使沒有親身體驗過或親眼見過極權統治者所製造的婚姻悲劇，假如還不十分清楚極權統治者剝奪人類精神生活的居心時，也許難免要爲那堂皇的「婚姻大法」以及我所記述的後面的一首打油詩所迷惑。事實

上，極權統治者也經常地在講解他們的所謂「人生觀」，一方面是「服從組織工作」；另一面就是有限度地解決吃飯睡覺問題，這也就是被認爲是人生意義和人類遠景的全部。不過，當你想到吃飯與睡覺問題，也正如同一部機器的加油與必要的休息一樣時；當你想到男女關係僅被當做延續人類的單純本能時，你難道對百年前那個德國人所編撰的荒謬學說，以及他的信徒們所執行的那一套東西，還會寄予任何幻想麼？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被壓迫者的鬥爭

從鄭州以南，我們走進一個危險地區，這一帶正是被認爲最「不好搞」的地方，「幫會」組織最頑強，「土匪」最多，女人小孩都是打槍的能手。許多幹部被殺害的消息使我們感到恐怖，尤其是路基的被破壞以後，我們將被迫而徒步。火車停止在許昌以南的漯河，小住幾日，我們都只能睡在車廂裡，爲的是怕住在「不覺悟」的老百姓家裡會發生什麼不測。車站上警衛森嚴，幾節火車變成了我們「人民」記者的僅有的採訪天地。

果然「組織」有先見之明，我們睡覺醒來的時候，就有一件血淋淋的事情發生在前幾小時的夜裡，一個一向不被重視的炊事員「同志」被砍了幾刀，他原是睡在站臺上看守餐具的，最蹊蹺的是被什麼人砍的？砍的時候怎麼沒聽見呼叫？警衛人員怎麼竟毫無所知？這像是一個猜不透的謎，這個謎更加深了我們的恐怖。

我們像小孩子聽老人講鬼故事一樣的心情，又害怕又好奇地去探訪這一類的事情，那些給「大人物」做隨身保鏢的警衛員知道得最多，但是假若你不是跟他們混得很熟而經常拿幾支香烟去「拉拉關係」的話他們是守口如瓶的，因爲「組織」上曾告誡過他們不准講這一類影響不好的事情。

在鄭州的時候，我曾聽見一位部長透露過十一個幹部在信陽被害的消息，後來一個給部長保鏢的警衛員「同志」，告訴我關於這件事情的全部經過。這十一人是受過「中原局」訓練的鄉村幹部，當他們被派赴潢川一帶工作，途經信陽近郊的五里店地方的時候，經過了「農會」的介紹，就住在一家老百姓家

裡。當時「農會」會向他們保證地說，這家老百姓是非常歡迎「解放軍同志」的，過去所有的過江部隊都常常被派住在他們家裡，而且都招待得很週到。這十一個年青人經過一整天的徒步跋涉，感到非常疲乏，這時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既經「農會」保證，也就毫無顧忌，於是就住了下來，最初還留一個「小鬼」守夜，後來連這個「小鬼」也睡着了（年歲小的勤務兵統被稱爲小鬼）。第二天早上，那「歡迎解放軍同志」的五口之家的老百姓却不知去處了，而這十一個睡在他們家裡的年青人，也就永遠長眠在被「歡迎」的夢裡。聽那位警衛員「同志」講完這段事情，我已非常熟習地代做了千篇一律的結論：「他媽的，這一定是國特幹的！」

可是，他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告訴我下面的幾句話：

「照我說，我們過江部隊有的紀律不大好，聽說那家老百姓原來是做小買賣的，「解放」了，買賣沒得做，本來就是呆在家裡吃老本，又碰着他媽的那個農會的幹部跟他們不對，專門往他們家裡派軍隊，紀律壞的就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搞得人家家裡的存糧都吃絕了，那家人家眞恨死了我們部隊，我看他們早就想下手了，正趕上那十一個傢伙倒霉，所以統統被人家宰了。」

這個警衛員跟我混得很熟，我常同他到小河裡去洗澡，也常跟他逛城市，我的城市知識使他感到興趣，正如我喜愛他那沒有被「改造」掉的眞正代表農民的淳樸明朗的性格一樣，當然我有時也是想借重一下他所備帶的那只美國槍，爲了我自己的安全。

在我們一齊躲警報的時候，他會同我和另外一個「同志」談了另外一件類似的事件：

一個出身農民的河南籍的戰士，這次南下的時候非常想回家一次，看看他那八九年不見面而未卜生死

的老母親，可是沿路「組織」上就一再「教育」他不能回家，班長告訴他等「解放」了江南，就可以回家過太平日子了。

連隊裡這時對華中一帶和南方籍的戰士已開始普遍「注意」，因爲他們越走離家越近了，「落後意識」，說不定會使他們冒險地開小差，這個戰士雖然在極度痛苦中畢竟表示了「服從組織」，事實上他知道開小差是要冒生命之險的，同時他自己也知道就算能跑回家去，「組織」上也絕不會寬恕他，而要追到他家裡去的。所以他自己還不如乾脆死了這條心，向連長表示他再也不講想回家的事。「組織」上把他當做宣傳的典型，用「墻報」表揚他的「革命決心」，說他已克服了「落後意識」，並鼓勵大家向他「學習」。宿命論者常常喜歡說人類的命運是由一隻冥冥之手來擺佈的，身爲「唯物論」者，雖然極表反對，但事實上後者對於所謂極端巧合的事，也很難給予一定的解釋。這個會表示過「決心」的戰士，在行軍宿營中竟來到了自己的家鄉自己的村落，最巧的乃是他所屬的一班人竟被指定住在他自己的家裡。當然，他自始至終都沒有敢提起這就是他自己的家，他以極緊張極興奮又極度不安的心情，看見了那正在爲「同志」們燒洗脚水的老大娘，就是一別多年的母親，可憐他那年邁的母親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兒子竟會生還，而且就雜在當前這些穿戎裝的「八路」之間。不過，這個戰士終於忍受不住，悄悄地告訴了他的母親，並叮囑她萬萬不可宣揚出來，老大娘的眼淚像鍋中的熱氣一樣地沸，出來可是她對於那立即必須離去的兒子能夠說些什麼呢？這個做兒子的戰士又照常去「開會」，去「檢討」，一班九個人誰也不知道會有一件不平凡的事情發生在他們的週圍。當連隊在第二天早晨集合出發的時候，竟發現不見了九個人，指導員立即派人去找，可是找到的却只是八個身首分離的屍體，那尚未被人知道母子關係的老大娘和戰士也就從此失踪了。

這事情有人說是那老大娘自己幹的，又有人說是她們母子合夥幹的，不管怎樣，這該是人類的最大痛苦所造成的最大勇氣，才會促使那素稱軟弱的老婦人拿起了殺人的武器。

我聽完這個故事，當時的感覺絕不是悲憫，而是一種極難描摹的興奮和輕鬆。極權統治者在一味宣揚他們的「主義」之餘，遇到這些被認爲棘手的事情，也只有感慨地承認被它所統治的乃是一個不定型的國家，和一個不定型的民族，因爲被它視同羊群的一些人中，却不斷地有猛虎出現。現在，讓我和我的讀者們，爲那被稱爲猛虎的母子倆而祝福吧！因爲她們才是眞正爲了人道以及勢難被消滅的人性，而向殘酷的極權主義者作鬪爭的一些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未除「政治武裝」的「敵人」

從濕河徒步出發之前，我們有過一次空前的官兵以及工作人員都必須參與的「學習」。提高警覺與加强保密，被當做學習的課題，目的是爲了要應付當前這「不好搞」的地區。「學習」的具體內容如下：不准私自與老百姓接觸，拒絕老百姓所饋贈的食物，不喝未經化驗的井水，「同志」之間要互相保密。「組織」上告誡我們：許多老百姓都是穿有「政治武裝」的「敵人」，假定不提高警惕性，隨時都有被「敵人」加害或被解除「政治武裝」的危險。一篇以「紅軍的保密性與警惕性」爲題的，蘇聯最高軍法官所作的文章，被當做「學習」的唯一文件，該文首先指出蘇聯一九三六年所頒佈的保密法令，即「違犯保密者處以極嚴厲的刑罰」的正確性，並說明每一「紅軍人員」必須充份地認識「入伍誓詞」的意義，所謂「入伍誓詞」，即「做高度警惕性的軍人，嚴格保守軍事和國家的秘密」。該文的結語是：「嚴防國際反動派及揭破其陰謀，堅決反對高枕無憂與寬大爲懷的思想」。

「學習」的當時，我和其他幾個北平來的大學同學，都有一份驚異的感覺，因爲我們都曾受過一些宣傳的影響，對於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有過自由與幸福的幻想，可是當我們實際走進了標榜社會主義的統治機構，而學習到這一類「文件」時，首先破滅的，就是這些幻想，繼而更感到森嚴與强制性的恐怖。因爲我們已經分不出自稱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法西斯獨裁政權的區別在那裡？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前者的組織，更爲嚴密更爲强制而已。

從這次「學習」，我更認識到另外一個問題，有些人曾對「解放軍」的紀律，有過一些好評，這是一

種片面而矛盾的說法。一個不好的政府，絕不可能產生一支較好的軍隊，這是極其普通的常識。不過，所謂「解放軍」，經過「組織」的一再「教育」後，在表現上可能給予粗淺的觀察者一些較「好」的印象。我曾身受這些「教育」，讓我來分析一下這「教育」的內容，正如我前面所介紹的「學習」一樣，首先「組織告誡了士兵，老百姓都是不「覺悟」的一羣，或是說老百姓大多數是存有「政治武裝」的「敵人」，接着彷彿含有善意的警告士兵，爲了生命安全，不准私自跟老百姓交往，不准吃也許含有毒藥的老百姓所給的食品，這些恐怖的「教育」造成了軍民間無可彌補的距離。我所接觸的許多老幹部和戰士們，由於經年「防敵教育」的結果，是經常把老百姓當做了向井裡投毒藥的「特務」。當然這只是屬於感覺上的，假如證據確鑿，那當然是殺無赦了。在我初到武漢的時候，一個百姓裝束的老同學到我的機關來看我，我請他在會客室裡小坐一下，不但我當場就受了嚴重的「批評」，連我那位同學也遭到極其難堪的盤問。假如有人把這樣所造成的軍民距離錯當「不擾民」的好評時，我認爲是一件極不公允的事，因爲統治者也正想利用這些來宣傳他們部隊的「軍紀」呢！

偶而發生的「軍民關係」，都屬於集體的表演性質，這種表演性的關係，確被當做上好的「表揚軍紀」的資料。可時，試問有誰同個別的「解放軍」親切地談過？毫無芥蒂地談過屬於政治以外的家常呢？

經過這次「學習」之後，我們被編散在有武器的部隊裡，「組織」上告訴我們，一則可以體驗實際的部隊生活，再則我們在徒步行軍中也就有了安全的保障。

有些人被編在過江的作戰部隊裡，我同其他幾個記者分散在一個叫做「民運隊」的行列之中，「民運隊」雖非作戰部隊，但每人均持有長短武器，據說這些武器，可以協助他們順利完成所謂「民運」工作。

「民運隊」的組成大部份是老幹部，有的在華北的「老區」當過縣長專員，有的搞過「農會」工作，其餘部份就是一些做警衛員的戰士。不料，在「民運隊」中，我們幾個人却受到參加「革命」以來的歧視，因爲在成見很深的農民出身的老幹部中，任何知識份子都被認爲有太多的「小布爾喬亞」的習氣。我被一個老幹部當做採訪對象地談過一次話後，在行軍的休息中，我聽到兩個老幹部關於我的談話：

甲：他是一個大知識份子，眞了不起！

乙：知識份子是最「腐化」的。

甲：聽說北平的知識份子是「革命」的，他們還搞過「五四」運動呢！

乙：革什麼命？「革命」爲甚麼不上延安去，「毛主席」說他們都是裝了一肚子「反動」的教條，什麼也不能做，專愛犯「自由主義」！

甲：愛犯「自由主義」倒是眞的！

乙：不但愛犯「自由主義」，而且都是「牆頭草」，看見我們人多了，才來「革命」的。

甲：唔，不過，我們現在的地區太大了，不要這些人也眞是「趕不上形勢」。

乙：要盡管要，將來非得好好地「改造」一下不可！

同時聽到這次談話的是一個燕大新聞系的女同學，她氣得臉都漲紅了，不斷地拉着我的衣裳，她的意思是，至少應該向他們辯駁幾句，我搖搖頭。以後證明我的態度是對的，辯駁是沒有用的，因爲統治者的多年「教育」，使他們已經懷有很深的成見而變爲另外一種型的人。對我們這些新「同志」，難免也還有未除「政治武裝」的感覺呢！

「落後」與「進步」的抉擇

我們被認爲是最「幸運」的，因爲「組織」上，畢竟沒有要我們從塞外平原，赤脚徒步到長江北岸去，有三分之二的路程，都還算有「硬席」的火車可坐。可是，當我們知道了這「幸運」，只是對所謂「落後者」的一時牽就時，都感到極大的不愉快。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具體的行動表示不甘「落後」，不搭乘任何車輛，「自願」徒步走到南方去，才算得上「進步」。「落後」與「進步」的抉擇中，大家都一致選擇了後者。這是統治者偶施小技，他們也認爲「自願」總比强制好一點。事實上，在當時候如不「自願」便只有强制，因爲漯河以南火車不通了，許多大小汽車，爲了裝運重要的東西和重要的人，對於不重要的我們，根本已無暇顧及了。

爲了「照顧」我們都是初次行軍，從漯河到信陽四百里路程，分四天來完成，日行百里，我們都感到太緊張而不能勝任，據說這在戰士們看來，是比大休息還要輕鬆的事。領導幹部又在强調地說，這就是「馬列主義」的第一課，也就是「革命」的實踐。不管怎麼樣，路是擺在我們的前面了，不走完那將是雙料的「落後」。

徒步行軍之前，我們被迫舉行「輕裝運動」，大家都忍痛地再來丟「包袱」（此處指行李）。捨不得丟的有人棒你丟，我的全部家當，除了僅留一條氈子以外，都留贈給當地的幹部，連僅有的一雙皮鞋，也被小組長送給了車站上的守衛「同志」。

在「輕裝運動」中，「組織」上非常憤怒地，發現我們「包袱」之中，都藏有不止一套的「便裝」，尤其

是女「同志」，她們都携有幾件花花綠綠的旗袍。領導者認爲這不但是有形的「包袱」，而且是思想上的「包袱」，是一種不澈底的「革命」行爲。因爲藏有便裝，被認爲有脫離「革命」或是找機會「腐化」的企圖。每個人經過「自我檢討」以後，當然這些被認爲思想與物質的雙重「包袱」，也就都丟掉了。

就這樣我同其他九個人被指定與「民運隊」同行，離開漯河約有二十五里路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所謂「行軍鼓動棚」，遠遠看去像是一場「野臺戲」這是隨軍「文工團」搞的。隊伍在這裡小休息，「鼓動棚」旁邊設有茶水站，「文工團」的人都抹了花臉分成幾夥，有的在扭着三進一退的秧歌，有的在機械地敲着鑼鼓，有的在唱單調的軍歌，有的在扮演着簡短的話劇，所有的東西，還是離不開政治的內容。虛僞與誇大的宣傳工作，是極權統治者的拿手戲，任何一個可用做宣傳的機會都不會放過，這些「文工團」（師以下稱宣傳隊）的組織，在部隊中普遍到每一個戰鬪團，每個軍不會少過一千人，其中幹部和戰士都是職業的宣傳員，就是在前線的戰壕裡，他們也必須要做那鼓吹送死的政治工作。「文工團」是軍事機構中女「同志」最多的單位，那些剛剛被「動員」而來的中小學程度的女學生，最初都分派在這裡，直到她們的婚姻問題被決定後，才有機會調動另外的工作。

這些「文工團」所表演的東西，一如統治者所有的宣傳品一樣，最初給我們的印象是新奇，第二個印象是單調乏味，再以後我們則感到非常的厭惡。被稱爲「人民藝術」的一類東西，統治者只把它當做「解決問題」的政治工具，假如有人在極權統治區內，奢望一個偉大而有久遠藝術價值的作品，將要被批評，沒有認識到「藝術的階級性」。

一百里的路程對於我們學校出身的男女「同志」，實在是「照顧」得太多了一點，剛剛起始走的時候

「積極份子」還批評過我的渙散「鬪志」的「落後」論調，可是事實證明，我們確是不能勝任的，走了將近七十里的時候，每個人的脚板都起了水泡，一步一挨地扭肩往前走，有些善於走路的人在批評我們故意「扭秧歌」，「積極份子」這時也無可如何地向前扭肩走。最後，我更是寸步難行，脚下已被磨破了的水泡浸濕了，同時我的痔疾又嚴重起來。强調病痛是最不光榮的事情，咬咬　再挨過一程，後來我終於掉隊了。我邊走邊休息，當我正感到無拘無束而心情有無限開朗的時候，後面便有幾輛速度很慢的卡車追上來，據說這是收容掉隊「同志」的，當然也是防止開小差的。我們都爬上了卡車，卡車的速度慢得驚人，並且是邊走邊停，停的時候司機就下來洗車胎，一個有經驗的老「同志」告訴我，這是蘇聯製造的卡車，爲了援助中國的「革命」而送給我們的，不過這些車子是只能行駛西伯利亞寒冷地帶的，到了中國當然聊勝於無，何況又是「友情」的「贈與」呢。在炎熱的華中地帶，變通辦法，是走幾里路休息一下，把車胎和機件用冷水冲洗一下，不如此便會熱出毛病來的。這是我初次見識到所謂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機器產品。卡車上，另外一藏包一藏包的東西，也引起我們的好奇，因爲那些藏包中所裝的，並不是什麼軍用物資，而是過去政府所發行的金圓券。我問那位老「同志」。這些東西已經是形同廢紙了，爲什麼還要趕運到前方去？他毫不猶疑地回答我：「趕去還給國民黨的！」我當時還有些不解，後來才知道這是統治者一貫的「政策」，在佔領一個地區後，很快地將舊貨幣集中起來，運到未佔領的地區去，同時更鼓勵商人免稅免費攜帶。據說這對「革命」是有莫大幫助的，不但是可以用這些廢物（舊貨幣）到政府區去套購物資，同時更可促成政府區經濟的加速崩潰。共產黨爲了奪取政權而不擇手段的事，這只不過是一個小的例子而已。冒用「人民」招牌的統治者，當然從沒有想過，他們所加予眞正人民的痛苦是怎樣的大了。

頭一天行軍，夜晚九點鐘，才趕到一個叫柴寨的地方宿營。許多人都不能支持了，不得已而搭乘汽車的我們，被人指罵爲「落後份子」，可是第二天，甘願「落後」的人多起來了，「積極份子」這時也認爲偶一「落後」，是無傷大雅的事情。但挨到信陽以後，那些偶一「落後」的人，在總結行軍經驗時連這偶一的行爲，也推得一乾二淨，並說在他們愉快地完成行軍任務後，深深地體驗到「爬雪山穿草原」的「長征同志」，確是無比的偉大（這不叫歌功頌德，而被認爲是聯繫思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紀律」的學習與實踐

我們停留在雞公山脚下的新店鎮，到那時才糢糊地知道初步目的地是武漢。到武漢是不是可以轉入地方工作（那是好多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希望）？是不是再繼續向南方去？還仍然是個謎。

原有的三十幾個人，在新店集中過一次，緊接着又分散了，大部份被派到各個兵團的連隊中去，只有八個人被留下，據說等待武漢「解放」後，可能擔任一點內部工作。

我是被留下的八個人之一，我們每次的被分散與重新組合，聽說都是有一定的根據和理由，只是不能給我們知道，想打聽一下的就會遭到批評。這是統治者使幹部「服從組織」習於調動的一套辦法。每個人都被當做機器的零件一樣，可以任憑擺佈，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則被視同零件上所生的銹。爲了便於機器的使用，這些銹是要盡量被防止或消除的。

八個人之中，有五個是有「組織」關係的，我同另外兩個燕大四年級的女同學是所謂「群衆」。對於能夠到所謂「大城市」的武漢，我們都有一份喜悅，因爲我們都是熟悉城市生活的一些人。同時，到武漢以後，我們必將會看到幾個不「革命」或已「革命」的朋友。可是，我們的喜悅，立即受到領導幹部的「批評」，他認爲如果是屬於「服從組織」的喜悅，當然是非常正確的。如果單純爲了可以到大城市而感到喜悅則是極端錯誤，並是一種未革除的「小資產階級」的「習性」。他並警告我們，就是到了城市之後也隨時都有再被派到農村去搞「土改」工作，或是再派去連隊工作的可能。

在等待的停留中，我們被指定學習「入城紀律守則」，這是當時擔任攻打武漢，而由蕭勁光所率領的

「黃海」部隊（即十二兵團）所印發的。所謂「學習」，當然是叫我們多熟悉一下而已。「守則」上印着許多必須服從的規定，都是不得怎樣或不准怎樣一類的條文，總數有十二條之多。其中一條是：「各部人員不得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不許接見中外記者」。這是前所未有的，據說在北平「解放」的時候，一個高級幹部，曾對包圍他的記者，說了幾句與軍事無關屬於觀感之類的話，被批評爲「失言」。華東方面的陳毅也曾在接見外國記者時「失言」，統治者除了對於「失言」的人予以申斥外，乃頒佈了這絕無例外的「禁令」。

我認爲頗堪玩味的一條關於外僑的：「保護外僑，不加辱侮，對安分守己遵守法令之外僑，並遵重其人格，以禮貌相待，但其有違法或破壞行爲者，應即予逮捕，交由上級或軍管會處理。」

在我們討論的當時，就有人提出「不加辱侮」，是否就是「保護外僑」的全部？同時「人格」與「禮貌」，對我們來說，已是很久沒有聽到過的新名詞了。爲了這兩個名詞的確切意義，曾花費過我們很多時間。

使我們非常失望的是：「組織部隊營房文娛活動，不准上街。」我們原想到武漢去看一些朋友的，當然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假如我們有機會同以前的朋友見了面，想敍一敍舊情，也將不會被准許的，因爲同朋友見面的時候，不可能再是一個單獨的場合。同時另一個「不准在外面吃飯」的禁令，更註定了我們吃小米高粱的命運，不可能有萬一的改善。

其餘的一些條文，都是屬於怎樣「服從組織」的一類東西了。

我們已失去了原有的一份喜悅，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命運（請原諒我這被認爲不通的說法）！

「學習」了「紀律」以後，「積極份子」從「報紙」上面看到一些以給老百姓挑水掃院子，來表揚過江部隊「良好紀律」的一類文字，他們也表示不甘「落後」，說做就做，才算得上「積極」。我們八個人在當天的下午，就冒味地出現在一家老百姓的庭院中，碰巧我們又遇到了一個不「覺悟」的人家，當我們拿起了扁擔掃帚的時候，那家老百姓却不聲不響地緊閉了窗門。「積極份子」帶頭，「落後份子」跟踵，我們很快就把亂草和拉圾集中起來，正想把拉圾清除出去的時候，一個老大娘推開半扇窗子戰抖地對我們說：

「老總，你們要這些東西沒有用啊？」

「是沒有用！」沒有人注意那個老大娘的神情，我們很敏捷地，就把這些拉圾倒在河裡去了。

歸途中，管理伙食的老幹部，對我們翹起姆指說：「還是你們新同志了不起！」

「積極份子」滿面笑容謙虛地回答：「那裡，我們得多向老同志學習，這些事情老同志是做慣了的，我們還是頭一次。」

不料那個老幹部却說：「老同志，哼！我革了十幾年的命，就從來沒有幹過這些事情，過去打游擊顧自己都來不及，一天不知道搬幾回家，一有「情況」就得走，那還顧得了這些，還是你們新同志了不起，了不起！」

老幹部走了以後，「積極份子」低聲對我們說：「這傢伙作風一向就不好，不聽他那套。」

當晚又有人向我們來「提意見」，說我們把老百姓視同財產的亂草，草灰和爐灰（據說可以染布用的）都弄走了。這時，我們八個人的一團高興，才變爲不可彌補的遺憾，「積極份子」沮喪了一回才又會說：

「毛主席說的好，我們知識份子是最沒有用的東西！」

熟習農村生活的人，一定會更熟習農民的生活方式。的確，一草一木，一塊破磚，一張爛布，對窮苦的農民來說，都有它一定的用處，爲了使用方便而且都有一定的安置地方。農民們已把他們生活所需的勞動，做了適當的分工，絕不歡迎也不需要，住一個晚上就走的一些人來幫忙。尤其是粗魯蠻橫而並非自動的士兵，統治者盡管把「替老百姓掃院子挑水」，當做對知識份子和對外的宣傳，但是，凡是熟悉中國農民生活方式的人們都會不以爲然的，假定確有其事的話，那麼所加給老百姓的感覺，絕不對是「盛情」的感激，將是憑空而來的若干干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天堂」中的趣語

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晚上，我們八個人像保了水險的物資一般，被運送到「人民」的武漢，雨水淋透了我們的衣服，每個人都是木偶一般，毫無表情地坐在堆滿東西的卡車頂上。兩個月來的軍旅生活冲淡了我們關於城市的記憶，當我們行經被認爲尙未「覺悟」的武漢市區時，我們都感到非常的陌生。

在被稱爲「官僚資本」開設的璇宮飯店下車，這是我們的「總分社」所在，旅店裡面的喧囂和熙攘與市區景況成一顯明對比。三十幾個人又在這裡集中了，佔據了旅店的一角，隨進城部隊先來的同業們正在開會，檢討一件不愉快的糾紛，事情發生在擔任我們小組長的老同業身上，他們把我們沿路所寫的文章和先進城「同志」所採訪的東西，都改頭換面交給了新出版的「長江日報」發表，聽說他們還領了錢(稿費)，買了皮鞋，把「革命」當做不見烟火的天堂的人們，誰都不相信竟有這一類不高尙的事情，金錢和愛情一向被認爲只是「舊」社會裡被追逐的東西，在「革命隊伍」裡，誰還願意再提起這些「庸俗」的瑣事？可是這兩個不爭氣的魔鬼竟偷渡了「天堂」，事情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最初「積極份子」還是企圖設法彌蓋但我們之中的一位有勇有謀的同業，先研究了所謂「人民出版事業」的小冊子，然後才在小組裡公開宣佈了這件事，計較金錢是多麼庸俗的事！縱然這樣他難免還遭到別人的輕視。

同時被提出的是原來擔任我們小組長的四川人，他對我們小組裡一個出身「大家閨秀」的女同志的曖昧行爲，有些認爲是超越了「上級照顧下級」的範圍，在小組裡就曾有人檢討過他，但是他盡量設法爲自己辯護（新同志爲自己辯護是不被准許的並且要受到「不虛心」的批評），在他的辯護中彷彿警告我們，

他是有着十多年「革命功勛」的老幹部，不能受一些新同志檢討的拘束。許多新同志當時還對他這種態度憤憤不平，其實在以後我所見到的老幹部中，那一個不是以「功臣自居」呢？「參加革命」的年資是決定共產黨人的身份和應取得何種程度信任的唯一的標準，所有不同的「生活待遇」「政治待遇」以及各種不同的「照顧」，都只是說明入黨時間久暫的一件事。老幹部他們非常習慣於「接受批評」「承認錯誤」的一套，因爲他們更懂得這些是結束被批評和減輕罪愆的最好方法，而錯誤則不妨繼續錯下去，「組織」上對這些老人也是無可如何的。

在武漢住了不到幾天，我們就很快知道另一些「上級」之間的紛爭，這些紛爭也是被許多做天堂夢的人認爲是想像以外的事，他們會爲此感到希望的破滅，原有的熱情變爲冰冷，他們在被自己美化的「天堂」中竟發現了不能用「個別」來掩飾的黑暗面。

我所說「上級」是指中共華中地區及四野部隊的高級領導幹部，他們爭執最嚴重的就是如何在這被佔領的地區安插自己的幹部，當時武漢各旅店、各機關、各學校都住滿了來自各地的幹部。這些幹部都是服從「組織」調動而打算來做地方接管工作的，他們有的來自陝北冀南等「邊區」，有的來自東北旅大「行政區」，有些原是鄧子恢（前所謂中原臨時人民政府主席）所領導的中原區幹部，知識份子最多的是以林彪名義在東北華北「動員」而來的（南下工作團爲其主要部份）。可是，到達武漢後，則發現了粥少僧多的嚴重問題，這四批不同來處的幹部，據說都可以單獨包辦武漢的所有地方工作，因爲他們的高級領導幹部都曾有過在武漢獨霸一方的美夢，爲了實現這夢境他們都配備了足夠的班底和幹部，可是等待武漢被「解放」，才發覺不能盡如理想，於是紛爭開始了，後來在明商暗爭的情形下據說做了圓滿的解決，中原地區

的幹部將因爲佔地利而優先把持的各機關讓出一部份，分給資格老的「邊區」幹部和來頭大的旅大幹部，林彪的知識份子幹部，除極小部份也擠進幾個機關外，都留儲在軍隊裡和下鄉去搞「土改」，剛剛由平津出發的南工團共有幾千人，則被電阻在德州「學習」。這次的所謂「圓滿」解決也就種下了以後幹部間的派系和地域之爭，許多被迫參軍和搞土改的平津知識份子普遍地「鬧情緒」，爲了安定人心，曾經做過南下工作團總團長的四野政治部主任，特別召集平津來的同學「慰勉」一番，而我這個消息的來源，也就是當時他在那次講話中透露出來的。

另外關於各單位及老幹部之間的爭房子，爭繳獲和爭享受，更是些隨處都耳聞目覩的事。極權統治者用美麗的謊言誘致了許多思想還沒有成熟的年青人（當然統治者更可以借重武力的），年青人抱着追求「天堂」的幻想走進了「革命隊伍」，當他們感到極端失望與極端痛苦的時候，他們已走不出「天堂」的牢門，統治者還不斷地指責他們：任何失望都是咎由自取，你們錯當了共產黨人是萬能的神仙，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好高鶩遠不合實際的想法，丟掉這些不實際的思想意識，才能夠提高一步！」

「認識革命實際！」是我們的新口號，在欲罷不能的「革命」中，我們只好把許多失望的事情都當做了「實際」，不然的話，將沒有辦法在「革命」中求生存。

「人民經濟」的風波

我們那位以愛倫堡自居的「新聞作家」，在佔領武漢後的第八天，也就是當地機關報「長江日報」發刊的頭一天，就發表了一篇長達五千字的文章，這篇文章是以「光輝日月永屬人民」爲題的，這在半年前我們就拜讀過了，那是北平剛「解放」的時候。不過文中改換了幾個地名和人名，將「紅旗插在了幾千年來帝王統治的紫禁城上」的名句改爲「把紅旗插在雄偉的江漢關上」。作家從此以後，對我們就無暇顧及了，因爲他已經做了軍管會文教部的副部長，還兼了其他幾個重要的委員，又屈就了幾個「人民」團體的代表，準備到北平開會去。在百忙中，他還親自到上海走一次，爲了領取一筆數目驚人的稿費和版稅，他的舊美軍吉普已換了一部別而克轎車。

「四野新華總分社」，在工作上是由北平「新華總社」來指揮，在行政上則歸「四野宣傳部」領導。我們與四野宣傳部的工作人員搬到一所大樓裡去，開始了我們的採訪工作，不過，爲了各單位對房子的分配屢有意見，我們仍同打游擊時代一樣，隨時都要準備搬家，在到武漢的最初三個月中，我同我的機關搬過了八次家。

一邊搬家，一邊工作，這是老幹部已習慣了的事，所以搬家期中還是照常工作，我們的工作是協助地方報紙，正如前所參觀的中原日報一樣，我們幾乎包辦了長江日報的採訪工作。因爲當地報紙的採訪幹部正彼此在「鬧意見」，工作能力差的老幹部把持重要名義不放，有工作能力的新幹部沒有名義不肯幹工作當然這現象絕不是這家報館所獨有的。

武漢被認爲是份子複雜而「覺悟」程度最低的地區，最初報館當局還一再叮囑我們去渲染一下「工人護廠」「學生護校」的事情，用以宣傳所謂「解放軍」是老百姓「請」來的，以及工人學生早就希求「解放」的心願。可是，後來嚴重的現實問題來了，再也顧不得「護校」「護廠」以及用「秋毫勿犯」來表揚軍紀的一類事情了。當地老百姓開始普遍地拒用「人民幣」，「人民幣」更下不了鄉，商人對加重補繳當年春季所利得稅有普遍的反感，銀元黑市在一日之間，從三百五十元直漲到一千元，經濟問題造成了普遍的不安。統治者下令所有的機關都配合解決經濟問題而動員，由四野宣傳部主持宣傳的領導工作。「政治是經濟的反映，一定的政治決定於一定的經濟！」這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假如經濟工作搞不好，標榜「社會主義」的統治者將何以自容？

報紙上引用了一句據說是老百姓說的話：「解放軍什麼都好，就是經濟沒辦法！」爲了這句話報館受到「華中局」嚴重的批評，被認爲是犯了「無原則」而自己打嘴巴的嚴重「錯誤」。

「老百姓」被當做了最「狡猾」的一羣，銀元黑市震天價響，可是却找不到一個黑市的銀元販子，不得已幾個大「文工團」用繩子捆了幾個自己的「同志」，這幾個「同志」都化裝成銀元販子，用紅旗領頭舉行擴大宣傳，那幾個化裝的「同志」一路上只是哀求和表示悔過，持槍看管的「同志」（也是化裝的）一邊走一邊朗誦他們拒用銀幣的「禁令」。

在街頭，隨處都可以看到被「動員」而來的工人學生扭着「拒用銀元」的秧歌舞，報紙用全部篇幅來登載這些「新聞」，但是最遺憾的是老百姓絲毫沒有「覺悟」的跡象（當然他們時時要謹愼地提防統治者的武力），銀元黑市在大力宣傳之下，結果實在令人不盡滿意，黑市竟由一千元漲到三千五百元。

我有機會同一個負責經濟工作的部長談談經濟問題，我開頭就說：「老百姓已失去了對任何紙幣的信心！」

「這是一種無原則的說法，我們的紙幣與過去的紙幣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人民幣不但具有一致的流通性，並具有高度的戰鬪性。」

我請求他解釋所謂本質不同的意義何所指以後，他繼續說：

「一個是官僚資本集團的經濟，一個是人民的經濟。」

「可是，通貨膨脹所加給人民的痛苦並沒有兩樣？」我緊接着問。他又繼續地辯：

「以前的通貨膨脹是崩潰前的徵兆，是一種失敗中不可挽救的困難；我們目前的一些現象，只是勝利途中不可免的困難。」

「那麼，困難的克服要多少時間呢？」

「不會太久的，我認爲把破壞份子全部肅清也就差不多了。」他很肯定地說。

不必我再爲他這屬於名詞游戲的辯論，附加什麼註釋，誰都會以爲這樣的說法是過於單純而天眞，他自己首先推翻了「政治是經濟的反映」的一套說法，相反地他把經濟的不穩定只歸罪於人爲的政治因素。他並且非常自信他以前的工作經驗，據說做他還是一個中等知識份子出身的老幹部做過面積不足一縣的「邊區」專員，搞過非常有成績的經濟工作，許多農村和小城市的經濟工作經驗使他自豪和自信，可是他却想不到武漢地區的經濟問題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是整個國民經濟不可分的重要的一環。與我同去看他的一位同志在辭出以後，曾批評過這位部長犯了所謂「經驗主義」的錯誤，但我覺得「經驗主義」已是一般老幹部僅有的拿手戲，就這位部長來說，由於他的能力與學識的欠缺，所加給於人民的影響，將是一件

極難想像而無法彌補的事。我和那位同志都是被認爲在大學裡學「反動」經濟的，當亞當斯密斯和李嘉圖都變成了歷史上將被清算的罪人時，我們怎敢用我們僅有的一點正統派的學識，來同他辯論所謂「人民」的經濟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共患難不能共安樂

對於那些草莽出身而得志一時，但終於失敗的一些人，歷史家曾有過極深刻的評價。在中國近代史上佔一頁重要篇幅的太平天國就是一例，我毫無意思批判太平天國在史乘上的功過問題，只是關於以洪秀全爲首的幾個領導人物的成敗，我曾聽見歷史家有過「共患難不能共安樂」一類的論述。我同一位曾在東北某師範學院做過講師的新同志，談起我們當時許多失望的事情，我曾感慨地用能共患難不能共安樂的話，來批評我們當前的統治者，他非常同意我的意見。不料，這位性情直爽的新同志，竟冒然地在小組開會時候提了出來，他的一番好意只有我才能體會，他是抱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所謂對「革命」負責的態度來發言的，發言中指出發生在我們週圍的許多不愉快的事實，結果，他竟遭到了包圍性的批評，有人逼着他列舉事實，有人說他有意歪曲和誇大事實，有人指責他沒有認清事實的「本質」，有人說他故意加重事實的嚴重性，以達成他渙散「鬪志」的目的。可是，這位個別的同志還一再申訴他的善意，並始終不肯認錯。他在急得沒有辦法的時候，竟說出我也是有同感的一個人，於是，這個會立即放棄了原來辯論的題目，唇槍舌劍又集中於我們所共犯的「自由主義」的錯誤上來。（毛澤東論「自由主義」者的第一個罪狀就是「當面不講背後亂講」，關於極權統治者所謂「言論自由」，到現在我還認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當面講、受批評；背後講，更受批評；當面與背後都不講，越法要受批評，因爲不講話被認爲是不敢暴露思想的人。）

這些不愉快的事情，「組織」上本不打算給我們知道的，但遇到一些被認爲嗅覺最靈敏的知識份子，

尤其是我們就生活其中，所以難免有些掩蓋不住的事情被我們知道。

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們搬過八次家，每次搬家的時候絕不是爲了便於工作和房屋大小多少的理由，只是想保持各單位之間關於房屋爭奪的均勢。大的均勢保持了，各單位內部的紛爭則是一波未息又起一波。我們機關裡管「黨務」兼管「照顧」的工作人員，最頭痛的就是搬家，但「上級」命令必須執行，因而他們也悉慢慢地了息事寧人的那一套。他們在搬家之前首先要勘察新屋並繪製了房間的圖樣，按照不同「生活待遇」的老幹部人數做適當的分配，分配草案要經過不止三次的討論和協商來通過。老幹部可以根據他自己的「革命功勳」要求一定的「生活待遇」，其他「資格」相等的老幹部更有要求劃一待遇的權利。房間大小與窓子多少，常常變爲爭執的焦點。房內陳設和傢私是第二步爭奪的目標，假如一個團級幹部的房間裡原有一張彈簧床和一張沙發，其他的團級幹部就會向「組織」要求劃一待遇，假如拿掉那個已有的東西解決不了問題，就必須同時按人數添置彈簧床和沙發。我所遇見的一位科長，爲了兩張椅子就會向「組織」上提過這樣的意見：「他們是團級，我也是團級，他們有兩張籐椅，爲什麼我沒有呢？」

一位搞隊列工作」的老同志曾告訴過我這樣一件事：事情發生在他們的機關裡，一個做副部長的師級幹部，在他分配的房間裡，接收了一個原來就裝有的冰箱，這位副部長也就不時地利用它來冰一點東西。可是那個機關裏的師級幹部却不止他一個人，另外的六個憤憤不平地向「組織」要求待遇劃一，冰箱當然不能分爲七份，原來享受的人既不肯放棄，「組織」的解決辦法，只有另外再買六個冰箱。那留在漢口觀望的外籍冰箱商人，在「解放」後一落千丈的商條中，有了這樣大宗的主顧，實在是意想不到的喜事，據說除了立即交了四件現貨外，不足的兩件，還是託他在香港的經紀人代購的。

這件事後來雖然是受到了「上級」的批評，但是那個負責「照顧」的幹部，却始終認爲自己的處理，非但合理而且是極其公充的。那幾個大幹部的冰箱，也並沒有因爲「批評」而被收回。

告訴我這件事的人非常感慨地說：「在延安以及打游擊的時候，同志之間如果只有一條被子，誰都不肯自己蓋，你讓我讓，最後可能是給身體最壞的，或是有病的同志受用。現在可不行了，如果只有一條被子，誰都不肯放棄，你搶我奪，最後的結果可能是按人數把它剪成多少塊！」

「生活待遇」與「革命功勳」（即入黨時間）成正比，毫無「功勳」的新同志是絕對沒有資格的（當然也從未被考慮過），不但要安於所分得的「生活待遇」，對於這被認爲合理的，而實際上不合理的現象絕不能稍加意見，因爲與老幹部計較生活待遇，將是被認爲犯了「平均主義」的嚴重錯誤。

我此處所說的「生活待遇」僅是屬於住的部份，所謂爭房子爭傢私是指「同志」們的臥室，至於辦公室則已被認爲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了，因爲長年的游擊生活已使他們非常習慣於在臥室裡「辦公」。

「革命實際」的種種

在北平以及行軍階段中，許多人還替自己的失望加以寬心的解釋，認爲在那片面而空洞的「學習」中，難免有强制與乏味的感覺，總以爲接觸了實際工作會好一些。何況在這個階段中，接觸最多的還只是一些被認爲帶有一身毛病的新同志，這些人據說正如列寧所謂是最容易犯有「左傾幼稚病」的。許多人便常常想，假如生活在經過十幾年「革命」鍛鍊的老「同志」中，一定要好得多。雖然我們已經遇見過一些作風不好的老幹部，但終還希望這僅是少數中的少數。希望是生活的動力，誰又肯輕率地承認自己的絕望呢？

到漢口後，證明這種解釋純屬自己的奢望，存有奢望的人終於見到了更多的老幹部，老幹部的問題不但更多而且更爲複雜，到這時「組織」上才開始强調認識「革命實際」。認識了實際，有些人不得不在「革命實際」中混下去。有些人則想盡各種理由請求回北平或是調動工作，結果當然是一概不准。一個清華大學同學就在不能辭不能調的痛苦中，自戕了自己的生命。這自殺的消息是耳朵對耳朵傳出來的，大家的情緒更爲不安，因爲沒有人親見到這位同學究竟是怎樣離開這個世界的，是不是自殺？爲什麼自殺？自殺後的屍體呢？難道連一個哀悼的儀式都不能舉行？「組織」上越設法掩飾，大家的疑問也就越多。

一個北大畢業而有幾年銀行經驗的同學，曾被派在「人民銀行」工作，銀行的主任只問他「入過黨沒有？」「是不是開封人？」兩句話，便派他在門房裡做了收發員。他會用最大的努力去鑽研過「資本論」「剩餘價值」以及「人民經濟」的許多理論書籍。結果在「革命實際」中，只能在來往信件上做編編號碼

的工作，他的失望當然是意料中事，後來他知道他不能被信任和重視的原因，第一是沒有「組織」關係，第二不是開封人，對於前者，他只能恨自己「覺悟」得太晚，是件無可如何的事，倒也罷了。對於後者，他更是憤慨不平。據說那位主任完全重用自己的小同鄉，銀行中許多人也都爲此而不滿，所以那家「人民銀行」竟有「開封銀行」的別稱。在共產黨的字典裡，也可以找到「宗派主義」四個字來形容這種現象，可是當這個做收發員同志以「宗派主義」去批評那個主任的時候，却碰了一鼻子灰。那個主任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見，並振振有詞：「起用同鄉我不否認，但同鄉們在一起工作確有很多好處，至少不會發生語言上的障礙，並更能清楚地知道彼此的歷史和家庭成份」。這個同學告我這件事以後，他憤慨地說，他準備溜回湘南老家種田去。

經過幾個月訓練的知識份子，在「革命實際」中都有了新的工作：

兩個師大歷史系三年級的女同學，被指定「貼」資料，資料的選擇由老幹部來做，她們只管塗漿糊。

一個在交大學工商管理的同學，在一家改名「人民劇院」的戲園子裡做售票員。

有五、六個山西大學學經濟的學生，被派在軍郵局檢信和投送掛號函件。

師範大學畢業的和幾個清華社會系的女同學被派在托兒所工作並兼做褓姆。

一個「解放」前準備留學的助教，當了領取糧食摺帶的管理幹事。

大部份的知識份子幹部都當了「文化教員」（文化教員與政治教員有別，前者只能教授最簡單的自然常識和看圖識字的東西），在軍事機關裡教「通訊員」「炊事員」「飼養員」等識字。

有些沒有分派到實際工作而被認爲過於「落後」的一些人，又被集中「學習」，或是參加當地的「大學」。

「大才小用」只是「資產階級」社會裡特有的名詞，「新」社會首先否定的，就是「才」，當然更談不到大小的問題，何況假如確有其事，也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呢？

那個曾經被認爲起「帶頭作用」的清華大學教授盛澄華「同志」，到武漢後，我們只在一次校友會的席上見過面，他的「革命」熱情早非昔比了，不過，他還算風頭很健，在會場上帶頭喊過「萬歲」的口號以及領導唱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校友會本被認爲是稿「宗派」關係的東西，在華北曾通令禁止過，到武漢後，據說主持籌備的人，去找過幾次做中原「教育部長」的潘梓年校友，終算由他的「時事報告」代替校友們的敘舊談新，才特准召開的，當場一個不悉內幕的校友發言，因而曾遭到禁止）。

這位天眞而不甘寂寞的盛教授，被「動員」而來的時候，總以爲可以混得一官半職，結果他在被當做宣傳廣告一樣地完成了「上級」的任務之後，在「革命實際」中，才知道仍然被派到武漢大學去教書。這位並未「覺悟」的教授，竟覺得武大不如清華，尤其是他聽說清華園的故人，多賺幾十斤小米的時候，他才開始另一次的覺悟。同時他在「進步」的武大學生中，被批評爲「新官僚」，因爲他常常把脫下來的衣褲交給「翻了身」的工人去洗，據說在一次「檢討大會」上，有個學生當面指責他，說「風頭主義」就是他參加「革命」的動機，並說他在幾個月的「革命」鍛鍊中，連最起碼的「勞動觀點」都沒有學到，糟蹋了幾個月「人民」的糧食。聽說這位教授當場曾掉過幾滴眼淚。

後來，在不知不覺中他竟悄悄地溜回清華園去了。

正如統治者所說：「任何失望都是咎由自取」！每個失望的人除了「糾正」自己「好高騖遠」的思想外，任何想法也將是無補於「革命」的實際了。

「罪惡」與「腐化」的學習

統治者曾經年累月地住在窯洞裡，他們所熟習的僅是某一特定區內的農村和山洞的生活。對於城市，不但是出身農民的老幹部把它當做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知識份子出身的，經過了十年二十年的隔絕和歪曲宣傳，記憶中的城市也都變了顏色走了樣子。在「趕不上形勢」（士兵習用語，形容「勝利來得太快」）的今天，統治者只好丟棄「腐化」「罪惡」的那套宣傳，萬惡的城市一變而爲「學習」的重點了。那些極其保守與固執的農村幹部，被迫要去熟悉過去認爲「罪惡」與「腐化」的「城市知識」與「城市政策」的時候，簡直有點「搞不通」。「搞不通」的只有挨「批評」，「罪惡」與「腐化」也必須要學，因爲這些出身寒微的老幹部，不久將都是走馬上任的城市接管大員了。

我不想介紹一些因爲城鄉生活習慣不同而引起的類似笑話的事情（像在北平發生的，把地氈當被蓋或是在抽水馬桶裡洗臉等），因爲拿這些事情做爲立論的根據，共產黨人會認爲不平的，事實上畢竟也不是根本問題，下面我想寫一點關於極權統治者「只問思想不問工作」的政策，在城市接管工作中所發生的影響。

我曾因病住過一家剛被接管的市立醫院，這所醫院的規模並不小，設備也很齊全，由一個十六人組成的「醫務所」負責接管。十六個人包括兩個醫生，一個所長，一個軍事代表，十二個幹事。除了所長是冀南邊區」的，一個山東籍的醫生是哈爾濱醫院借調的，其餘的都是來自大連。

醫院裡呈現非常不穩定的狀態，舊有的醫師護士惶惶不可終日都是拖一天算一天，第一個月的薪水平

均只能折合銀幣九毫，據那位所長解釋，「人民政府」的薪水是絕對合理的，只是那銀幣黑市不大合理。舊有人員恐懼和觀望的態度以及對接管「同志」的隔閡，使我非常驚異。白天和晚上，醫院裡都是靜悄悄的，只聽見被接管病人的呻吟聲，難得看見一個做接管工作的「同志」。當那個所長以「同志」之誼來看我的時候，我毫不客氣地冒用「上級」的口吻對他說：「你這樣搞工作不行啊！」，我的生活待遇（所謂吃中灶）以及我的一般知識，已足夠使他相信我是比他更老的老幹部，在新幹部普遍遭受歧視的情形下，我在醫院裡曾冒充過一個時期的老幹部，尤其是他知道我是「新華社記者」更誤以爲我是「組織」上特意派來調查和監視的，當然他並不可能知道我們「人民」記者的內情是怎麼一回事。

他首先請我原諒他們十六個之中，除了那個山東籍的醫生外，都是半路出家的，很少搞過醫務工作，他本人只是在「老區」一個縣份裡，幹過一任醫藥所的主任，那個醫藥所是根本談不上設備的，只有兩個學徒性質的助手。然後他又告訴我這家醫院實在太大，員工總數竟有二百三十幾個人，大的藥庫就有三個之多。最後他又悄悄地說，因爲不大相信舊有人員，他們十六個人都親自去接收和清點藥品，據他自己估計每人一天做十四個小時，兩個月之內都不會完工的。這時，我爲了掩護「上級」的身份，非常嚴肅地對他說：

「你必須要發動羣衆，羣衆並不是完全不可信任的，同時你可以設法啓發他們的覺悟，依靠羣衆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務」。

我又告訴他既是一個做接收工作的主管，就應該多做些計劃和領導的行政工作，不應該專門去清點藥品。

他不住的點頭，對他的沒有計劃而顧此失彼表示歉咎，不過，他又强調這個醫院的「反動性」太强，「反動份子」太多，據他調查所有的員工都是舊舊的「反動關係」介紹來的，他的意思，指這些人都是不堪「改造」和永遠不能「覺悟」的一羣。

事後證明他的謙虛態度，只是對「上級」的一種敷衍。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主觀的「經驗主義者」和性情暴戾極其粗心的「官僚主義者」。

我以後常常聽到他的咆哮，他曾公開指罵舊有的醫師是「反動份子」，有一次住院的一位小「同志」不知怎樣遺失了一枚胸章「他用非常粗魯的話警告全體護士：，他媽的，你們這裡一定有特務，要不替我找回來的話，他媽的一個都跑不了，我都捆你們上公安局」。又一次，他對一個指責他的護士說：「再嚕嘛，我就把你槍斃了！」那些一向被認爲斯文而神聖的護士小姐，只有背地裏去哭，因爲被接管以後，她們也算是參加了「革命」，想隨便辭職已是不大容易的事了。

因爲夜裡沒有開水喝，我曾向一個接管的女同志提過「意見」，不料這個年輕的女「同志」，却以北方鄉村老太婆的口吻向我嘮叨一番：「同志，你熬幾天就好了，現在，咱們正在接收，還由不得咱們，等接完了，大權拿到咱們手心兒裡頭，什麼事都好辦了。」

這談話是與她美麗的面龐不相稱的，她的談話足以說明她是一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家庭婦女，後來我知道她是當地衛生局裡一個科長的「愛人」，是大連特殊化以後入黨的，本來是大連一個製藥廠的女工同以前的丈夫離了婚，才參加工作，派到這個醫院來是準備做總務科長的。

對於這樣的一個人，是不能苛求什麼「思想」的，所以對她的一些應該被批判爲「封建意識」的許多

話，我未發一言。

當我能下床來走動的時候，她曾領我到最近的藥庫裡參觀他們的接收與清單工作，所謂藥庫是長約丈許的一間房子，裡面大部份是封裝藥品的木箱，另外就是一些裝有藥品大大小小的瓶子，當我知道他們的所謂「接點」工作的情形後，我眞是又好笑又好氣，說來你也許不會相信：他們用甲乙丙丁戊來登記瓶子的大小，而用紅黃藍白黑來記載藥品種類的，他們雖然非常有耐心地連原裝的木箱都折開來清點，結果在他們清單的清冊上只能看到甲乙丙丁戊的瓶子各多少個，紅黃藍白黑的藥品各多少瓶，當我好奇地問他們時他們還以爲我想要表揚或是慰勞一番，不料，我當場就指出這樣不按照藥品的名稱，性能和重量分類來登記的工作，是幼稚而徒勞的事。那個當所長的「同志」走近來告訴我，他們只是想先大概瞭解一下「情況」，以後再預備清理一同。他又悄悄地對我說，最苦的一件事是他們十幾個人都不識英文，而那些所有的藥品上都是一些歪七歪八的英文字，這已在進行的登記辦法，還是「人多出狀元」，大家想出來的。他又解釋他們的所以不識英文，是因爲以前搞醫務工作完全用的是日文名詞，那個唯一的醫生也僅能稍通日文和德文。

在醫院的幾天，我的僅有的一點英文醫藥知識，對他們有過很大的幫助。出院以後我曾同「四野」衛生處的一個醫生談過這類事，他却引用了一句列寧的話：「學習，學習，再學習！」共產黨人是深信任何鄉愚經過「學習」都會成爲名醫的。他更不大在意地說：「假如有這一類的事情，經過「學習」就會好起來的好一個「假如」！「假如」不是我親眼看見的話我也很難相信類似的傳說，正如同我最初不相信天津一家銀行裡發生過的事情一樣，據說派到銀行去接管的幹部，第一步工作是把所有的帳簿收集在一起，用

網子捆起來稱一下斤兩就封藏起來了。

當然衛生當局知道了這些情形，也有些不大放心那個所長的工作，後來規定凡是做手術以及領用重要藥品，都要那個所長到局長那裡去「請示報告」，結果更糟，後來曾因延誤手術時間竟使一個盲腸炎患者不治而死，報紙上雖登有「接管小組已進行了檢討」的消息，但那個暴戾無能的所長並未因此而撤換。

統治者原也無意把這一類的事情讓它延續下去，不過，他們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只有這些人才是被信任的少數，所謂信任是單純指「思想」，絕不是對某種工作的經驗和能否勝任而言。「思想」靠得住，工作會不會沒有關係，好在可以「學習」。對於這些出身寒微的老幹部，統治者爲了糾正他們懼手懼脚的鄉愚作風，曾儘量慫恿他們「放手大膽地搞工作！」報紙更不斷地表揚新創造的而實質爲舊的經驗。在「創造經驗」的過程中，正爲統治者所說，難免要發生一些「偏差」，東北各地報紙上曾指出一九四七年的「土改」工作上犯有「分寸上的偏差」，看了這樣輕描淡寫的新聞，誰都不會意識到所謂「分寸的偏差」是包括在「土改」中被鬪錯了的富農、中農、甚至於貧農將近十萬條的血腥性命。

「為人民流血是光榮的」？

有個朋友在感慨中國大陸已失去任何選擇工作的自由以後，曾說：「不過，醫生畢竟還算是得天獨厚的一種職業！」這是極其膚淺而純屬局外人的說法，極權統治者根本否定了人民的自由，絕不可能分別其統治，對某些人加緊，對某些人放鬆，只不過在製造大規模的戰爭中，對於急需的某種人才，在「動員」之初，稍施小惠而已。但一旦被「動員」進來，任何人都被認爲是「自願」參加「革命」的。參加「革命」的方式容有不同，有的被「請」，有的被拉，有的被「動員」，有的被脅迫，可是等到一跨進了「革命」的鐵門，只有承認是出乎「自願」，不如此，輕則被指責爲「落後」或「覺悟不夠」，重則要被迫接受「反動份子」或「背叛革命」的後果，醫生又豈能例外？

我住在醫院的時候「就認識一個做醫生的朋友，我說朋友事實上是「同志」，他是醫院接管小組的唯一的醫生（派來接管的原有兩個醫生，另一個據說是中藥店學徒出身，經過多年苦修而學貫中西的中西兼長的醫生），他更是十六個人之中唯一的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我們一見面的時候，彼此就感到非常親切，他非常關切呻吟在床上的病人，每天清早他都會準時來看我，問候我的病狀和飲食，更輪流到每個病人面前去探視，他是我參加「革命」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一個有熱情有血性的老「同志」，也是唯一可以與舊有醫師談談的一個人。

最初我們的感情還只限於「革命同志」之間的感情，後來他知道我也是知識份子老幹部時（當然他也很難看穿我的假冒），更是關懷備至，他把自己的並不能保暖的軍用熱水瓶放在我的床頭上，替我解決了

夜間的開水問題。有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鹹鴨蛋來，他知道我非常不習慣吃那送稀飯的不知名的鹹乾菜。沒有事的時候，他常常很有耐心地分析給我聽，怎樣在最簡單的生活中取得最大的營養。

他告訴我一些關於他的故事：父親在濟南一家公司裡當過跑街，一個月的薪水維持不了五口人的生活，他初中畢業後便自食其力，在一家報館裡做校對，自修了幾年，以同等學力考取了以醫科聞名的齊魯大學。他學的是外科，不幸他剛一畢業，家鄉便被日本人佔領了，他不顧一切地跑到魯南去打游擊，在打游擊的時候才接觸了共產黨，勸他加入「組織」的人曾煽動地對他說：「成千成萬的抗日傷員，呻吟在解放區的病床上，他們是多麼迫切地期待着你呀！」可是他一到了「解放區」，却非常失望，原來只是被派到宣傳隊去演話劇。後來他一再地向「組織」要求幹本行，始終沒有獲准，延安退守以後，他才有機會當個醫官。他專心一志想在業務上求發展的理想，不斷地被指派給他的政治任務所打斷，他表示非常不習慣於那種生活。

但是爲了怕遭到我的批評，他又說他現在什麼都習慣了，只是學醫的志願沒有辦法達成。不過，他並不灰心，這次被派到這個醫院來工作，他準備向那幾個留過學的外科大夫好好學習一下臨床工作。他不懂英文，但非常熱心地想學，常常拿他新買的英語會話來請我教，我的英文雖然可以讀通那本會話，但我認爲會話一類的東西對他學英文的目的幫助有限，並勸他不如跟那些留過學的醫生去學，從醫藥名詞學起更實用一些，這時他却悄悄地告訴我，小組裡對他已經有過一些不好的批評，說他常常跟那些「反動份子」來往，將要犯「原則」上的錯誤的。

自此，我們的感情，已超越了「同志」的範圍。我曾和一個原來做外科主任的老醫師談起托兒所的制

度，這位被認爲「反動」的醫師，把托兒所制度批評得一無是處，最後他非常激動地說：「我認爲托兒所制度的廣泛發展將是人類的悲劇，因爲母教與母愛畢竟是神聖而偉大的！」當時我雖可以繼續同他辯下去，不過，事實上，我本身就是不幸而缺乏母教與母愛的一個人，這在我早就認爲是一件終生無法彌補的憾事，此刻我怎能向他做違心之論呢？但是每個參加「革命」的人，都指定有必須爲「革命」而辯護的義務，我的不發一言是否將有損於「革命」的「尊嚴」而遭到批評呢？這時，那位熱情的醫生「同志」曾接着替我做了一些辯論，他的見解雖近於强辯，但我認爲還是相當精彩的，他說母教與母愛的是否偉大要由母子來決定，不能一概而論的，同時他又列舉英美著名孤兒院培養出來的知名人物而爲托兒所辯護。等那老醫師走了以後，他笑着對我說：「要不把他說走了，你這個大記者將要被他們當做話柄了！」我也笑笑。

不料，當天午夜他突然走來叫醒我，我睜開朦朧的眼睛，非常驚異他那沮喪緊張的神情，他坐在我的床邊，沉默了一回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又隔了一回，他說：「我要走了！」

在親感情如渣滓的「革命隊伍」中，對於「同志」們的走，從沒有人用過太多的感情，最初也許還會彼此慰勉一番，經過幾次調動以後，誰都會覺得這跡近敷衍的慰勉也可以免了。命令來了就得走，五道一聲再會都覺得多餘，尤其是經過多年磨練的老幹部更非常習慣於這種生活。

可是，我的醫生朋友却是如此善感的一個人，頗使我有點不安，我接連地問他：做得好好地爲甚麼要調走？調到那裡去？調去幹甚麼工作？

他一邊搖頭，一邊湊近我的枕頭，他首先叮囑我替他保守秘密，他說他是不能抑制感情的人，有事情就想說給人家聽，自己才覺得痛快。他的走不是調動工作而是準備不幹了，在天亮之前想離開武漢。他繼

續告訴我一些前此未說的事情：他離開哈爾濱醫院的時候，「組織」上怕他不肯到南方去，會用讓他做院長或接管主任一類的話來「動員」他，他當然「服從組織」而來，做不做院長他並沒有計較，可是到武漢以後，因爲幹部間的派系摩擦竟使他沒有工作機會，後來他找了「市委」的「組織部」才派他來做駐院醫師，可是小組裡却不能容他。除了所長以外，只有他不是大連來的，他的待遇很高（醫生另有一點技術津貼，所謂很高每月不會超過港幣十元的），尤其使那些人不滿意。他們之間的關係早已有了裂痕，所以除了開會之外，他很少同小組裡的人來往。不料在他不知不覺中，小組裡的「同志」向衛生局告了他一狀，第一個罪名是「脫離群衆」，第二是「同反動份子拉攏關係」，最後一個說他的作風不好，並是一個十足的「自由主義者」，背後講「組織」的「怪話」，對「勞動觀點」缺乏認識，從不參加清點藥品的工作。詳細的情形我已忘了很多，記得他當時是把小組開會的紀錄拿給我看的，那個大連派來的衛生局長，對他的過去本來一無所知，竟毫不考慮地接受了小組的意見，盛怒之下決定調他到衛生局去搞文書。當天晚上他聽說調動的消息後，便找衛生局長去申訴，他告訴那個局長，他是非常想在業務上求進修的人，不想也不能搞文書工作，但是他一番努力只換得衛生局長的笑落，那位局長竟說一句「幹文書總比討飯好一點」的話，血氣旺盛的他當然不能忍受，便譏寫了「首長」幾句，最後他憤憤地說：「隨便怎麼樣，都不幹了！」那個局長冷冷地說：「幹不幹由你！」這樣他便離開了衛生局。

這是他企圖「脫離革命」的經過，最初我還勸他冷靜，不要意氣用事，我說假如眞有這樣的「首長」應該設法批評他，不料他却慟哭起來，他絕望地告訴我，十多年來東也幹西也幹，把他所學的一點東西幾乎忘乾淨了。好容易才盼到像今天這樣安定的環境，他總以爲可以完成他那做個好醫生的宿願，結果却弄

得如此下場。

我非常感動，不過還是勸他多考慮一下，他却非常堅決地說：「甚麼叫革命？我已經看穿了，他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幹了！」，他又繼續告訴我一件本來「組織」上不准他講出來的事情，他原在東北「四平戰役」中負過傷，那時因爲要阻擊「敵人」，「組織」上是把所有的政工人員和做地方工作的「同志」都當做戰鬪兵來使用，後來雖然是「贏得戰爭」，但是死於「四平戰役」而素無軍事訓練的大中學生，不知有幾千人。他總算是幸運生還的一個，不過腿部神經受了傷，變成了終生的殘疾，他掏出一個非常精緻的殘廢證給我看，上面貼有他的照片和註明三等甲級的殘廢等級，前面一張白紙上印有朱德的親筆字：「爲人民流血是光榮的！」

他收回了殘廢證，反複地說：「爲人民流血是光榮的？光榮！這就是光榮的代價！」

這一切對於我還都是初次，除了表示極大的同情外，我竟不知應該用什麼話來安慰他，或是勸阻他，最後他以粗大的手向我道別，我只能說出珍重兩個字。

他走了以後，便沒有了消息，當我在兩天後向一個接管女「同志」打聽時，她却毫無表情地告訴我：

「他犯了錯誤，已經被扣押起來了！」

到那時我才知道，那個衛生局長欲擒故縱的陰謀。非常遺憾，我沒有盡我的可能來勸阻那個年青而熱情的朋友，而這遺憾直到今天，還留給我有如過失殺人一樣的不安。

「游擊習氣」舉例

離開醫院以後，我同另外七個人調做「機關工作」。同路行軍的同業大部分都被派下鄉去搞「土改」和直接派到各兵團的連隊裡去，從「舊」意識來說，我們的安定生活以及能在全野戰軍最上層的機關工作確使他們非常羨慕，但是從「學習工農兵」的大道理來說，他們也許以能與士兵農民做「朋友」而感到驕傲。儘管羨慕與驕傲，都被認爲是「小資產階級」的虛浮感情，事實上，當我同他們握別的時候，那些失望與沮喪的面孔，已充分地說明了他們（連被調走的所謂積極份子在內）還是一些被「舊意識」所支配的人。

我開始了一段新的生活，被調走的人以後很少見面，也很少知道他們的情形。與我同時被調的七個人都分散在各機關裡，而與我同時派在一個機關的兩個人，也分散在不同住址的其他單位，我的週圍都是至少三年以上的老幹部。

我最初被調到宣傳部來，正如一般的調動工作一樣，並沒有什麼職別和名義，僅有「調部工作」四個字的命令，當時我曾用盡我的「舊」意識，來找尋我被調的原因，但是，除了我曾與一個負責實際工作的副部長有過幾次接觸以外，實在找不到任何理由。到部以後我才發現我的工作，被認爲「文化水平」差的老「同志」幹不了，而又爲有工作能力的老「同志」所不屑幹的。同時，這個龐大的機構，過去除了所屬的實際工作部門以外並沒有所謂「機關工作」，「首長」的一句話一張紙條可以代替任何的公文和手續。到大城市以後，正式有了「衙門」，才提出了「正規化」的口號。

「正規化」是針對糾正所謂「游擊習氣」而言，當「游擊習氣」根深蒂固地瀰漫在各級機關各級幹部之間，絕不是一個運動一些標語所能糾正的。許多機關往往是只有一兩個有行政頭銜的「首長」，他們手下的幹部從沒有什麼名義，「某某同志」是彼此間最習用的稱呼，工作的分配當以幹部新老的程度爲依據，屬於一部門的工作，遇有緊要的時候，可以下令所有其他部門的人一齊來幹，許多人都是打雜性質地東幹幹，西幹幹，沒有確定的工作任務。有確定工作任務的也僅僅是名義而已，工作以外的工作，也必須要幹不幹的話就要受「批評」，誰忙就得幫誰幹，不幫的話也要受「批評」（毛澤東論「自由主義者」的第二大罪狀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八個字）。

這只是屬於工作制度上的一些，至於老「同志」們生活習慣上的「游擊習氣」，那就更舉不勝舉了。長年的游擊生活使他們糢糊了時間觀念，一分一秒的來算時間，那只是西方剝削工人的資本家所計較的事。進駐城市以後，雖然也有了辦公時間的規定，但老「同志」們都視同具文，辦公室裡新買的鐘常常停擺，上上發條和撥撥快慢都屬於專門知識，何況許多老「同志」都習於從太陽來判斷時間，日出日落才算是十二個時辰。

辦公室已被認爲可有可無的東西了，死坐在辦公室裡，更不是「同志」們所習慣的事。沒有事的時候辦公室裡常常不見一個人，「首長」的褓姆可以在辦公室裡奶孩子，小孩子大小便也可以不出辦公室，女「同志」的內衣褲和小孩子的尿布晒遍了辦公室的走廊上窓沿上，琳琅滿目。「勤雜人員」（士兵待遇的各種人員）可以在辦公室的桌子上沙發上睡午覺，或是躺在那裏哼哼「翻身歌曲」，炊事員的一聲呼叫任何人都可以放下工作，跑去幫忙切菜和包餃子。

大「首長」在臥室裡由孩子和「愛人」陪同辦公，小「首長」無公可辦，常常聚在一起扯扯(閑談)，或是拿撲克牌來打打「百分」。不過，他們絕不是對「革命」不負責，如果有人去找他們，不論事情性質如何，不拘時間地點，他們都可以立即拿出新鮮證的五一型水筆寫上幾個字，有時也許蓋上一個啓用不久的牙章，夜裡一兩點鐘，只要把工作說得緊急一點，他們也無不欣然起床來辦一下公的。

天熱的時候，男「同志」背心都可以不要穿，長褲子捲起幾摺來當短褲用，拖着踩倒了後跟的鞋子（赤脚也不會有人干涉），照樣可以上辦公，女「同志」也可以穿着最內層的衣褲，赤脚到辦公室裡來。早晨起來，十個手指代替了牙刷肥皂和木梳，蹲在自來水龍頭下，捧幾捧水來洗臉，兩只衣袖便權做毛巾。黃昏以後，脫得赤裸裸地，開足了龍頭，便痛痛快快來一個淋浴。有些怕熱的「同志」，晚上可以在通風的地方舖上兩張舊報紙睡個風涼覺。

冬天來了，「同志」們把春夏秋冬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用多餘的文具和破爛的桌椅維持一個火盆，抽煙的拿廢報紙捲一點關東煙便可過過癮，不抽煙的把剩餘的津貼買幾塊生紅薯，放在火盆上烤一烤，烤熟了連皮帶髮吃得一乾二淨。一到冬天，就很難有一兩次洗澡的機會，從被動到主動，不洗澡已經日久成習那些整冬不換洗衣服的「同志」，偶一高興在別人的床上坐一下，便會掉下來一些蚤子，誰敢縐縐眉，就是太「小布爾喬亞」了。蚤子不但在「新」社會裡有了更多的繁殖機會，在「革命隊伍」中，並尊稱爲「革命蟲」。最「進步」的新同志，常常找兩個蚤子來放在自己的身上，並以此爲榮，本來麼，沒有「革命蟲」的人算得上什麼「革命」？

一個部長告訴我，廣州「解放」的時候，外籍記者曾有如下報導：「解放軍的紀律很好，只是衣着骯

和襤褸，有如行乞的行列」。這位部長絲毫不以爲忤，並笑着承認：「確是觀察入微！」

有了好環境，有了好條件，統治者也隨時都想糾正這些有礙「革命觀瞻」的事情，不過，只是「同志」們的習氣太深了點，一時還是難於見效的，「正規化」的口號也就是爲此而提出來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被開刀的人

我到新機關以後，第一個接觸的是秘書科的科長，廣東人講得一口純熟的國語，九一八的時候他還是北平的高中學生，將近二十年的磨練，他仍帶有濃厚的一般老幹部所缺少的讀書人氣息。我們一見面的時候，他對我很感到興趣，也表示得格外親切，他曾一再地問起北平北河沿的母校，北海溜冰，故宮的建築，以及頤和園的銅牛，他都非常關心地提到。他對這來南下沒有機會在北平多住幾天，表示非常遺憾。當我接觸了太多的冷面孔，說話一字一句都要考慮的老幹部時，對於這個實際工作的負責人，確有很大的好感，我更驚異他毫不盤問我的「組織關係」，而對我彷彿寄以極大希望與信任。

我們的談話是在他的臥室裡，我坐在他的可以轉動的辦公椅上，他非常隨便地靠在沙發上，有時伸出他赤着的兩隻脚，有時又收回去，甚至有時蹲在沙發上和我談話。當時給我的印象，有如我在大學宿舍裡同一個很熟的同學，不拘小節地聊天一樣。他曾非常感慨地對我說：

「北平的知識份子都是優秀的，我們實在需要太多的知識份子來做工作，「革命」才越有希望！」

在談我的具體工作之前，他告訴我這所謂秘書科是新成立的，準備替部長處理一些日常的事情和一些對外的工作。秘書科連他雖只有四個人，但却直接領導了很多單位，一個是「放映隊」，以及放映隊所接管的一個電影院，另一個是「中央電影局」派駐四野的「攝影隊」，還有「文工團」「舞踏隊」「軍樂隊」以及「平劇工作團」等單位，這些單位，過去有些是由部長直接領導的，有些是準備由管理科交接過來的。

他提到管理科的時候，像燃起一肚子無名火，非常嚴肅而又極其憤慨地對我說：「這些人遲早都得開刀的！新「同志」在實際工作中也許會遭到許多阻撓，但是自己站穩立場誰都不要怕，資格老不值一文錢，對「革命」負責才是好幹部，任何假公濟私的事情必須堅決反對！」

他那嫉惡如仇的樣子使我非常感動，儘管我還不知道他所說要開刀的是些什麼人，假公濟私是些什麼事情，因爲參加「革命」以來我還從未聽到過（也從沒有人敢如此說）這樣痛快淋漓的話。

他說完了這些話，絕不像其他老幹部那樣立即有所顧及地承認自己失言，或是想辦法來掩飾一下自己所說的話。

他毫不在意地又繼續同我談了一些工作問題，並在抽屜裡掏出一包關東煙的碎葉子，分給我一張用舊信紙裁好的紙條，我非常熟練地捲了一支煙。

他又繼續叮囑我一些話，他說每個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最初都會感到失望的，但千萬不要灰心，不好的人畢竟是少數，假使「革命」要靠這些人早就該垮了。

最後他向我說：「放心做工作，不要强調困難也不要怕困難，不要做「革命老油子」，誰不好，就跟誰搞！」

走出房門的時候，他笑着對我說：「實在搞不好，我們還可以找毛主席批評他呢！」

他的態度和談話，使我感到極大的愉快，會使我對「革命」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假如容我用一句「舊」話來說，在所謂「革命」的實際中，我遇到這樣一個好上司，不但是覺得心滿意足，總算是我交了好運。

我曾同一些不大熟識的北方來的新「同志」談起這件事，他們都爲我祝福。同時他們也感到更深的失望，因爲他們從未想到「革命隊伍」中還需要有向某某「同志」開刀的事以及竟有假公濟私的人存在，當然他們中的「積極份子」，也許以爲我又在有意地散佈「毒素」呢。

我曾向另外一個老「同志」讚揚過那位科長，並說出我們當時說話的情形，不料他却不同意我的意見：

「他確是一個資格很老的老同志，文化水平也很高，只可惜搞不來「人事」。團級幹了五六年還是一個團級，常常跟組織「鬧對立」，別人都批評他有點神經病！」

對於老幹部的談話，我很少參加自己的意見，只有虛心受教才會多知道一點「革命」的掌故，假如發出甚麼甚麼「主義」來，他們雖然未必接受批評，但往往就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不過，這個老同志的談話，使我知道了「革命隊伍」裡，也居然有所謂「人事關係」。「革命」的「人事」怎樣搞法，我雖一無所知，但我已有一些失望的預感，當時我就想如果把這些話說給那些做「天堂夢」的人聽，他們也許不會相信，否則將會感到更深的失望。

我被調以後的一個禮拜，又有再調動的傳說，調動傳說來自權威方面，說我們的科長將被派到部隊去，而爲那個科長所痛恨的管理科長將接他的事。我呢，也勢在必調，出處還不知道，我的工作將由那個管理科長所帶來的班底幹部來繼承。

聽到這樣的傳說，我的不愉快是無法抑止的，我認爲如果確有其事的話，我應該有所表示，我當時決定首先要把這件事情「反映」到最「上級」去，如果「上級」不作合理處置的話，我將要在開會時候痛罵

「無組織，無紀律，跟首長鬧對立，不服從組織領導。」

並提到「黨委會」已給予相當處分，怎樣處分沒有提，而那些空洞的批評所指的具體事實，我也無從知道。只是我在以後偶而表示對那個科長有過很大的好感時，遭到「不信任組織」的嚴重批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個別」的腐化現象

在北平的時候，一位好事的教授會同中共首要劉少奇談起幹部的腐化問題，那位教授是國內聞名的心理學家，他是以研究問題的姿態想明瞭一點被包在破棉襖裏頭的共產黨幹部的心理。他認爲追求物質文明是人類共有的願望，他不相信統治者的幹部就安於最低劣的生活待遇，過去的低劣生活只是限於客觀條件同時也是由於統治者的歪曲宣傳與壓制的結果。他認爲那些被抑止在破棉襖裏頭的心一旦失去了外力的束縛，都會立即恢復原狀的。因此他提出了幹部的腐化問題，可是那個以搞極權理論起家的劉少奇却向他做了空洞的保證，他認爲他們的黨是「布爾希維克」的組織，同時他們的幹部都是受過黨的「良好教育」絕對不會也絕不可能腐化的。那位教授知難而退，因爲他終於體會到，在極權統治區內，同一個掌握實權的人，不能進行甚麼有關學術性的辯論。不過他對那空洞的保證是頗不以爲然的，曾對於屬他的學生的我堅持過原有的意見，他畢竟不相信一個人一旦信奉了有如宗教的共產主義，或者是在偶然的機會中加入了共產主義組織，生理上也會隨之起了變化。他所說的生理變化是指一個人的味覺聽覺和視覺，因爲他曾遇到許多共產黨的幹部把不好吃不好聽和不好看的一些東西一定解釋爲「好」，同時把好吃好聽和好看的東西則被認爲是屬於必須取締或是淘汰之列。當然他不相信這些幹部的話是含有萬一的自己的心意，因此，他深信這所謂幹部的一些人必將會逐漸走向腐化之路，最低也要發生某種限度內的腐化。

事實證明了這位心理學家的見解，我翻開一部「東北局」機關刊物的「東北日報」合訂本時，我發現了絕不是用「某種限度」可以形容的腐化事實，東北「土改」中，幹部打死了或逼死了被稱爲地主的一些

人，搜集了他們的財產，幹部間便以會議的形式來「論功行賞」。最出力的可以分得多少兩黃金和銀幣，站脚助威的幫兇也至少可以分得幾套像樣的衣服，假如被弄死的只是屬於那不值一鬪的中農時，幹部們便「大吃大喝」一頓來仰表「慶功」。當我拿一本精緻堂皇的「土地法大綱」來對照的時候，我不知怎樣來形容我的感覺。在城市中「爭緻獲」而搞「革命家底」的事情更是屢見不鮮。就以這家被稱爲「機關報」的本身，在接管的初期，就有過這一類的紛爭，這家報館原有的全部生財存料據說是非常可觀的，同時來接管的是三個不同身份的主人，「東北局」「東北新華書店」和原名「東北野戰軍」的四野印刷廠，在互不相讓的情形之下，結果是用「三一三十一」的方式解決了事。所謂三一三十一究竟代表着多少數字，這是絕無紀錄可憑的，只有那些接管的個人，對「革命」負責。儘管統治者說這些是已經「進行了檢討」或是已被糾正了的錯誤，或者說這是「個別的現象」，但是一次一次的「檢討」，和一次一次的「個別」正說明了幹部的腐化，已成爲帶有發展性的問題。「東北局」窮於應付這些「個別」的事件時，只有在它那以「不要叫勝利衝昏了頭腦」爲題的機關報社論中着急。

「二野」由武漢過境而向西南進軍的時候，駐武漢主管經費的「同志」，據說領取巨款潛逃而被抓回，四個月以後，我們才有機會讀到關於這件事的一則新聞，新聞中首先聲明當事人在參加工作的九年中，時時用花言巧語欺騙「組織」而誤獲「組織」信任的，並說明由於他階級成份的不純，以及一貫的惡劣作風，造成了「犯錯誤」的必然性，這些事後的「先見之明」，開脫了「組織」的罪嫌，只有當事人自己去承受那「嚴重批評」的處分。當時我覺得批評得再嚴重都嫌太輕了一點，因爲這筆巨款幾乎影響了過境部隊的開拔，後來我有機會同「二野文工團」團長談起這件事，才清楚所謂「嚴重批評」是代表了執行死刑的事實。不

過我不明白如此拙劣的宣傳是表揚「組織」的寬大呢？還是鼓勵幹部的繼續犯罪？以後我知道這只是統治者盡量避免使用血腥字句藉以減輕人民的反感和恐怖氣氛，不過，當我再從報紙上或是公文上，看到處分與嚴重批評等類的字樣，就立即感到不寒而慄了。

腐化是從掌握實權和有機會的幹部開始的，我所在被認爲不見錢臭的機關裡，除了有人憑藉身份向老百姓拉點「關係」以外，比較嚴重的就是管理部門，一個「長征」幹部的管理科長，他那不平凡的臥室和衣着，大家雖屢有煩言，「組織」上却奈何他不得。

經常被開刀的只是那些必須是老幹部來擔任管理員，任何機關做管理工作的人，幾乎有一個普遍的特色，就是既不大識字又無工作能力却有相當歷史的老幹部。組織上雖曾寄與最大的信任，可是他們自己不爭氣，不得已只好委曲他們做了「革命」的管家，他們的級別大都是停留在連排兩級。

前後爲管理人員所開的「鬪爭大會」，據我所知有過三次(鬪爭大會是處理一些被認爲嚴重的事件)，可惜我能參加的只有一次。

那次被鬪的管理員「同志」，着一身與衆不同的美國咔嘰軍裝，帶有游泳錶，穿短筒紅皮靴，皮帶上掛着一只據說買自老百姓的美國手槍，他每月全部薪俸應該比我的津貼（約值港幣三元）還要少一些，這些不明經濟來源的身外之物，「組織」上認爲對於有「功勛」的老幹部來說是尙屬可以原諒的事，不料這個管理員繼續犯了更嚴重的錯誤。他經手修葺我們機關的房屋時，首先就向承包商人索取兩成佣金，而在完工的時候又扣下了一成多的尾數，這個商人當時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後來不知通過什麼關係，向我們的上級機關告了一狀，才東窗事發而舉行了以他爲對象的「鬪爭大會」。多年「革命」教育的唯一收穫，就

是他毫無隱藏地把全部經過以及前此的事情都一齊「坦白」出來，并承認自己對不起「革命」。最後他本人連同大會記錄及支部意見（所謂意見事實上是判決書），一齊被送到主管特工工作的「保衛部」去，他受到怎樣的處分是比軍事機密還要機密的事，我無法知道。不過，我相信，如果他不幸而遭到「嚴重批評」時，對於當初「組織」形同慈悲的一味包庇，將會含怨九泉，而不會再以爲是特殊的「照顧」了。

另一次我看到一個被送到「保衛部」的幹部時，我好奇地問問站在他身邊的一個兵，那個戰士倒很直率地告訴我：他去嫖妓女，可是身邊却不名一文，最後那個妓院的老板認清他的符號，冒然寫封信到我們的機關來要錢，才被發覺的。

可是另外一個在支部工作的女幹部，却否認了這個戰士的話說這個犯錯誤的「同志」，是個非常老實的鄉下人，他同幾個「同志」去查妓院，聽到一個妓女訴說她淒凉的身世，誤以爲妓女是應予同情的「無產階級」，才多在那裡坐了一會兒，結果那個老板竟開了帳單向我們的「首長」來收「茶園錢」，告訴我的那個幹部表示非常氣憤，認爲妓院都是「舊」社會的黑暗東西，遲早要封閉的。可是，我却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不管怎樣，總算大概弄清楚了這件事。關於這類腐化的「個別現象」，除非被認爲過於嚴重并可用以「進行教育」的，始於事後稍加透露以外，其他的一些「組織」上無不想盡辦法來保密的，保密的原因絕不是爲了已被批判爲「封建意識」的「官官相護」或是「猩猩惜猩猩」而是「照顧影響不好」。

「小廣播」之累

我非常驚異新任的科長竟是官海能手，試想一個小學畢業天眞單純的孩子，爲了貧窮無依而跟隨曾在他家鄉駐紮過的「紅軍」去當兵，十五個苦難的「革命」歲月，竟使他學了一身官場的十八般武藝，如果說這與環境無關而只是屬於他的絕頂聰明，任誰都不會相信的事。他不但對「首長」照顧得貼體入微，對於那些做爲屬僚的幹部更能恰如其份地做個「小首長」。經過調動科長的不愉快以後，我一個人經常守候在辦公室裡，當原有的三個通訊員（勤務兵），在「游擊習氣」支配之下，不知去處時，會客通報電話找人也都變成了我工作以外的兼職。有電話找科長的時候，我得跑到樓上去請他，假如我忘記問明白對方的姓名和單位，他立即顯露不悅之色，叫我下樓去問。問回來還不行，有時還得再下去問清楚什麼事情。總之他是難得下樓的，不是叫我代他去回話，就是不耐煩地叫我說他不在，最後還得上樓一次，向他報告對方的反應。爲了一次電話我往往要跑上三四次，可是，我們這位科座，却若無其事地坐在那裡同其他老幹部聊天，或是揮着扇子看他那永遠看不完的「靜靜的頓河」。

每次我都有一股不可按捺地氣憤，終於我在第一次科務會議上，指出他的官僚作風，是比被認爲「舊」社會的官僚更要腐敗的。在開會的當時，他却毫不動怒，立即笑臉承認錯誤，或是推說一時疏忽。可是，開會後，他並未也無意因此而改正「錯誤」。以後再有電話，我都一概推說不在，如果打電話的人託我轉達事情，我就眞的裝做一個什麼都不懂的通訊員而加以拒絕，這樣消極抵抗的辦法，不多久，便被我們科座知道了。

一個禮拜六的晚上，科長的「愛人」準時來歸宿，她只是參加工作四年的黨員，敵偽時代在東北念過小學，原在宣傳隊做個普通的隊員，自從當了官太太和生了一個小孩以後，才調到我們所屬的一個機關去搞「組織工作」，這樣她才可以分出更多的時間來照顧那未滿週歲的孩子。她一如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並無任何傑出之處，但頗有一般黨員的優越感，尤其她非常自負「組織」所給予她的「思想性」的工作。（組織工作被認爲是「思想性工作」之一）。我們已經見過幾次面了，僅有的一點「革命」知識，經常被她當做寒喧的資料，那次見面的時候，她像是非常關切的樣子問起我對「革命」是否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並說她最近非常忙，對於沒有時間幫助我「進步」表示很大的遺憾。又說一俟有機會，可以幫助我把思想提高一步。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如此不禮貌的談話，就算我是一個毫無優越感的知識份子，也會感到一點羞辱，尤其是面對這樣一個粗通文字，整天爲奶孩子而忙的女「同志」，當時我抑止了被她所引起的不愉快的情緒，表示感謝她的關注，並希望她在照顧小孩之餘，能有更多的時間來幫助我「進步」。

經過這次「革命」的寒喧以後，我才知道「組織」對我正在嚴密的注意中，據告訴我的人說，主要原因是失敬於科長，另外一個原因是說我善於「小廣播」，歪曲「革命」同志間的關係，並散佈「舊社會」的「毒素」，誇大事實造成新「同志」對「革命」失望的情緒。這一大串嚴重的罪嫌，我不知將受到何種處分，弄得我又恐懼又氣憤，所指「小廣播」當然不是事出無因的我，曾把在醫院見到的情形，以及爭房子和人事磨擦向幾個新「同志」談過，在人與人之間只有矛盾並無信任的「新社會」，我難免被人家告了一狀。但是，我所說的完全是眼見的事實，假如因此而招致處分實在是心有不甘的。

一次，擔任學習小組長的「同志」找我去，除了開會我們平素很少說過話，他裝做很客氣而含有警告

性地對我說，任何人說話都不能無中生有或是誇大其詞，必須對「革命」負責。顯然他是指我的一些「小廣播」，當時我就理直氣壯地向他保證，如果我的任何說話是出於揑造，我寧願接受嚴重的懲罰。他看到我的樣子，依舊很客氣地說：

「我並沒有說你揑造事實，不過，有些話是不能說的，你知道嗎？」

「我同人家談起這些事情絕無任何惡意，主要是由於好奇，這些一如舊社會的事情，是我前此未經驗過甚至於未想到的；另外的原因是希望使大家知道而能夠有所警惕」。我的理由如果按「革命」大道理來衡量，當然是不夠充份的，尤其是後面一句話更顯得牽強。事實上，我在說話的當時，的確是並沒有想到什麼惡意或善意，只不過是說說而已。

「事實儘管事實，但正如你做過記者一樣，要分別對象來報導事實的，有些新聞必須被檢禁的，因爲要照顧到影響。」

「我認爲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影響。」我說。

「那麼你所說州官放火又是何所指呢」？他變爲不客氣地問。

我對於他搜集情報的神通感到驚訝，因爲我只同一個已經很熟了的新「同志」，在談起幹部打麻將的時候，曾感慨地說過：「奪取政權變成了目的，幹部與人民依然是統治與被統治的兩個階級，在許多問題上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假如不是牆外有耳，只可能是那個「同志」的告密，後者實在令我難以相信，因爲當時他也曾表示過對「革命」的異常不滿。但是對這些事情是無法計較的，只能更進一步的證明，任何人企圖在「革命隊伍」裡交朋友找知己是極端幼稚而荒謬的事。不過，當時我的氣焰並未因

而被壓低，因爲我所說的依然是一些無法歪曲的事實。

我告訴他看見到兩次以上幹部打麻將的事情，並且是賭錢，因爲不賭錢而打麻將，對老幹部來說是被認爲合法的，雖然，這些不成文法對老百姓則是一概不得沿用。

許多不革命的事情都被我親眼見到，實在令他難以相信。他立即變爲狡猾而卑俗的笑臉，請我帶他去見識見識，我雖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他，但是我在想，假如我們去見識的那一剎那，並沒有人打麻將或是賭錢，我的罪過就不堪想像了。後來，他終於答應我只調查前此所發生的事實，不一定要親眼見到，我才放心。

我眞應該感謝上帝，假如有上帝的話。我們居然又看到一如我前次所見到的事實，四位衣裝不整的幹部「同志」正在專心於他們的方城之戰，觀戰的「同志」彷彿也不下四五個人，他們都是屬於維持治安的武漢衛戍部隊，遺憾的是幹部級別和姓名無法知道，因爲我們是在一家機關樓梯的窓口向另一個窓口所看到的，我前些時候因公被派到這裡來，也是這樣偶然見到的。

我又陪他到另外一個招待所（被接管的旅館）去，我說打麻將的其中兩個人，是我在醫院時相熟的老幹部，他們在東北「搞過生產」，都有幾個錢，當時住閑在招待所裡，等待到湖南和兩廣去做接管工作的。我們進去的時候，恰好有一個人在家，並沒有打牌，我像是被迫做特務工作一樣地不舒服，經過簡單的介紹，我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面在考慮怎樣證實給奉命來調查的人知道，一面總覺得對不起朋友（雖然在「革命隊伍」中已經沒有了這樣的稱呼）。但爲了洗清我揑造事實的罪嫌，我終於由每月的貼津太少而向那個「朋友」談起打牌的輸贏，果然立即引起那個「朋友」的牌興，接着他就興緻勃勃地談起他們的牌

程，不料我的同來者用冷面孔打斷了他的談話：「你不知道這是犯紀律嗎？」雖然那個「朋友」還是若無其事地說：「只不過消遣消遣。」我此時已感到極大的難堪，我自己便先行離開了那家招待所。

一個做地方工作的老同學曾告訴過我：參加「革命」有如受戒出家，還俗是不可能的事，否則就被認爲是叛離宗教。隨便那一個，假如不念上十年廿年阿彌陀佛，無論如何也熬不上一個主持或是方丈。十年廿年的蒲團苦行中，偶有冒犯神靈而不爲神靈所知道的行爲，也許沒有關係。但在主持方丈面前，不連聲口誦阿彌陀佛，則將是罪孽深重的事。當時，我非常欽佩他的精闢見解。他並告訴過我十個字：「只管言事，本身保平安」，囑我善於應用。這兩句話雖應被批判爲自由主義，但在我以後却感到受用不盡。

井崗山的騾子

第一次參與老幹部的小組會，頗有點興奮與好奇的感覺。許多老幹部都有着兩個共同的特色，就是生活隨便和健談。生活隨便是指在開會時或坐或臥的姿態，衣冠不整蓬頭垢面已不能再構成一致的特點了，因爲進駐城市以後，有些「同志」已經開始留心到髮臘鞋油以及褲子上的摺線一類的身邊瑣事。老幹部的健談在開會的時候表現得更爲普遍，不論何種出身，不論會前有無準備，老幹部對任何大小問題，都可以滔滔不絕談上一套。盡管都是題外話或是冗長瑣碎都毫無關係，只要不搬出一大堆理論來嚇人就可以，事實上，也沒有人願意冒「教條主義」之險來談理論的，因爲不懂教條的工農幹部，對這個問題更是敏感而權威的批評家。理論固屬重要，但不能與實際脫節，老幹部說話，雖然每次都離不開油鹽柴米或是衣食住行據說馬恩列斯的理論精華，俱在其中矣。任何檢討會，老幹部都可以極其自然地從頭到脚由吃飯到睡覺「檢討」或是「反醒」出來一大堆。檢討會的重點容有不同，但檢討的內容總還是那麼老一套，有內容就不莫毛病，因爲只有這樣才被認爲是「聯繫實際」。使我更驚異的是任何學習討論會，盡管是討論的中心意旨還沒有弄懂，但許多老「同志」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分一二三四來發表幾點意見，講錯了當然沒有關係怕羞和怕鬼已不是共產黨人所計較的事。懂不懂更沒有關係，幹「革命」的人那有閑空來懂得那麼多東西，要懂除非做一個甘心爲「資產階級」所奴役的知識份子，二三十年的「革命」把開會的發言已鑄成一種定型用老幹部的口吻說，「總是老一套」。非常重視「發展觀點」的統治者也覺得至少在形式上應該突破這「老一套」，因而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就把它列入了「自由主義」的十一大罪狀之一（原文是

「一二三四開中藥店」用以形容開會的發言，像熟手的中藥店學徒一樣，往往是不加思索就一二三四地隨便配出幾味藥來）。但事隔十年的今天，依然沒有突破那「老一套」的跡象，這原因正如所謂是「內容決定了形式」，「老一套」是被它那固定不變的內容所限制住了（這固定的內容據說百年來未曾稍變，就是此後百年千年也不會有所改變，並被認爲是放在四海而皆準的決定全人類命運的東西）。所以我不久也就很熟悉地接受了並學會了運用那「老一套」，而在某些問題上我也許被人認爲是健談的一個了。

頭一個月，我們所有的會（包括學習，討論，醞釀，檢討等）都集中了一個目標——「學習團結」（主要學習文件是毛澤東在所謂「二中全會」的報告）論團結是針對不團結的現象而發的，不團結的現象表現在「新老關係」上最爲嚴重，所謂「新老」是指新老幹部而言。由於日趨嚴重的新老幹部的摩擦，使許多工作陷於停頓甚致於造成對「革命」的破壞行爲。新老關係是被重新提出的舊課題，從井崗山（江西時代工農紅軍根據地）到延安，一部統治者的「革命」史中，新老關係是一個解決不完也解決不了的問題。不過，那些時期新知識份子幹部還只是不足道的少數，在統治者想「馬上取天下」的時候，知識份子除了擔任一點慕僚工作以外，有時被認爲是不能行軍打仗不能種田的累贅。在當時，這些被認爲累贅的新的少數分散在舊的多數中，縱然發生了再多的問題，也都無關重要。但是，在據有中國大陸後的今天，情形就整個改變了，在「革命隊伍」中，過去的多數變成了有「功勳」的少數，過去認爲累贅的，今天變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些人。因此新老幹部的摩擦，也就變成了日益嚴重和日益普遍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來看，正像統治者所說是兩個敵對階級的鬪爭，至少短期內是無法澈底解決的。

新老關係的不協調，是個極其普遍的現象，老幹部自知工作能力不行，擔心遲早會有失寵的一天，便想

盡辦法來打擊新幹部，新幹部在參加「革命」不久，也就發現了所謂有「豐富革命鬪爭經驗」的老幹部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雖然限於壓力不可能做公開的反抗，但至少老幹部的處處爲難，他們早已感到情緒的低落了。我不想介紹一個典型故事或是我所知道的某一個人拿來說明這件事，因爲也許有人會誤解那只是一個故事或某一個人的事，我只想告訴你，在我所接觸的數以數百計的老「同志」中，想找出幾個不以「功臣自居」而不與新幹部爲敵的例外來，那却是很難的事。

「上級」原定的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的「考績制度」，就因爲老幹部的普遍反對而變了質，所謂考績當然是針對工作成績而言的，可是，老幹部則認爲這是「革命」行將丟棄他們的前奏，與我同住的一個老「同志」，在評論考績之後，曾感慨地說：「革命有前途，個人無前途！」「華中局」爲了打通老幹部反對而考績的思想，曾接連舉行了幾次「動員大會」，這幾次大會只有老幹部被邀參加，確切的內容我不得知，不過，在年終總結考績的時候，我才發覺所謂考績，爲了「照顧」有「功勛」的老幹部，已經有了本質上的改變，並增加了一條硬性的規定：參加革命的年資在考績的評分上將佔總分的百分之六十。

在我們第一次檢討新老關係的會上，那個做組長的「同志」開頭就說：『對於同志，我認爲是於沒有什麼檢討的必要，「鬧不團結」的都只是新參加工作的那些人』。當時我們小組裏只有我一個人是新幹部他那含有很深成見的開場白當然仍是由於敵視與打擊新幹部情緒出發的，當他發覺到我的時候才顯得有點不好意思，而做了一些多餘的修正。

「組織」上一再叫新「同志」向老幹部學習，學習老幹部的「革命鬪爭經驗」。可是當新「同志」對所謂老幹部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以後，誰都不再服氣那些以「功臣自居」的老幹部的領導。一個東北參軍

三年的「同志」在我們私人談話中，他尤其痛恨和不服氣那些不學無術的老幹部，他並指着正從我們面前走過的一個老幹部悄悄地說：「擺什麼老資格，井崗山下來的騾子，還不是只會拉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人類悲劇的犧牲者

當我對於一些老幹部有了比較深刻的瞭解以後，我常常有一些說不出的感觸和同情，那些被指稱爲「井崗山騾子」的老幹部，不論他們本身對統治者的看法怎麼樣，但我們如果以人道主義的觀點來看，就立即會發覺這些所謂老幹部，都正是人類最大悲劇的犧牲者。在中國的範圍內，他們是最早被極權主義者所摧毀的一些人。我自己就深深地體會到那些知識份子出身的老幹部所感覺到的矛盾與痛苦。經過長年「自我鬪爭」的折磨，雖然在生活上習慣上都有了某種程度的改變，可是，那些屬於感情的和人性的東西畢竟是不可磨滅的，感情與人性的挑戰往往更加深了他們無法解脫的痛苦，至於那些出身工農也許甘願被指使的一些人，除了對他們的所做所爲，我們感到極大的憎恨以外，而對於他們的愚昧和單純，難道還不該寄予同情麼？當然，在「父子問題上要劃分敵我」的社會中，我是被認爲不幸而保有同情心的一個人。

爲了工作的關係，我的確得到過一些異於其他新幹部的優厚待遇，這在許多人都認爲羨慕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科裏僅有的四個「同志」，爲了替部長處理日常瑣事的工作任務，我們有太多的機會與所謂首長接觸，而我們的住處也隨首長的官邸的遷移而遷移。在搬家的風波平息以後，我們定居在部長們（一正三副）官邸的樓下，官邸建築的華麗和家具陳設的精緻是意料中事，我們四個人無疑地都可以分得一杯羹，四個人之中只有我一個是應該受折磨而沒有受折磨的新「同志」，這怎能不令睡在樓梯底下或是走廊上的其他新幹部羨慕呢？更難怪那些從部隊來彙報工作或是接洽事情的一些老幹部，都毫無芥蒂地執禮言歡把我錯當了一個也許比他們更爲「心腹」的老幹部呢？

因此，我也就有更多的機會來認識一下我們的老「同志」。與我分住一間華貴寢室的老「幹部」，在生活關係上，我們比較更爲接近，他是與我年紀相仿不足卅歲的人，個性很强而極其幼稚的，當然我是常常原諒他那僅有的教育程度。他無論在公開的會議上或是與我的私人談話中，都表示不滿意「組織」所給予他的「照顧」，他最爲不滿的是「評級問題」（除了新參加工作的幹部，「組織」上給予臨時的級別外，每個幹部的晉級與降級，都是以會議的形式來決定的）。十六年的「功勛」僅評得一個「營級」，他認爲是非常不公允的事，與他同時參加工作，而在工作上學習上遠不如他的人，竟都「評」得了高高在上的團級或是師級。對於毫無「功勛」的新「同志」，居然也竟有人與他的生活待遇不相上下，尤其使他感到忿忿不平的。這不能用什麼「功利主義」來進行批評的，因爲所有的老幹部，沒有一個是不想在「官階」上求「進步」的人。

他有許多的掌故，他給朱德做過「小鬼」，他知道彭德懷一頓吃幾個饅頭。他有時又告訴我，鄧穎超怎樣愛打扮，蔡暢是怎樣地重視案頭的花瓶。他講得最多的當然還是他自己，他在延安釣魚和「搞生產」就是他的「革命鬪爭經驗」的全部。他對月夜有特殊的嗜好，常常搬椅子到我們窓前的花圃裡去對月靜坐有一次，他非常興奮地告訴我，他那離開了十六七年在河北的家有了信息，可是他的興奮又立即變爲不可抑止的忿怒與悲傷，十多年的隔絕，他的父親叔父早已亡故了，母親在一次水災後跑到天津去擺地攤，屬於他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有的被鬪爭掉了，有的則爲了「繳納軍糧」而由他的堂兄經手賣掉，因爲在到延安後的不久，家鄉已變成了「老解放區」。當時他曾無條件地相信「組織」的話，「組織」上叫他不必爲家而擔心，說已經寫過幾封信並附寄證明給當地的縣政府和「農會」，訓令他們對於這位老「同志」的

家，應該按照「優待軍屬條例」來「從優照顧」，「組織」上並告訴他已經收到了當地縣政府的保證函件。他一直都相信不疑，尤其是他看過太多的「優待軍屬」的話劇和報導：兒子「參軍」，父親母親坐在家裡納福，田地有人代耕代割，每逢三節，由縣長「同志」帶頭登門慰勞；過年的時候，掌灯結綵，大門口掛起了「光榮之家」的大紅燈，「農會」的「同志」爭相拜年……。這是多麼美麗，而感人的描寫，那些遠在異地的征人，怎能不爲「革命」而獻身呢？否則將何以對得起「組織」。當然他從未懷疑過那些話劇和報導的眞實性。這些動人的宣傳，確曾滿足過他那不敢暴露的盡孝的意識，也確曾使他在幾次重大的失望中，再鼓起了「革命」的勇氣，可是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的今天，他終於得到了家中的眞實消息，死難的與逃亡的使他悲傷，被鬪爭的土地和被迫出賣的房產使他忿怒，十多年的謊言也終於拆穿了。當他收到第二封家信的時候，他更爲震怒，信上說，「農會」早就知道他的家是「軍屬」，正因爲如此，才鬪了他的土地，要了他的房屋，父親才被迫去做苦工，妹妹才被迫出嫁，母親才被迫流亡。據說這就是「軍屬的光榮」，因爲「農會」認爲只有這樣，才眞正發揮了「軍屬」的「帶頭作用」。看過信以後，他曾不顧一切地跳着脚流着淚，去質問「組織」，說謊者窮於應付時，又開了另一張遠期的「期票」，答應爲他那準備沿路行乞到漢口來找他的家屬，予以適當的「照顧」。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這是多麼微末的枝節，「組織」上又何罪之有？事情當然就此解決，可是這位老「同志」的失望和悲痛，將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對於他那驟然低落的情緒，統治者不知將再用什麼動聽的言詞，才能再一次地激起。

原在我們新聞工作隊當過小組長的一個老「同志」，是「八一三」以後由上海出走到蘇北去的，他那「進步」的母親與妹妹，曾親自到徐州送過行，滿臉的眼淚不僅是爲了惜別，更含有一些應批判爲「封建

意識」的「盼子榮歸」的期許。一別十三個年頭，母親的期許終算沒有落空，可是她那憂念成疾的病體，不幸已不容她再有所等待。她在上海「解放」前的四天飽受戰爭的刺激而不治身死，那個已出嫁了的妹妹電告她做老幹部的哥哥，並說停屍在家裏，準備等待屬於獨生子的哥哥回去送終和料理喪事。這位當哥哥的老幹部，在「認識」上當然比我强得多，可是在感情上不料竟是那麼軟弱得不能支持的一個人，他悶在房子裏哭了一整天，茶飯都不進，當我知道了原委時，曾以「同志」之誼勸過他，我說悲哀已與事無補了，不如請幾天假趕回上海去料理一下，不料他哭得更加厲害起來，一邊哭一邊搖頭。對於勸朋友們的悲傷，我一向是被認爲最沒有辦法而拙於言詞的一個人，何況是對這樣一個連「舊」言詞都不宜於適用的老「革命同志」呢？他越哭我越沒有辦法，不過，他始終沒有敢向「組織」提出回上海的要求，後來我知道他的不敢，是由於「革命經驗」教訓了他，爲了送終與料理喪事的一類要求，不知有過多少人遭到嚴詞的批評和無情的拒絕。

被謳歌的「英雄事蹟」

老幹部的悲劇還沒有完，統治者的摧殘絕不止於欺騙，誘人的謊言鑄造了華麗的牢門，欺騙的發覺僅在門內外的一剎那間，牢內的苦難將是一堆無盡無休的日子，越老的幹部承受的也就越多。

多少人犧牲了家庭，多少人被迫拋棄了妻子，多少人被斷送了前程，多少人被迫帶病工作，多少人變成了終生殘廢，多少人未經訓練被迫送上戰場，多少人負輕傷便被丟棄，多少人被迫改行，多少人被迫改嫁……當我認識更多的老幹部以後，我發現這是用盡所有的形容詞所不能描述的悲慘時代。可是，統治者還在大事表揚那些慘不忍聞的事情，用以「教育」它的幹部，下面就是一個被認爲有「學習價值」的一個故事：

一個出身農家的老幹部，當年曾懷着滿腔的熱情參加抗日游擊隊，在缺乏領導缺乏供給中，游擊隊慢慢變了質，許多可愛的年青人受着抗日熱情的驅使，接受了不明來歷的供給，同時也接受了不明來歷的領導這位老幹部在那個時候便被「吸收」做了黨員，連年的戰爭使他由連長升爲營長，由營長而團長，他曾因爲負傷被調到最後方的延安去，並在當時的「馬列學院」受過訓，從延安撤退到張家口佳木斯的時候，他正是一個負有戰鬪任務的團長。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統治者在東北擴張了更多的地方，這位老幹部的家也就「解放」了。他曾遵照「組織」的訓示，一再地向戰士們和低級幹部進行過不准回家的教育，表揚過不動情於父母苦苦勸阻的「同志」。可是，輪到他自己的家鄉「解放」了，不由得使他也怦然心動，他清清楚楚知道這就是叫做「落後意識」。但是他想盡辦法也克制不了這「落後意識」的作祟，一別多年的家帶給

他比以前更多的幻想。他有時想，弟弟也許長大成人了，妹妹也許嫁了，父親母親該是享福的年紀了，還有守寡的嫂嫂和他離家時只有兩歲的姪兒。不管怎樣，「包袱」也好，「尾巴」也好，他却常常默默地爲他們的生活美滿而祝福，他相信戰事終有一天會平定的，他也就終有再回到家裏去的一天。不過，他有時又想，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屬於他家鄉的地區，在敵僞佔據的時代，就是游擊隊打得最厲害的地方，這次的「解放」戰爭更打了幾個拉鋸戰，怎麼能幸免於戰禍呢？也許此刻家裏的房子都不見了，村子也不見了，家中的老老小小，說不定死的死，逃的逃，早已經沒有這家人家了。更使他放心不下的是那以父親終生勤勞換得的八畝田，不會有什麼關係吧？多少年的「土改」學習，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關切過，他翻了許多「土改」的書，終於在書上找到了答案：「全家勞動收入佔總收入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者爲中農，土地應予保護，並可參加農會。」他才放了一點心，可是，這許多年來誰又能擔保不會有什麼變化呢？這一連串的「落後意識」使他不能安心工作，不過，他始終不承認也應當不承認他是一個受「落後意識」支配的人，因爲他是一個黨員。他不再考慮「落後」「不落後」的事，只有想找個辦法來死了這條心，最後他還是決定唯有回家去看一次，以後才能會更安心地工作。駐防的地區離家不過兩天的路程，同時他的一團人離開師部和其他團部都很遠，何況他自己就是一團之主，只要藉故出去一天便可以了掉這個心願。一天的清早，他終於騎了一匹馬以去師部彙報工作爲名直奔自己的家鄉，將近吃晚飯的時候便走近了自己出生的村子，沿路的情形使他興奮，因爲他的家鄉並沒有像他想像那樣變成了廢墟，一草一木都使他感到親切，近鄉情更切，他有說不出的緊張和愉快。可是，當他剛走進了村子忽然跳下了馬停下脚步，眼前的事情使他看呆了，前面圍了一大堆人正在開會，他非常熟習地知道這就是「清算地主」的「鬪爭大會」，當他再仔細看

時，那個被「清算」的地主，正巧就是他多年不見的父親，他已算定了年邁父親即將到來而不可能幸免的惡運，可是，他能前去爲老人家的性命多說一句話麼？「組織」上早已警告過每個幹部，這樣做將是最嚴重的犯罪行爲，何況他又是未經「組織」批准而私自回家的。他含着滿眶的眼淚，實在看不下去了，扭轉頭想調馬就走，不料他已被村中的幹部發覺，並立即拉他登臺「表示態度」。當他向前走了幾步，滿鬢白髮的母親哭着撲了過來，隨即暈倒在地上，妹妹和未成年的姪兒哭不成聲地拉着他的衣服，可是他終于擺脫了這些，走上臺去，站在被綁在椅子上的父親的身旁講了幾句話。他說他本人絕對服從「組織」，尊重大會的決議，話猶未了就聽到有些人哄哄喊好，把他可憐的父親拖下來活活地打死了，他也終算有機會做了送終的人。當晚他就若無其事地趕回團部，幾天以後師部「政委」召見他，讚揚他是黨內最優秀的幹部，並給他一枚「五星獎章」，師部以及所屬各單位立即發起了「向××團長學習」的號召。「秧歌隊」「腰鼓隊」紛紛表揚××團長的「英雄行徑」，轟動一時。

這是一個做支部工作的「同志」有聲有色地告訴我的事情，請原諒我脆弱的感情，我已不能再有聲色地做一次記述。記得她在講述的當時，自「那個老幹部調馬就走」以後，用過太多的刺耳的形容詞，他經常以「堅絕的」「愉快的」一類的字樣來描寫那個屬於悲劇主角的情緒。所謂悲劇，只是我自己尚未「進步」的感情，那個支部「同志」却是使用一如講述英雄傳記的口吻來告訴我這件事的。

後來我在全軍對內報紙上看到更詳盡的報導，當時正是東北「土改」雷厲風行的時候，這件事情，不但在師部當做了「學習」的典型，就是在各兵團以及全野戰軍都發起了「學習××團長」的運動，這個團長據說更受到了最高當局的嘉許，並晉升了吃「小灶」的師級幹部。在「學習」的運動中，報紙上不但大

事表揚這個做爲優秀黨員的團長「同志」，並趁機向其他幹部進行「教育」，其中並提到在「土改」中許多幹部因爲受到親戚的求情，便不顧及黨的紀律，而鬆弛了原有的「鬪爭」，甚致有些人竟因而動搖「立場」。報紙的編輯針對這些人提出警告，說這是最嚴重的「受賄行爲」，也就是對黨對「人民」的嚴重犯罪！

讀完了這樣的故事，你也許同我一樣，非常想知道一下，那個團長當時的眞實感情，我畢竟不相信他會「愉快地」「堅絕地」親眼看着自己父親的被打死，而對原屬中農的寃情也不予申辯（據那個支部「同志」的解釋：這種申辯會影響到「組織」的威信而鬆弛群衆情緒的）。我常常想如果我有機會見到那位團長「同志」，我們果眞能愉快地談起這些往事，我將要相信極權統治者「教育」的成就。也許，我也會相信，屬于人類的人性與感情的部份，遲久會有被消滅的一天。可是，這個故事雖然「傳誦」一時，我却始終沒有見到過那位團長或是像那位團長那樣堅絕的人，相反地，我只是見到更多的被迫而抑制悲哀，和失去悲哀權利的受難者，而那個被謳謌的團長，又何嘗不是其中的一個呢？

「新社會」的寵兒

整飭「游擊習氣」是從毛澤東的風紀釦開始，一直到女「同志」的孕服，我們接到中央的正式訓令，把毛澤東「同志」未扣風紀釦的各種畫像以及印刷品一律廢止，以後繪製畫像必須代爲扣好，據說這是統治者被批評爲流氓後的第一個反應。

女「同志」在物各有主的「新」社會中，懷胎有孕已屬於一年一度的例事了，所以袒胸露乳在街上奶孩子，或是挺着扣不上制服釦的大肚子而工作的，確是隨處可見。不幸的是這些女「同志」却單獨負了有礙「革命觀瞻」的責任，袒胸露乳的被查禁。大肚子而不能扣釦子的總算引起了當局的憐惜。專門爲這件事，開了一次會，會上議論紛紜，有人提出來沿用旗袍，接着就有人反對，認爲旗袍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性服裝；又有人提出制服與裙子的混合裝束，但是「裙子」在許多同志看來，不免有些「封建意味」，也未獲通過。最後決定採用「同志」們的新發明，女「同志」一律改穿海軍式的「列寧裝」，不過剪裁的尺寸要各自留心，有一排釦子是規定專爲懷孕而使用的。

關於「學習」，也大加整飭，統治者也畢竟發覺了一如我過去記述的漫無邊際的「學習」，使幹部思想總是停留在某一個階段，在實際工作中，絲毫沒有因爲知道幾個名詞而有甚麼「進步」的表現。因此「新華書店」不顧一些老幹部的反對，也不管那些「正統派」「啃理論」一類含有壞意義的「名詞」，根據「解放社版本」（統治者所制定的標準本）大量翻印了「幹部必讀」的書籍。「幹部必讀」是包括十二種「名著」，但並不包括任何一種中國書籍，在五千年的歷史都必須「改造」的時候，固有文化已被認

爲是虛有其表而遲久必遭「清算」的東西了，五千年來，又有誰曾寫過一本值得一讀的作品呢？「名著」中當然也不包括任何一本英美的著作，英美一類的國家早就被認爲是「毒素」的發源地，洗滌「毒素」正不遺餘力，怎能再來自找麻煩呢？所謂「名著」正如許多東西一樣都是清一色地蘇聯製造。第一本就是李昂節夫的「社會發展史」，我們的曾一度被批評爲「正統派」的新的學習，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

「社會發展史」開宗明義用以來立論的是一個故事：

若干年以前，美洲斯哥布地方，有一位青年教師，對他的學生們說：「人是猿猴變來的。」爲了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引起了轟動一時的訟案。當地的教會，控告那個教師的言論荒謬，並指出這是瀆犯上帝的行爲。

故事止於此，接着就是作者的評論說西方國家製造了宗教一類的東西，是用以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再下面是作者的結論：「資產階級不敢向它的人民宣佈，人是由猿猴變來的眞理，而宗教就是用以麻醉人民的鴉片！」

這本「名著」以「猿猴訴訟」爲題的第一章就這樣結束，以後的篇幅便是引用恩克斯的「人類與國家的起源」一書來說明猿猴怎樣變成了人。

被認爲正統派的學習又嫌矯枉過正，不僅是幹部要學，部隊的戰士以及勤雜人員都必須學。可以發到每個戰鬪班的「戰士生活」雜誌，用大量的篇幅告訴士兵：「猿猴是人類的祖先」。對於天眞而無知的戰士，這實在是一個太荒謬太刺激的新玩意。那些一知半解或者事實上連自己都無法相信的指導員，即使說破了嘴唇，戰士們還是不能接受，他們始終不相信曾供養過若干年代的祖宗竟是一隻猴子。

我沒有機會同戰士們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我想那一定將是更有趣味的事情，然而就使我所參加的所謂高級組裏，聽到些老幹部的發言和辯論，已經夠引起我莫大的興趣了。

最初還沒有決定學甚麼的時候，老幹部們對理論學習已有普遍的反感，他們認爲「組織」上專門給他們出難題，游擊生活的不安定，已使他們荒廢了他們原有的文化程度，今天要與許多新知識份子幹部一齊學習理論，他們當然比不上被認爲過去一直養尊處優的知識份子，比不上的結果徒使老幹部喪失「威信」，他們認爲老幹部的威信與「革命」的威信是不可分的。後來經過幾次「動員」，他們才被迫放棄了成見，接受這次關於猿猴的學習。

我們小組裏的十幾個老幹部，除了兩個搞管理工作的，是「長征」時代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外，其他大部分還是曾經念過幾年小學的，可是，他們對於猿猴變人，正如人會變爲猿猴一樣地不可思議。不過，這些經過多年訓練的老幹部比那些戰士要好一點，他們雖然也覺得可笑和搞不通，但對於大前提是絕不懷疑的，因爲這是「組織」所規定的學習。

有些人對我的相信不疑感到興趣，在頭幾次的會上，我是被當做專家一樣來咨詢的。然而抱歉得很，事實上假定我眞是一個專家，我也會感到沒有辦法來使他們滿足有關這一類的問題。對於一些素無科學常識的人，通俗還是有它一定限度的。何況我有限的知識，經不起太多的考問，連着幾個爲甚麼把我自已也弄模糊了。老幹部爭執不休而缺乏正確解答的有這樣三個問題：

（一）現在的人在某種環境下，會不會再變回猿猴？

（二）人是猿猴變來的，猿猴又是甚麼變來的？

（三）現在的猿猴會不會再變爲人？

第一個問題被「組織」斥爲荒謬，不了了之。關於第二個問題，曾請了一個似通非通的專家，講了一陣單細胞。專家的術語更使老幹部搞不清楚，有些老幹部當場就質問單細胞是甚麼？專家找不到實驗室，急得用手指做了個圓圈，漲紅了臉說：「比如鷄蛋就是單細胞」。這樣一來問題就簡單了，鷄蛋變猿猴，猿猴變人，關於鷄蛋，那當然是鷄生蛋，和蛋生鷄，這是一些老幹部最熟悉的事情。不過，先有鷄還是先有蛋，又變成了他們爭執而不能解決的糾紛。

最後一個問題雖經專家解釋，說猿猴變人的時代是有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着一定的條件。許多人覺得畢竟是太空洞而不夠具體，相信的人也難免要進一步地問：一定是何所指？因爲他們正企圖想辦法來做一次驚人的實驗。

管理員「同志」所接收來的一頭猴子，此刻身價百倍，前來研究和參觀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是來研究它的四肢和尾巴，有些人只是來看看湊個熱鬧，相信「組織」的人也相信它可能在一陣氷雪或是風雨之後會變成了一個人。

「組織」雖一再指出：不必强調猿猴變人的枝節問題，主要的要認識猿猴變人的勞動過程，可是許多幹部還是毋寧說對猴子本身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與好奇，在將近兩個月的學習期內，猴子變成了「同志」們談話和開會的主題。由於「猿猴是人類的祖先」的影響，許多人對猴子都有了新的估價，而那頭幸運的猴子也就變成了我們隊伍裏的寵兒。

「劃分階級」的煩惱

穆罕默德傳教的時候，據說是一手持可蘭經，一手執劍。今天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在完成武力的鎮壓以後，正手持紅色的經書在找尋對象並創造經驗，只可惜這部經書並非統治者本身的傑作，而是一個外國人一脈相傳下來的東西，因此找尋對象和創造經驗是煞費苦心的一件事，當然，首先要找尋適合於經書的對象，找不到的再來創造。翻開經書的第一頁是「人的階級性」，承認了「階級」，當然就必須要來劃分階級。在陰謀奪取政權的時代，還可以含糊其詞地說，不屬於統治階級的就是被統治階級；不屬於剝削階級的就是被剝削階級，據說這樣的詞令可以多爭取朋友而少樹立敵人，被統治的與被剝削的都是被壓迫階級，打着爲被壓迫者求「解放」謀「翻身」的旗號，無疑地是最易獲得同情的。可是在奪取政權以後，便不能再有所含糊了，把過去稱爲被壓迫者，再來分門類。統治者並鄭重宣佈：只有工人才是最革命的「無產階級」；那些流血打仗的農民，只能算是保守的落後的「半無產階級」；那些曾搖旗吶喊的學生和文化人被認爲是妥協的懦弱的必須「改造」的「小資產階級」；至於那些曾出過錢支持「革命」的資本家，被認爲只是某一定時期有作用而遲久必被消滅的「民族資產階級」。到這時那些自命「進步」和久已「進步的人，才明白了一點究竟，但是明白盡管明白，懊悔是不被准允的，懊悔就是「反動」，强大的武裝就是爲鎮壓反動而用的，一年前親共份子還被當做爭取的對象，一年後親共份子却成了被鬪爭和被鎮壓的罪犯。在中國大陸上，如果再有人表示只親共而不從共，將是罪加一等的「反動份子」（這些人被認爲是最容易糢糊青年思想的）。當然，在非共區的所謂親共份子，還是繼續被爭取而被嘉許爲「進步」的一些人。

這是極權統治者戰略上的運用，正如統治者在羽毛未豐的時候，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在勢均力敵的時候，又唱「組織聯合政府」的論調，等待奪取政權以後，則發號施令「誓死消滅反動派」的那一套一樣，不足爲怪的。統治者曾自負地說「戰略戰術可能一樣，貴在靈活運用。」劃分階級只不過一個例子而已。

所謂「人民大憲章」上曾說明了「新政權」的性質是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我曾以「工人階級領導」與實際領導的問題問過一位副部長，他非常敏感地知道了我的意思，是指那個一度爲北京大學圖書館職員的統治者（毛澤東），怎樣被算做了工人，而以他爲首的統治階級，怎樣被算做了「工人階級」，那位部長毫不遲疑地解釋：「不管他們是出身資產階級，或是小資產階級，只要加入工人階級的政黨（指共產黨），就是背叛了原階級，而正式算加入了工人階級的隊伍。」後來我知道在中國大陸上，工人並不是最「革命」的，而最「革命」的才算是「工人階級」。事實上，如果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來找尋工人群衆，在中國那實在是一個少得可憐的數字。

劃分階級正如「人民法律」一樣，是有原則而無細則的。與會人的情緒，小組長的意志，以及支部負責人喜怒哀樂，都變成了決定階級的重要因素。每個參加「革命」的人，必須經過『查成份定階級』的過程，確定了階級，才可以談「親近組織」或「加入組織」的問題。在越窮越有理的社會中，誰都把自己的過去，說得可憐一點，可憐到沒有飯吃沒有褲子穿，那就是至高無上的「無產階級」了。假如有幸被劃爲「無產階級」，不但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加入「組織」，據說在將來勢必舉行的「整肅」中，也可能幸免一二。

一位東北來的女「同志」，首先被定爲「無產階級」，可是等到她家裏一條出租的耕牛和一盤石磨被「組織」發覺以後，又被改定爲屬於「農村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她哭得死去活來，因爲她知道資產階級是必須被消滅的，消滅兩個字，使她感到恐怖。同時她更知道毫厘之差而被劃分爲兩個敵對的階級，將斷送她此後的政治前途，將不可能再有機會參加「組織」了。

劃分階級，因爲原則的不斷被修正，常常有重大的改變。我們會開過許多會，塡過許多登記表，一次一次地被確定，又一次一次地被推翻。關於劃分階級，引爲最大煩惱的，是中央與地方的規定根本不同，令人無法遵從。毛著「新民主主義論」，把學生教員和銀行機關職員都算做「小資產階級」，可是華中區僅次於林彪的第二首要鄧子恢，在「河南人民代表會」上所做的「報告」中却把這些人都併入了「無產階級」，並加上一些前所未聞的解釋。當然後者的說法是容易討好於人的。用統治者的說法來說這就叫地方跟中央「鬧對立」，關於林彪跟中央「鬧對立」的事情，老幹部也偶而提起過。前此也發生過一件事，北平「人民日報」發表了「先城市後農村」的政策以後，第二天「長江日報」就刊出「先農村後城市」以林彪屬名的論文，在鐵幕範圍以內，這是稀有的事件，不一致的意見是禁止發表的，這也是我一年多所僅見過的兩次。「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是所謂「民主集中制」的神髓，從不服從的事實我們推測一點分裂的現象，該不是沒有根據吧？

我們機關裡，在屢次召開劃分階級的會上，就分別有人堅持過兩個不同的原則，堅持的結果，使會議一次一次地擱淺，而那本來必須貫澈的「查成份定階級」的工作，也就因而變成了懸案。

未完成的終身大事

女「同志」在「革命隊伍」裡是最享有特權的一種人，我說特權，是指她們在婚姻問題上絕不需要自己來費半點心思，「怨女」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任何女「同志」參加「革命」以後，都不必再爲青春易逝而擔心，也不必爲物色對象而梳洗打粉，更不必爲了甲乙丙丁而煞費選擇，嫁粧和婚禮都屬於被批判的「形式主義」，害羞是不健康的「封建意識」，妞妮撒嬌是「資產階級」社會才用得着的東西，女人不再是弱者，終身大事要當做完成任務一樣來完成的。至於對方的思想和家庭，早經有了縝密的調查，「組織」就是最週到的母親，婚喪嫁娶生老病死都是負有無限責任的。只要服從「組織」，婚後的生活應該是美滿的，丈夫的容貌年齡志趣學識一類的小節，千萬不必計較，嫁得郎君以後，就不難一變而爲官太太了。「官太太思想」雖然被當做了什麼什麼主義來批評的，可是，妻以夫貴還是不容抹煞的現實。長年受苦受難的男「同志」們，誰不羨慕有幸嫁給老幹部的女「同志」，不但是「灶別」和生活待遇，都有了或明或暗的改善，就是入黨時間上也可以酌爲縮短，「後補期」的縮減，誰又能否認這不是思想「進步」的結果呢？可是，不滿足的女「同志」，有些還在抱怨她們的丈夫太窮，有勢而沒有錢也許是眞的，不過，有勢又何患沒有錢，從發展的觀點看，「幹部丈夫」那一個不都是有着豐富的未來呢！

東北「參軍」的女「同志」，是包括了各式各樣出身的婦女，從十四五歲到四十幾歲，不滿一年的時間，組織上都替她們「物色」了丈夫（自東北「解放」後，爲了適合「革命」需要，女「同志」的結婚限制放寬了許多，一經批准爲「後補黨員」即可結婚）。平津來的女知識份子當然也不能例外，據說「組織

「對他們關懷更爲殷切，可是，這出乎意料之外的關懷却使被關懷的人難以接受，她們一如許多青年的知識份子一樣，把「革命」當做了神聖的事業，萬萬沒有想到一跨進「革命」的大門，必須首先完成婚姻的任務。她們都曾對終身伴侶，對幸福的家庭，有過太多的幻想，參加工作以後，雖然都有了或多或少的「進步」，可是對「組織」的關懷仍免不了感到恐懼和意外。

有位女「同志」，當她瞭解了老幹部「七天一聚首，聚首就睡覺」的婚姻關係後，曾非常不滿意地對我說：「這種婚姻我才不感覺興趣呢！」

以後「組織」找她去談過話，支部的同志在她面前代老幹部做了一番宣傳說：老幹部是對「人民」最有貢獻的，「革命鬪爭經驗」也最豐富。並暗示她，如要嫁人不要嫁別人，必須要嫁給老幹部。她告訴我這些情形以後，像蒙受莫大侮辱地說：「我這一輩子不嫁人都可以！」

可是，她沒有想到立志不嫁，只有在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裡才可能存在，在「組織決定一切」的時候，嫁不嫁已經不屬於個人意志之內的東西了。再一次，「組織」找她去，並爲她未來的丈夫提名，這次因爲有了具體內容，所以那個做支部工作的女「同志」，特別花費了一個晚上來做「說服」工作，從「服從組織是布爾希維克的優良傳統」，一直說到那個被提名的老「同志」肺病的康復，可是，那個被「說服」的女「同志」只能一邊哭一邊搖頭，此時她已不知道將怎樣處理自己，那個曾親身經歷過，並有太多工作經驗的支部女「同志」，比媒婆還有耐心，比媒婆更爲熟練，用最溫存的語調來煽動她：「咱們婦女從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下解放出來，已經不再是一個弱者，一切事情要自己出主意，自己做主張。哭，是多麼懦弱的行爲，信任組織也就是信任自己！」但是當晚並沒有什麼結果，那位被「說服」的女「同志」

哭着離開了支部。

第二天我去看她時，她像經過一場大病一樣的癱軟，她告訴我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後，她堅決地表示不管怎樣也要堅持回師大去，她原是師大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老家是河北樂亭，有一個大學畢業而做生意的男朋友，北平易手前她因爲不滿現實曾加入過「民青」（所謂「民主青年聯盟」的簡稱，即當時中共的外圍組織，參加當時，她一如許多人一樣，根本不知道就是共產黨的組織，「解放」以後，統治者宣佈「民青」的人可以無條件「轉團」，她才明白了究竟，因而她也就做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一般說來，她還算得上一個「積極份子」，但不像有些人那樣幼稚。以前我和她曾被編過一個小組，後來又同被調在一個機關工作，她就是我前文所說被派去做貼資料工作的一個。在最初的兩三個月，處在格格不入的陌生老幹部中，我們見面時確有一份說不出的親熱，她有時同另一個被派貼資料的女「同志」，藉故來看我，我也覺得只有同她們談談才會有一種感情上的共鳴（後來我們被批評爲「小圈子主義」）。她同我一樣，見到過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和許多作風不好的老幹部，但不像我有那麼多的牢騷，她看到那些老幹部爲桌子板凳而爭搶的時候，也顯出一副嫉惡如仇的樣子，有時她無可奈何地天眞地說：「毛主席一定不知道，我要寫信告訴他！」當然她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她也知道隨便寫信是一種「無組織」的行爲。

我那次去看她，我的心情是無比沉重的，不知用甚麼話來安慰她，我知道她不僅是爲了必須斷絕舊時的異性友人而悲哀，也不僅是爲了計較那個被指定的丈夫的年齡懸殊學識懸殊而悲哀，她的悲痛和失望是無法形容的，三年前她曾爲了不滿現實懷着追求理想的心情加入了「地下組織」，她冒過生命的危險爲理想的實現做過不少的工作，如今她發覺了她所追求的，竟是這樣的一個理想。在殘酷的新的現實中，只就

她所眼見的和身受的已經是太多太多了，她的失望和悲痛豈僅是爲了她個人的不幸，個人確是太渺小了，這不幸的年青的一代，有誰能幸免於這空前未有的政治性的騙局呢？

她的拒婚和堅決回北平去的要求，已使她變成了「問題人物」，幾天來都沒有去吃飯和參加開會，那幾天的情形，我也非常隔膜，除了偶而見她進出於支部外，我沒有機會再同她說上一句話。

有一天，那個名爲「協理員」的主持支部工作的女「同志」，囑我用機關名義給北平師範大學寫一封信，我已意識到那個女「同志」的事情或將告一段落了。我取出一個信封，寫了「北京師大負責同志啓」九個字在上面。她繼續告訴我這封信應有的內容：

「本部××同志思想意識落後，不安心工作，堅持個人意見，經組織及團員大會一再教育，不知悔改，現經團委決定永遠開除團籍，並答應她回家的請求，該同志原係你校參軍學生，請予接洽」。

這封信就如此簡單，關於婚事則隻字不提，由那個協理員把它封好，準備連「鑑定書」一齊交給那位女「同志」帶回北平去。

那位女「同志」也就這樣走掉了，我一直沒有再見到她。後來聽說她走之前，曾幾次地被迫出席團小組會和團員大會，事實上，也就是被「鬪爭」過幾次，但她始終不說話，有時只是哭，「組織」也奈何她不得，終於准她回去了。

不久以後，我意外地收到了她從北平的來信，她託我把她未帶走的東西設法寄到北平去，另外她告訴我她又上了一次當，原來是答應她回北平復學的，可是到北平後，師大却不再收留她。想另外找工作，各機關對來歷不明的人又一律拒絕錄用，可是當她出示那封有來歷的信以後，人家更不敢或不屑用她了，最後她非常悲觀地說，她準備回老家同母親紡棉花種莊稼去，不再希望甚麼前途了。

俄羅斯的月亮

我的工作，後來可以接觸一些「國際友人」，我雖然只是處於不重要的地位，但有機會同「國際友人」握握手，一覩「國際友人」的風采，在許多幹部「同志」看來，已是令人羨慕不已的事情了。

所謂「國際友人」，就是蘇聯指派來華的俄羅斯人。東北幾省的老百姓對於俄國人實在領教的太多了東北的婦女提起了「老毛子」都會發抖；小孩子看到强制乞討的「大鼻子」誰不趕快地避開。這些印象實在令人難以忘記，所以「倒向蘇聯」的政策，使那些來自塞外的戰士們，確曾有過極大的惡感。不過，形勢比人還强，那些素有惡感的人，終于又有機會出現在中國的大陸，統治者爲了糾正「老毛子」「大鼻子」的稱呼不夠尊重，爲了減少一些「一面倒」的刺激，俄國人的稱謂已由「蘇聯友人」，又改爲「國際友人」。這種含糊的稱呼，不僅流行在幹部之間，就是無知的戰士也都這樣說。統治者自己並不含糊，因爲它分得清楚，那些應該含糊那些絕不能含糊。

我並不知道這些日益增多的「國際友人」擔任怎樣的具體工作，只不過他們在客居異鄉感到精神苦悶的時候，才會來找到我，因爲我正負責武漢駐軍的文娛工作，我常常在我們經常舉辦的晚會裏，留出比林彪蕭克座位更好的「國際友人席」（三個月來這種席次由二十幾個增加到四百多），至於個別的「友人」想看戲看電影，「上級」早已發過人手一張通行無阻的「國際友人娛樂審查證」。

過去我很難辨認那些屬於不同國籍的白種人，在容貌舉止上究竟有什麼不同。自從我接觸了一些俄羅斯人，才不斷地有一些發現，這些人都是三十年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產物，三十年來極權主義者在企圖

消滅人與機器間的距離，這些俄羅斯人拘謹的舉止和令人感到意外的粗魯動作，正說明了極權者有了某種程度上的成就。可是這些人被派到中國大陸以後，就立即有所改變，中國的事事物物使他們感到新奇，比較鬆弛的「組織生活」，使他們想突破拘謹而趨於放浪，由於過份的被崇拜，使他們都有一份強烈的征服者的矜持。他們絕不像美國人那樣，對中國有悠久歷史的古蹟古物和代表東方民族性一類的東西感到興趣，強調民族特色是被認爲培養民族仇恨的行爲，社會主義者是最現實的，備受「國際友人」垂青的只是落後的中國工業品，當然他們對商場上僅存的西方國家商品更感到愛不釋手。他們對那取用不盡的「人民幣」絕不吝嗇，一如外交官一樣，他們來到中國後都添製了像樣的服裝和名貴的日用品，這使人不能不懷疑關於「社會主義突飛猛進的建設已達到高度工業化階段」一類的宣傳，更使人覺得鐵幕的隔絕，不知將怎樣障礙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不過，不管俄羅斯人本身怎麼樣，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和統治者的幹部，都必須予以最大的而無條件的尊敬，有些幹部更由强迫尊敬的結果，產生了幼稚而無理性的崇拜。

在認識上，必須把一部中蘇歷史重新估價，必須承認蘇聯對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有其友好的意義。蘇聯搬走了東北的機器，盡可以解釋爲蘇聯搬回去是代爲修理代爲保管，或者是說，爲了協助削弱中國「反動派」的實力，但不能說是侵略和擄奪。俄羅斯人强姦中國婦女，也只能歸罪於事件發生的客觀環境，或是那個行爲不正的被姦淫的女人，但必須說「國際友人」是無辜的。

關於蘇聯製造的東西，必須一律予以最高的評價。不好的，加上必要的政治因素，也就變好了。說蘇聯的好，必須兼顧打擊那在中國根深蒂固的「美帝」的東西。

我曾看到有些人，看沒有字幕沒有翻譯的蘇聯電影時，確是莫明其妙地鼓掌喊好，而那些電影常常是內容簡單冗長說教的片子。做爲幹部的我們，不但要當場喊好，更要想出幾點喊好的理由，以便準備在電影觀後的討論會上發言。

極其單調乏味的蘇聯音樂，必須承認它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聲音」。

動作粗魯遲緩的蘇聯舞蹈，也必須說是至高無上的藝術。

蘇聯出品的香烟，也必須說比美國的烟好。蘇聯的糖也比美國的甜，總之，蘇聯出品的東西，必須當做毫無疑義的最上品的東西。

至於那些銜命來華的「國際友人」，更被認爲是學習的對象。

有些幹部誠意地，絕無任何嘲諷意味，模仿俄羅斯人的走路和分手道別的姿態，他們並希望能夠由模仿而進一步變爲習慣。

俄語在中國大陸上已被認爲將取代英語的外國語，各廣播電臺空中教授俄語，各大學單獨成立俄語系（兼修俄國文學），各機關成立俄語速成班，各地奉命成立的「中蘇友好協會」，分別抽調各機關幹部學習俄語，全國各地正式創辦了俄語專科學校（東北尤爲普遍）。每個學習過俄語的人，都讀過這樣的第一課：「斯拉夫語言爲什麼是最優越的語言？」

我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內，更具體地介紹更多的事實。不過，我相信我忠實於自己的報導，也許在許多幼稚的幹部之間，我所說的僅是「俄羅斯狂」的小部份。記得「五四時代」，許多留美的學生，他們除了把科學與民主介紹到中國來，更替美國的生活方式和美國商品作了許多義務宣傳。說美國什麼都好，甚

至於有人說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圓。那時還僅是一種求進步的心理所造成的現象。

可是，今天中國大陸上的「俄羅斯狂」，絕不是自然的趨勢，而是由於統治者的壓力，參與濃烈的政治因素所造成的。自從統治者宣佈「一面倒」以後，「俄羅斯月亮比中國圓」，已不僅是幹部幼稚與愚昧的問題，而變成了統治者本身承認並公開宣佈的「眞理」。「眞理」是不容懷疑的，懷疑「眞理」的就是對統治者不信任，誰又敢承當這不信任的後果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講「怪話」的戰士們

正如人家批評我是「好人主義者」一樣，我確是常常「無原則」地去同情一些人，而我自己却始終認爲這是人與人之間最可珍貴的一點東西。我絕不是因爲接受「學習工農兵」的大道理才開始接近士兵的，在我一生中可以找到很多與下層勞動者混得很熟的例子，我尤其喜歡同他們談天，因爲我認爲這樣才更能豐富我的生活。

在「革命隊伍」中，被稱爲戰士的士兵，是最天眞最可愛，最容易被欺矇但也最勇於表白自己意見一些人。戰士有戰士的一套，他們在開會時或在平時，對於新詞彙的運用使我吃驚，也使我感到興趣。當我空閑的時候，就喜歡同他們攀談，這在有些與大道理背道而馳的老幹部們，則已認爲是不屑爲的事情了。

戰士們說話，說得興奮的時候，常常是想什麼就說什麼，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絕不顧及那些話應該說那些話不應該說。對「組織」不准說的話，戰士們自己的術語叫做「講怪話」。講怪話的要受批評，嚴重的還要受處分。可是他們在講怪話的當時，絕不考慮批評和處分，怪話講多了，「組織」有時對他們也有無可如何之感。

我所說的戰士，是指我們機關中的「勤雜人員」。他們大部份都是北方的農民，「組織」上動員他們到南方來的時候，他們都有一份說不出的恐怖。交通的隔絕與農村見聞的簡陋，在他們腦海中的南方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只要提到南方，他們就會連想到晒焦皮膚的炎熱天氣。他們聽過太多關於南方的神話：南方人的鵝上可以烙餅；北方人到南方會爛掉兩只脚（形容南方的濕氣重）；南方的蚊子像老鷹那麼大，咬

一口就是饅頭大的疙疸，幾天都不會消；南方的耗子比貓還大，專門咬脚指頭……，對於這些荒誕不經的傳說，那些天眞的北方農民都會確信不疑，除非迫不得已有誰願意到南方去呢？可是，「組織」畢竟是有辦法的，終於「動員」他們「自願」地到南方來了，南方的確使他們感到新鮮，他們第一次看到稻田和水牛，他們第一次經驗到聽不懂的語言和四季陰雨的天氣，可是新鮮的並不能長久，當他們意識到欲歸不得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一份憂鬱的鄉愁。

統治者在「動員」之初，像哄騙小孩子一樣，哄騙過這些戰士。在北方的時候，統治者告訴他們，江南兩萬萬的老百姓被「反動派」欺壓得吃不上飯穿不上衣服，已經命在垂危了。同時又應諾他們，只打要垮了「反動派」，就可以衣錦還鄉，到那時分田地娶媳婦，眞有說不盡的光榮，一輩子就太太平平不愁吃不愁穿了。天眞的戰士迫於壓力，也只好對打完仗回家，寄予若干的幻想，爲了這個幻想他們曾忍受了太多的艱苦和不如意的事情。可是，當他們一到南方，就發現了那些被認爲「垂危」的南方人，竟一頓飯吃上四五樣菜，而他們無論在家鄉在部隊中，都只是一樣的大鍋菜。在他們心目中，原應被拯救的却立即變成了「鬪爭」的對象，至於衣錦還鄉的事，再也沒有人提起。誰眞要回家誰就是「反動」，誰要說想家誰就是「落後」。家不但不能回，連說也不能說了，說說家裏過去的情形，都算是冒犯「組織」的「怪話」這些戰士有誰不感到情緒低落呢？縱然能夠講講怪話，發發牢騷，又有甚麼用呢？

唯心唯物靈活運用的統治者，是非常重視士氣的，針對低落的士氣，又發起了「生根」的教育和「建設强大國防軍」的學習。國防軍的學習仍舊從「世界兩大陣營」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齒唇相關」的大道理開始，可是解決不了戰士們切身的問題。相反地，統治者到這時才說了實話：「戰爭結束並不等於反動派

的澈底消滅，更不等於帝國主義的澈底失敗，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一天，就必須鞏固並增强軍隊。」那些蒙受欺騙的戰士，到這時也覺醒過來。一個通訊員「同志」無可如何地說：「甚麼國防軍？他媽的，反正是打不完的仗，俺們這一輩子就不用想好了！」

當然一向服從「組織」的積極份子，這時又開始了對國防軍的幻想，他們非常嚮往那即將到來的西馬拉亞山山頂上，或是海邊上駐防的生活，他們把游水和爬樓梯，都當做了幹國防軍的準備工作。

我們機關通訊班的戰士，經常在我宿舍邊一間小房子裡開會，有時我會非常有耐心地去聽，對他們的發言我更感到極大的興趣。最初他們是開「評功會」，檢討行軍途中的功過，「評功」是「慶功」的準備工作，他們之中當然也有黨員和積極份子，黨員和積極份子都想盡辦法來爭取做「功臣」。戰士們當了功臣說不定就有機會晉升幹部。我常常聽見些戰士這樣說：「有功沒有功要大夥發言，黨員就有功，那不行！講怪話不講怪話有甚麼關係，只要工作不落後就行！」這是我在任何幹部會上聽不到的大膽發言，我之所以覺得戰士「同志」是可愛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不過，事實證明大膽發言的，只能算是又多講了一次「怪話」。因爲在「慶功會」上，我發現那些披紅掛綵的「功臣」，沒有一個不是黨員的。

我曾聽到一個戰士在小組會裏質問另一個戰士說：

「你不想家？我說說就算講怪話，你想家你不說，就算是積極。誰工作做的多，誰方是積極，整天裝啞巴，有甚麼吊用，算得了甚麼狗屁積極！」，這說話的戰士當然可能遭到一些暗算，可是這幾句簡單有力的話，誰能說它不是包含了最眞實的感情和最正確的道理呢？

我到部隊去的時候，更知道一些戰士們的故事，一個戰士曾向我發牢騷。他說在北方時候，「組織」上在那些改編來的南方人當中，發動「積極份子」，培養骨幹，怕家在北方的戰士開小差，叫南方人來監視他們。及至到了南方以後，又在他們北方人中發動「積極份子」，說他們沿路行軍表現得怎麼好，讓他們來監視那些南方人，又怕南方人開小差。他最後對我說「其實，誰也不必監視誰，誰有種開小差，誰就是找死！」他又告訴我他們連長抓到開小差的戰士，就當地打死。當時我聽到這樣的話，非常氣憤，回到機關以後，我曾爲那個打死兵的連長向上級做過報告，當然是沒有下文。當我說給那些在城市工作的知識份子們聽時，他們竟沒有一個人相信。

後來我整理師以下各單位的油印報紙，證實了那個戰士的牢騷：互相監視的事被認爲是「落後份子的猜疑」，打死兵的事情則說是「個別現象」。

一對戀人的幻想曲

一個在支部工作的女「同志」，常常到我們的辦公室來玩，辦公室的佈置對她確有很大的誘惑。在那位善於討好上級的科長計劃下，原來就很像的辦公室，以兼替部長接待來客爲名，又購置兩套花絨的沙發，並添了幾盆冬夏常青的花，裝了日光燈，掛起羅紗的窗簾，這樣的佈置很像一間幽雅的沙龍，只是與我們嚴肅的工作和破舊而難得換洗的服裝不太協調，正像那位部長的批評：「夠富麗，不夠嚴肅，適於談情說愛，不適於發號施令。」

不過富麗畢竟是誘人的，那位女「同志」就是嚮往富麗的賓客之一。許多東西對她都是新鮮的，她坐在沙發上，有時用手撫摸沙發的花絨面子，有時把兩隻腿伸直，頭往後面一仰，像在凝思什麼。我同她已經很熟了，有一次她拿一封母親的來信給我看，又興奮又好笑地說：「你看，隔了這麼多年了，她還是那麼落後！」

我最初不知她何所指，等我一字一句地看完那封信，才明白了她的意思。母親在信上說：在她舊時同學的家裡打聽到她的地址，家裡人都高興得不得了，並告訴她家中幾年來的變遷。最後提到聽說她已經同一個南方人結婚了，以極其關懷的口吻問她，婚後的生活美滿不美滿，有沒有小孩，丈夫幹什麼行業，品貌怎麼樣，多大年紀，家境好不好，並盼她寄一張結婚照片回去。我知道她所說「落後」，就是指後面的這些。當時我注意一下她的表情，心裏想，做爲母親的那一個不痛愛她的兒女，何況是許多年來行踪不明的女孩子，母親的殷念和關注原爲意料中事，可是老人家一片慈心却換得遠在異地的女兒的奚落，難道這

就是人類的進步嗎？我實在難以相信這就是她的眞實感情。我說：

「老人家對子女的關懷，往往不是做子女所能想像的，在中國社會裏，尤其是鄉下，這是極其平常的事，根本不是什麼落後不落後的問題！」

她依然很興奮地反覆地注視那封信，我怕她故意找理由來駁我，接着又說：

「假如是老人家落後，那就該是你的進步了，是不是？」

她看看我，笑着說：「不過，你不知道，我家鄉那些地方才「封建」呢，「老頑固」多得很，我出來是跟人家偷着跑出來的！」

她曾讀過高中，對一般問題的瞭解還算比較高明，因此她也有着不可免的「小資產階級」的味兒，我們辦公室隔得很近，常常在一起閒談，我也很喜歡同她談，不過，有時又非常討厭她的做作。尤其是她在談話當中，忽然意識到自己是黨員和組織工作者的時候，更表現得令人厭惡的做作。有時我們正像談家常那樣隨便那樣起勁時，她却總愛由「可是」「不過」引出一大堆教條來，我們的談話往往也就因此中止。

她很喜歡零食，「女同志」在生活待遇上，原有一份約合津貼三分之一的衛生費。衛生費的明文規定，是用以購買衛生紙的。她總是把這爲數不多的錢，拿來買酸蘿蔔和烤紅薯吃掉。至於紙，在她則認爲終會有辦法的，宣傳機關多的就是紙，一刀十行紙盡夠用上一兩個月了。

因爲很熟了，她有時逼着叫我請客，可惜我的津貼尙不敷買烟。其實她又何嘗不知道，不過，她總是半眞半假地要我請她吃東西，她告訴我管理科的老「同志」曾請她吃過一碗麵，並誇耀那是她有生以來沒

有吃過的好東西。後來我知道，她所說的是指南方館子油水很多的排骨麵大肉麵一類東西。對於一個幾乎是長年素食的北方女孩子，難怪她要那樣感到興趣。我笑着跟她說，只要她不計較其他影響，我照樣也可以請她吃一碗，同時都不需要我自己付錢。她以爲我在哄她，已經是夜裏十點鐘了，一定拖着我去請她，我原是說笑，最後弄得沒有辦法，只有陪她到一家相當堂皇的館子裡去，這是我參加「革命」以後的第一次。我另外打了一個電話，請一位家在漢口而沒有「革命」的老同學代我去付帳。館子的伙計，以驚奇的眼光看着我們，因爲前來惠顧的客人，是一對戎裝的「解放軍」。

我們吃了一籠飽餃和兩碗魚麵，我那位同學來付帳的時候，她顯得不好意思，滿臉緋紅，而我那位不知底細的同學竟以爲我們在談情說愛，也有些驚訝。當晚回來的時候，她曾不住地讚賞那鮮美的南方口味。

第二天我們見面的時候，她却又告訴我那些東西並沒有什麼好吃。她沒有說出原因，我也並沒有追問什麼原因，因爲我已熟悉了她這一套她是常常在事後記起影響的人。

有一次，她問我：

「假使從此就沒有戰爭了，大夥都復員了，你想幹什麼？」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我怔了一下，我向她表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假如這樣想時，也將被認爲是不通的，因爲戰爭復不復員，什麼時候復員，都屬於軍事機密。至於想幹什麼，和不想幹什麼，更不是一個人自己意志所能決定的東西了。

接着她却告訴我，她同另一個男「同志」曾談起這件事：

男：假使沒有戰爭了，我要做個攝影家。

她：假使沒有戰爭了，我要做個音樂家。

男：假使沒有戰爭了，我要住在青島。

她：假使沒有戰爭了，我要住在北京。

男：假使沒有戰爭了，我還要念幾年書。

她：假使沒有戰爭了，我也要念幾年書。

男：假使沒有戰爭了，我希望在海邊有一所房子。

她：假使沒有戰爭了，我希望在鄉下有一所房子。

男：假使沒有戰爭了，那多有意思！

她：假使沒有戰爭了，那眞有意思！

她講完了這境界幽美的幻想曲，又加上了一個破壞氣氛的聲明。她說她們兩個人是一邊談話，一邊批評的。她說一句，他批許一句，他說一句，她批許一句。

所說的那個男「同志」是她舊日青梅竹馬的朋友。過去兩家人家住在一條街上，小時候在一起玩，大了在一個學校念書，年青的時候，誰也不懂得甚麼是戀愛，只是彼此都有一種說不出的關切誰也離不開誰，一離開，那怕是一天，都會覺得像少了甚麼東西似的，心裡會惶惶然甚麼事也做不下去。六年前，兩個人在煽動的宣傳下，一起離開了烟台老家，偷着跑到大連去參加「革命」。在「革命隊伍」中，他們都長大了，雖然還是心心相屬，從來也沒有離開過，可是，她們已經懂得客觀環境使他們沒有結合的可能了

。兩年以後，兩個人都先後入了黨，但是，那個男的，只能眼看着青梅竹馬的女友，被迫做了老幹部的「「愛人」」。男的曾因此鬧過很久的情緒，最後還是時間冲淡了這件事。那個男的就是那時我們機關裡的會計，女的丈夫是「民運部」的科長，遠在廣西，始終沒有回來過。

她還有機會同那個應稱爲「同志」的舊日戀人常常見面，見面的時候，還有一種超越普通「同志」的親熱。這兩個已成年的男女，有時候爲細故在辦公室裏打架蹉跤，女的扯着男的耳朵，男的拉着女的頭髮，有時又很正經地擠在一起唱歌，但是偶而進來個老「同志」，或是有人提起他們的舊事時，他們立即會默默地走開了，有時會因此幾天不說話，甚至於不想見面。

他們自己的感覺，我無從知道，不過，我深信那斬不斷的往事已刺傷了他們的心，他們依然保有天眞的擧止，和夢一般的幻想，正說明了這些。試想是怎樣殘酷的外力，拆散了這年青的一對，更殘酷的是使她們竟不能斷然分手，而這一雙不幸的年青人，又被迫朝朝暮暮地，去咀嚼那痛苦的聚首。

隱蔽嘴牙的「侵略者」

猿猴學習只開了一個端，大家就知難而退，不是覺得太涉及專門知識，就是感到空洞乏味。老幹部的看家本領「聯繫實際」，第一次遭到無法運用的苦惱。「組織」爲了提高情緒，曾破例地放演過一次「北極人類生活」的美國電影（據說有助於對「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瞭解），結果還是提不起大家的興趣。當然猴子本身，還不失爲一個談話的資料。部隊裏送來的學習報告，雖然都說：「經過這次學習，各級指戰員（指揮員戰鬪員簡稱，即官兵）在思想上都提高了一步」。可是做爲發號施令大機關幹部的我們，却感到極大的慚愧，因爲我們實在無法領會，縱然知道了猿猴變人，如何才能在思想上提高一步。

不久，猿猴的學習奉令擱置。從中央到地方，又展開了關於美國人的學習，但絕不是學習美國人活潑的個性和進步的科學知識。所謂學習正如組織所說，是更進一步認識美國人的「侵略本質」。這是由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所引起的。與美國人不共戴天的統治者，在一向的反美宣傳上，雖然可以把一個人的事情，擴大到一億五千萬人；可以把一個士兵的醉後行動，歸罪到杜魯門的指使，但有時也不免爲缺乏具體內容而感到焦急，白皮書的發表被認爲是有隙可乘了。經過「新華社」修正的白皮書，以「無可奈何的供狀」爲題，出現在各地的報紙上，「新華社」把它當做最重要的宣傳任務，接連發表了六個有關白皮書的評論。評論的總精神是「反美」，評論的方式則不妨斷章取義，只要是被認爲可以打擊美國人的言詞，統統有了用處，評論中最痛恨的是艾契遜在白皮書中稱：「我們相信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必將東山再起！」，統治者認爲存有保留觀望態度和表面附和的知識份子，是個不可忽

視的數字，而這些人被認爲分化和削弱政權最可怕的力量。所以，「反美」之餘兼而「反」之。評論中並指出，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就是「反動的舊知識份子」，這僅是提供一個警告，在法不成文的時代，「新華社」的一句話，往往就是「人民法院」最有力的條文，誰想「反動」，誰就去談民主，談個人。

一切學習，絕不是從不知到已知（不知者不怪）而是專爲糾正觀念或加深認識而設置的。「修正」的白皮書和六篇社評被指定爲必須接受的學習。學習的目的，則着重「整肅」任何對「美帝」的保留思想。（保留不等於親美，親美份子的「學習」，已是屬於「人民法院」的事了！）

一度爲魯迅死對頭後來轉變爲魯迅身後知已的徐懋庸，被當做了美國問題專家，輪番給各機關幹部做「反美」的報告，專家的口吻畢竟不凡，一開頭就說：

「美帝國主義是最殘酷，最毒辣，而目前又最爲强大的侵略者！」

專家的言詞與激動的表情，的確夠得上「忠」。但做爲聽衆的老幹部早已熟知了這一套，對於新知識份子幹部來說，却又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們縱然不敢談甚麼反感，至少也覺得這種說法是一種欠客觀的「偏差」。專家是敏感的，立即發覺了這一點，接着像透露一個秘密地說：

「不過，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常常是隱蔽的，表面上是很難看得出來的，絕不像德日那些國家，侵略的嘴牙是裸露在外面的！」

在整篇報告中，專家大部份還是着重於分析「美帝」即將到來的自行崩潰，關於「侵略」的事實，則涉及的不多。

一個北平來的老同學，他聽了專家的報告以後同我說：「德國是固體的侵略，美國是氣體的侵略，至於

蘇聯—」他環顧了一下四週，悄悄地笑着說：「那該是液體的侵略了！」

「氣體侵略」，後來流行在我們被認爲「落後」的幾個熟人之中，一提起來誰都有一份按捺不住的笑。

我們小組裏原以猿猴爲題的討論，也改換了新題目。做爲小組長的老幹部，在他「美帝介紹」的開場白中說：

「美國的兩個政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

「對於出錢的老板來說，美國的兩個政黨是爭寵的大小老婆。」

「美國人的所謂競選，是以杜威好看的鬍子和他的紳士架子，做爲選民投票的依據的！」

「對於美國的男人來說，女人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

「美國人把已出產的商品自行毀滅，把糧食倒入大海裡去，但終于逃脫不了經濟總崩潰的命運！」

「美國商品傾銷和商業宣傳，糢糊了世界人民的耳目，事實上，最進步科學產品，是應屬于蘇聯的一邊。」

「關於美國對原子彈的居奇，莫洛托夫曾說：「只有落後的中國，才會把它當做最神秘的事情。」在蘇聯早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

「……」

這篇「美帝介紹」並非我們小組長的傑作，而是「組織」頒發的「文件」。「文件」中還有許多有關白皮書的名詞解釋，可惜大部份我已不復記憶了。只還記得兩個人名的註釋，一個是「馬爾薩斯」，註釋爲「十九世紀反動的經濟學家」。另一個是「司徒雷登」，註釋爲「曾在中國以辦教育爲掩護，進行特務工

作的美國人……」

「組織」的「文件」雖是不容懷疑的「眞理」，但將近一個月的「反美學習」，只是使許多人對美國的東西，不敢表示什麼意見了。不過，假如拿一支蘇聯出品的鋼筆和美國的派克五一號，送給任何一個老幹部去選擇，還一定會發生未經學習的結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關於「人民藝術」

唯物論者把人類知識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屬於自然鬪爭的，一類是屬於社會鬪爭的，所有屬於知識範圍內的東西都被包括無遺，除此就再也沒有知識。「鬪爭」被認爲是唯一的政治形式，因而「人民世紀」的任何東西，都離不開政治的範疇，更離不開「鬪爭」的形式。那怕是一草一木之微，都被認爲有它一定的政治根源。一代哲人馮友蘭，在風燭晚年居然也發覺了這個「眞理」，據說他曾自喻「盛世遺民」自動地向毛澤東去表示不甘冷落，統治者除了面予嘉許，並對他六十年來糢糊人民思想的「罪行」表示寬大。六十年來一場夢！他只好希望在難盼長久的有限歲月中，去「帶罪圖功」。其實，馮先生的「進步」還是欠通的，所謂「人民盛世」，除了鞭長莫及的海外「白華」和武裝鎭壓的「國民」（人民國民有別，後者指已被剝奪統治工具而必須施予武力鎭壓的舊統治階級，見「人民政協」周恩來報告），不可能再有甚麼「遺民」了。統治者雖未嘗自比略輸武功的劉皇叔，但在「三顧政策」的大力推行下，「遺民問題」早已是一個不存在的問題了。

以畫馬聞名的藝術大師徐悲鴻，據說也領會到這個「眞理」，自動地走出了他那厮守幾十年的畫室，記得在抗戰時代，國家危亡一隅，都未曾使這位大師動情而有所覺悟，挾着他那叔後的畫幅，兜售於西南山地之間，換得錢來飲酒賦詩，而陶醉於「國家事管他娘」的清高之中。可是，北平易手的頭一天，我們的大師一覺醒來，却有了空前的「覺悟」，善於「照顧影響」的統治者，對他過去爲「資產階級幫閒」的「罪行」一概不予追究，附帶的條件一如任何知識份子參加「革命」一樣，是必須「帶罪圖功」。大師在第

一篇帶有自我批判的論文中，首先否定了早應被拋棄的國畫的藝術價值，因爲專門在山水人物上求發展的國畫，太缺乏了鮮明的「階級性」，並深悔自己竟被這理應拋棄的東西糾纏了幾十年。不過，大師畢竟還是不夠坦白，始終沒有承認過自己的糊塗，却一如統治者的口吻，把貽誤他幾十年的責任都歸咎於「反動派」（假如大師再年青一點，那將要歸咎他的上一代）。從此，大師有了「轉變」後的創作（當然不再是馳騁行臥駿馬圖的一類），除了繪製「英雄」和大砲的雄糾糾氣昂昂以外，便是大畫「反動派」的醜惡。大師的「舊知識」發生了「新作用」，前者是「寫實主義」，後者則用的「浪漫主義」的筆觸，我說「浪漫主義」，是指也許會爲大師舊日所推崇的「反動派」，出現在他「轉變」後的筆下，竟是額角上貼了膏藥，青面撩牙，或是骨瘦如柴的一些人。

我過去曾對畢生致力學術而不參與實際政治的人，有過由衷的敬仰，我認爲學術的發展，將會直接影響到政治的提高，而學術工作者不一定就是實際政治的執行人。我這種思想，在「革命隊伍」中雖然遭到了毫不容情的批判，但當我看到過去被尊稱爲學者的一些人，在高呼「萬歲」或是潑罵「反動派」的時候，始終還有一份不舒服的感覺。

藝術有了現實政治的內容，就不再是深奧而不可捉摸的東西了，一切適宜于政治的都適宜於藝術，藝術變成了統治者「解決問題」（共產黨人語）的工具，而藝術理論和藝術批評，都有了明確的必須遵循的標準（比方向更爲具體）。「動員」從延安到北平，十多年的「革命史」中，找不到一篇稍有獨立價值的藝術理論和批評，唯一被認爲是「經典文件」的，就是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而這篇講話，正是爲當時「動員」藝術工作者，必須服從政治需要所講的。

我所在的機關就是被認爲對所謂「人民藝術」最有功績的一個，不但本身擁有爲「藝術」效勞的一千五百個左右的幹部，更經常收留一些「二野」「三野」派來「留學」的幹部。這個龐大的爲政治目的而製造「藝術」的部門，包括了文藝、舞蹈、音樂、平劇、話劇、歌劇、電影、繪畫等單位。後來由於工作的關係，對於這些單位，我都有相當的熟悉，但對於他們各式各樣的製成品，我却漸漸地失去了興趣。

在工農兵都是專家的時代，音樂和繪畫的產量是比較驚人的。工農兵順口哼來的東西，都被認爲是最可借重的形式，一經「內部裝修」，就變成了最富代表性的音樂；改換內容的山歌和小調，更被認爲是來自民間的最高藝術。至於繪畫，那些被認爲「無原則無立場」的國畫和西洋畫，早經一筆勾銷，出盡風頭的，只是三筆兩筆勾成的漫畫與木刻，誰要挑剔繪畫的素養，誰就是「落後份子」，爲藝術而藝術，不僅僅是「落後」，而且被認爲是「糢糊」人民思想的「幫閑藝術」。

「記錄電影」據說是「布爾希維克」電影事業的最大成就，所謂「記錄電影」，就是由許多片斷接連而成的時事影片。東北製片廠被接管以後，曾連續地出了十一輯「民主東北」（每輯放映兩小時）。一年多的時間，我只看過一也是唯一的一部以故事爲題材的新出產的影片。「記錄電影」的成就確是不容忽視的，因爲這就是被統治以後電影事業的全部。

歌劇話劇仍然停留在延安時代，當然隨時都有些爲更短時效的政治目的而上演的「活報劇」，但這正如一頁一頁被撕去的日曆一樣，是些過時作廢的東西。歌劇話劇唯一的特點，是以窮人爲當然的主角，其他的任何角色，都只是屈居三花臉的小醜地位。「文工團」的道具中，最珍貴的東西就是窮人的衣服和用具，而在上演的當時，也許爲了更多的需要，要情商更多的乞丐和伕力去借道具的。

只有一種以不變應萬變而任何場合都適用的「藝術」，那就是三進一退永遠扭不完的「秧歌」。

我無意說這就是「人民藝術」的全部，但被內容與立場所限制了的作品，已種下了無法前進一步的危機，雖然統治者也在大聲疾呼：「來一個文化高潮！」（毛澤東語）。事實上，想突破這一危機，問題已不是藝術本身所能爲力的事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在「改造」中的平劇

許多老幹部對京戲都有特別的嗜好，走進每個機關常常可以聽到幾句「父女打漁在河下，家貧那怕人笑咱！」的京戲調子。京戲被認爲是擁有最多觀衆而最可利用的「民族形式」，不過，老幹部們對這所謂「民族形式」的知識，却少得可憐。他們所熟悉的老生戲是「打漁殺家」，武戲是「三打祝家莊」，且角戲則只有程派的「鎖麟囊」，除此就是一些改編的農民造反的「本戲」。在陝北的時候，由於偏安生活的苦悶，據說從毛澤東到炊事員都有這同一愛好，只可惜那時「革命」的平劇工作者太少，不但是能編能寫兼有「正確思想」的劇作者沒有，就是連能夠粉墨登場的角兒也不多。所以這個被認爲可利用的「民族形式」，始終沒有很好地利用過。但是，等到直接控制了劇作者和角色的時候，不幸又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實際問題。

在京戲發源地的北平，對京戲的重大措施，就是「禁演」。忠孝節義被當做違禁的條例，結果，除了「黃巢造反」，「闖王進京」（劇名）之類，京戲變成了眞空，數以萬計的舊藝人，都面臨凍餒失業的危機。統治者最後也覺得，這種因噎廢食的辦法有些欠妥，所以禁演的政策，被批評爲「過左」。

到武漢以後，僅有的兩家京戲院，在不同的「罪名」下分別被接管。這時，關於上演的節目似乎放寬了一點。但兩個主持戲院的老幹部，爲了「表現工作成績」，竟發生了不能統一的矛盾，展開日益激烈的商業競爭。不但視「禁例」爲具文，且專門以賣座的色情節目爲號召。一家名爲「民衆樂園」的戲院，在報紙上大登廣告「天河配，准代仙女洗澡，維妙維肖，生動逼眞！」另一家名爲「人民劇院」的也不甘示

弱，登了更大篇幅的廣告：「盤絲洞，曹慧麟藝員在劇中唱流行歌曲，表演時裝舞藝，空前轟動，欲罷不能！」這些廣告都是出現於被認爲「嚴肅而對讀者負責」的「人民報紙」上，這種由放寬到放縱的現象，後來被批評爲「過右」。

造成「過左」「過右」現象的上級機關，就是我所在的宣傳部，這問題曾使我們機關中的領導幹部大傷腦筋，「過左」「過右」都必須糾正，但「不左」「不右」又有騎牆之嫌。經過幾次的重要會議，才算有了左右兼顧的新決定，那就是對內不妨「過右」，和對外則不妨「過左」。於是又重申禁令，除原有被認爲意識正確的京戲外，對外演唱的開始有槍斃楊延輝的「新四郎探母」，替潘金蓮伸冤的「武松與潘金蓮」，殺地主爲農民報仇的「九件衣」，法海和尙掌心雷變成忠孝節義四個字的「白娘子」（即白蛇傳）以及許多翻案的武戲。

由我們主辦的各種晚會，則不受禁令的拘束。特殊的晚會，首長們可以自由點戲，點所欲點，絕無限制。一般的晚會則由宣傳部本身來決定。後來，關於晚會節目與角色，我變成了做最初步決定的人。

我雖然不懂京戲，但由於工作關係，慢慢地已能夠摸索到「同志」們的喜好，晚會的個別節目不宜太長，生旦淨末丑都有一點，用一個輕鬆易懂，而能引起「同志」們興趣的旦角戲壓軸子。對我來說，這已形成了一個公式，不過，唯有這種不偏不倚的辦法，才可以避免人家「提意見」。

除了前面我所介紹的戲院以外，歸我們直接領導的，另有兩個平劇隊以及一個平劇工作團，總人數約有四百人。兩個平劇隊，都是後來接收的戲班子，一隊原是曾在抗戰時走遍大後方的四維兒童劇團，只是那些兒童，已不再是兒童了，過於繁重的任務和艱苦的生活，使他們都唱倒了倒[illegible]子，就戲論戲，這些人不再

會有什麼前途了。

二隊是一個舊班子，據說曾因給國軍華中剿總唱過戲而被當做了「戰俘」，經過兩個月的「教育」，才由長沙帶到漢口來的。爲了洗不清的「反動」罪嫌，班子裡的人誰都不敢也不可能「脫離革命」。他們之中包括幾個過去稍有名氣的角色，一個唱旦角的（姜晚華），據說曾在華中紅過一時，但到「革命隊伍」裡來，首先被批判的，就是那些發紅發紫的名氣問題。誰再計較「掛頭牌」「掛二牌」，就是思想沒有搞通；誰再計較什麼「包銀」之類，誰就要挨批評，從過去一個月賺幾十兩金子的名角到跑龍套的，跟班的，都一律給予「戰士待過」。那些過去專門在名氣上，包銀上討價還價的名角，到這時，也只好安於一天兩頓的高粱米和每月一兩塊錢（以港幣計）的津貼。過去名角們唱戲，除了包銀問題，戲院經理人還必須尊重名角們的意見。名角們可以自己選擇節目，登臺的時間，以及配戲的角兒。此刻，他們都再無權過問，一切要服從「組織」。這個在「改造」中的戲班子，曾引起我的好奇，我常常想跟他們談談，可是他們知道了我是屬於上級機關的幹部，誰又敢冒犯「組織」來講怪話呢？只是那個給名旦角跟班的老太婆會嚕囌不休，使她最痛恨的是梨園中一向供奉的祖師爺木牌位，却給「同志」們當做柴火燒掉了。

她對那個旦角，始終還沒有改用「同志」的稱呼，一開口還是「我們姑娘」或是「我們老板」，這在我們已經感到不大習慣了。有一次她在吃飯的時候，向我抱怨：首長就可以大米白麵的吃，我們就得啃高粱米，我們有錢也不讓我們吃，這世界可眞變了！」她看看那個也蹲在地下低頭吃飯的旦角，又看看我說：「你們可眞不知道，我們姑娘的委曲受大了！」

至於平劇工作團，僅僅是一個領導機構，其中並沒有人能夠拉拉唱唱，工作團的唯一工作，就是接管

並主持那家「人民劇院」。團長是一個識字不多的南方人，只會哼兩句「追韓信」之類，但頗得力于他那做指導員的「愛人」，以色情節目來競爭生意就是這賢內助的主張。被批評爲「過右」以後，她屢次表示對組織的不滿，不止一次地向我說：「講原則講立場？戲院子就得關門！老實說看得起戲的都是有錢的人，可是要我們演的戲，又專門跟有錢人做對，試想誰肯花了錢來買罵呢？」她的意見，在當時確是有相當道理，但是，上級機關不肯牽就所謂「純營業的觀點」，結果，那家戲院，却弄得敞開大門也沒有人願意進去，因而那些主持戲院的幹部，在後來還是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出賣一些色情節目，來挽救一點經濟上的危機。在整個平劇工作沒有明確指示之前，那個所謂的上級機關，後來也只好睜一眼閉一眼不聞不問了。

一部巨片的上演

被批評爲「本位主義」的現象，還在繼續發生。財經部門比較有錢用；供給部門的伙食吃得好；管「照顧」的幹部容易請准「保健費」；搞衛生的幹部可以拿紗布來做蚊帳。至於我們做宣傳娛樂工作的，那就是多幾次看戲和看電影的機會。看電影這回事，對我們來說，確實是太方便，我們有自己的放映隊和接管的電影院，首長高興的時候，可以陪首長一起看；首長不高興的時候，也總可以找個機會，溜到電影院去坐上兩個鐘頭。至於電影院的檢票員，看見了「解放軍同志」，還有什麼話說，何況又是上級機關的幹部。就算是不採取這種方式，看電影的機會，也確比其他機關多得多。一個通報來了，全體「同志」都可以鎖起門來，去看一次電影。這種通報在我們機關裏，每星期都不會少於三次，因爲看電影也可以藉口說是爲了「學習」。

「佈置電影」也是我的經常工作之一，那些通報就是經我決定和起草後，請示首長而發出去的。假使一連有三四天沒有電影看，任何人見到我就會問：「什麼時候看電影？」或是「我們該看一次電影了吧？」當我到厨房去的時候，連燒飯的炊事員，都會關心到這件事，有時爲了想要看電影，炊事員在沒有到開飯的時間，就送給我幾個餃子嚐嚐。因爲我除了寫通報之外，還有一種填寫免票證的權利。

假如我自己想看電影，那當然更不成問題了。任何影院，任何影片，都可以由我自己來選擇，但是我却很少去看過。因此會有人誤以爲我的工作積極，頗得不利用職權的好評。其實，我只有一個從未透露過的原因，那就是我對於當時所放映的片子毫無興趣，强調興趣，要挨批評的，我也落得不講。當時放映的

片子可分下列三大類：一類是時事片斷的記錄電影，像「民主東北」，「百萬雄師下江南」，「新中國的誕生」等。一類是來自蘇聯而字幕不全的說教電影，像「鄉村女教師」，「青年近衛軍」，「米邱林」等。還有一類是經過愼重檢查而重新剪接的舊國產電影，像「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雲和月」，「艷陽天」等，後者我差不多早就看過了，而前兩類我從來就沒有把它當做是屬於藝術的電影，當然這印象是由於我看過幾部以後而日益加深的。

我對電影曾有過一些偏愛，那當然是「革命」以前的事。十年前有結構有內容的片子，十年後我還可以有清晰的記憶。我從來把好的電影當做教育，却從來沒有把它當做宣傳。我絕不像有些老幹部那樣，盡管不懂影片上說些什麼，只要看到「蘇聯出品」四個字，就狂呼叫好。我也絕沒有對一部支離破碎的時事剪接片子，連續看上十遍八遍的興緻。關於電影，我寧願保留不爲人家所知道的看法，除非被迫而要當做學習「文件」，我也只好去忍受那兩個鐘頭的黑暗。

久經宣傳的第一部以故事爲中心的電影「橋」，我終於也看到了。報紙上曾通過廣告副刊和顯著標題的新聞來大事宣傳，說這是「轟動解放區劃時代的最佳影片」，又說這是「開人民電影的新紀元」。這樣隆重的片子，首映權無疑地是屬於我們接管而享有特權的電影院。正因爲這樣，我有機會知道這部片子的放映經過，像迎接一個重大任務一樣，在影片尚未運到的時候，我們就開過了兩次會，會上除了決定通令各宣傳單位協助宣傳外，並撥出一筆數字驚人的款項做爲宣傳費。那個照相館學徒出身的影院負責幹部，更忙得不可開交，除了做街頭的招牌廣告，印紅紅綠綠的海報，還要代報紙的專刊拉稿。在放映的前兩天，又「動員」各單位的「秧歌隊」，在大街上扭着宣傳。這同我以前所看到賣藥和賣香烟，創招牌的宣傳絕

無兩樣，統治者自己也不否認這是給「人民電影」創招牌，只不過是「本質」不同。在決定擴大宣傳的會議席上，就認爲除了介紹新的「人民電影」，更要兼顧打擊老百姓對美國影片根深蒂固的崇拜心理。統治者認爲美國各式各樣有色有味的電影，已弄壞了老百姓的胃口，所以對於「進步」而有「正確意義」的蘇聯影片和記錄影片，都不大容易接受。如果不祛除老百姓崇拜美片的思想，將是「人民電影事業」的最大障礙。

統治者在奪取政權之前，曾不斷地頌揚過：「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藉以假人民之口來攻擊當時的政府。可是，在奪取政權之後，老百姓的眼睛就不再是雪亮的了，一變而爲最「落後」最「盲目」的一群。因爲那第一部以故事爲中心的影片的上演，雖經大力宣傳，結果竟是意想不到的失敗。西方國家常常以票房紀錄，做爲對影片的最好評價，可是，對於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來說，票房紀錄的慘跌絕不意味着影片本身的失敗，也毫無損於影片本身的價值，而只是老百姓的「落後意識」負了全部責任。

「橋」的上演，只收回了宣傳費的四分之一。本擬連演兩週，可是，在擬滿一週的時候，每場賣座已不足全場的十分之一了。那個影院的負責人，天天跑來請示我們的部長，並報告當天賣座的情形，畢竟是部長「同志」魄力大一些，後來決定宣傳不計代價，免費招待工人駐軍和學生，才又續演了一星期。這時長沙的「新湖南日報」上，已經刊有顯著的預告：轟動武漢的劃時代鉅片「橋」即將來湘。

清道夫與藝術家

看完如此轟動的「橋」以後，我們照例地要專題討論。這第一部以故事爲中心的巨片，敍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東北「解放」後的某地，爲了軍運頻繁，在冰河解凍之前，要趕修一座工程浩大的鐵橋。承擔修橋任務的是一家被接管的工廠，工廠裏除了工人原封未動外，從廠長到人事管理員都換了「解放軍同志」，其中僅有一個美國留學的工程師是唯一的「留用人員」，整個故事就是針對「教育」這個雖蒙留用，但尚未「覺悟」的工程師。

工程師被派草擬修橋計劃，計劃中認爲需要三個月的時間，才可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進步」工人知道了這個計劃之後，一致表示反對，並指出這就是工程師一貫的「落後」，和屬于「官僚主義」的作風。群情激奮，當時就紛紛向「組織」保證，只須一個月的時間即可完成任務，絕不依賴任何計劃。

修橋之前，還要趕修工廠裏已被破壞的重要機件，鼓風爐破壞得最爲嚴重，工程師認爲非派人到天津去買白金器材來不能爲功，「進步」工人又異口同聲地表示反對，就在當天晚上，那龐大的可以溶鐵鍊鋼而損壞最嚴重的鼓風爐，被「進步」工人在幾小時之內修復了。

工廠的發電機忽然發生了故障，工程師表示束手無策，結果也由「進步」工人不假思索地予以修復。故事中隨時都介紹了工人們美不勝收的新發明，以及保證提前完工的積極情緒。

最後，僅以工程師所計劃的六分之一，「進步」工人所保證的二分之一的時間就提前修復了那座工程

浩大的鐵橋。故事的結束，是在鐵橋通車的一剎那，工程師感動得流淚，表示「向工人學習」的決心，許多「積極份子」的工人，立即被批准入黨。

故事中除了有如罪人的工程師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主角，是一個典型的「進步」工人，當然更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故事開始的時候，他正在患病，但是修橋的任務使他興奮，他摔破了藥罐子和盛滿稀飯的碗，整天整夜地積極工作，修橋期間他從沒有睡過覺，故事中一切的創造和發明，當然也都屬於這個「進步」的典型。

這就是被稱爲「開人民電影新紀元」的巨片的全部，也就是被認爲第一部以故事爲中心的所謂故事。電影中沒有明星，全部是無名的「解放軍同志」和「工人同志」，因爲「明星主義」被認爲是極端的「個人英雄主義」。

電影中沒有女人（更談不上主角了），女人就是黃色，在「新社會」中，女人也只是在某種意義上才可能受到普遍的重視。

故事的眞實性是不容懷疑的，導演的手法，題材的處理，以及個別的演技都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玩意兒。我們的專題討論，只是被指定要學習「工人階級」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工人階級」被認爲是最「革命」的先知先覺者，不過，所謂「工人階級」，只是指那些「覺悟」的「進步」的而已經入黨或即將入黨的工人（任何人的「覺悟」與「進步」，最終表現都必須是入黨，不如此則無足以表示「覺悟」與「進步」），至於那些「未啓發階級覺悟」的「落後」的工人，盡管是大多數，也不在此列。關於「工人階級的「豐功偉績」，我已經非常熟悉了，報紙上成篇累牘地，登載着工人們日新月異的「發明」，

「積極性」與「創造性」，是用以形容「工人階級」的特定形容詞，至於工程師，則僅是不足道的「小資產階級」。在「新社會」中，有那一個工程師不必須向工人學習？有那一個工程師能比得上工人的「創造」和「發明」？又有那一個工程師的計劃不經過工人的修正？「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就是用來强調工人的「優越本質」的。在被人所謳歌的「臭皮匠時代」，工程師的學識和經驗，已變成了招致批評的累贅。工程師也正如普通知識份子一樣，那丟不掉洗不清的「包袱」，將會使他們遺憾終身。據說這還只是一個開端，若干若干年以後，工程師將進一步變爲被消滅的對象，因爲無數無數的工人，都已兼做了工程師。

我們在討論當中，我曾就電影中工程師的被歧視以及「同志」們對工程師的偏見，而爲工程師說過幾句話：

「無論如何，社會是需要適當的分工，工程師在分工中的作用還是不可忽視的。」

我和靄的態度與婉轉的發言，已經是盡我所能了，不料却引起了「同志」們激烈的批評，我被指爲沒有站穩「工人階級立場」並爲「治人的勞心者」辯護，接着又集中批評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觀念」。

老「同志」都堅持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不可分性，並認爲在將來的社會中，工人是工程師，工程師也就是工人。一個做文藝科科長的老「同志」憤恨地說：

「勞心勞力在蘇聯早就不是問題了，這只是資產階級爲自己的統治而製造的理論！」

對于這些「俄羅斯狂」的一些人，我原無意繼續辯下去。但在討論進行當中，不發言將被爲是「不敢

暴露思想」，對已提出的問題不繼續發言或是承認錯誤，那將更有蒙受「思想沒搞通」之嫌。因此，我正想堅持我原有的意見，這時小組長即起來做總結了。總結中，他首先批評我的「思想問題」，又做了一些補充，他說：

「在將來的社會中，不但工人是工程師，工程師也就是工人，同時，一個清道夫也就是能唱能寫的藝術家，藝術家也一定可以做一個掏陰溝推垃圾車的清道夫。」

小組長總結以後，這個會就算有了結束，至於我呢，我也不得不信服，那個「清道夫就是藝術家」的社會遠景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鬥爭經驗」與「搞家底」

有些老幹部喜歡這樣問我：「你認爲老同志的優點究竟在那些地方？」問話的當時，雖不免多少含有一些驕傲的意味，可是，當許多新幹部在工作上都有顯著的成績時，老幹部確有些心虛了。這是他們自己都認爲不可解的事，一些被認爲過去一直沒有革過命的人，一到「革命隊伍」裡來，只不過很短的時間，不但工作比他們做得多而又做得好，就是對一般理論的認識上和運用上，也比他們高明得多，這叫他們對自己曾花費若干年混出來的所謂「革命鬪爭經驗」，不能不有所懷疑。不過，這種屬於自卑感的懷疑是不會長久的，因爲他們的「年資老」，還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年資老就說明了本質的「優越」，多少年資也就代表着多少「功勛」，年資少的就必須向年資多的學習，這都是「組織」所明文規定的。

與我同宿舍的一個老幹部，尤其是喜歡問起這件事，最初頗使我難以回答，因爲一年來的時間，我實在沒有發覺到老幹部的「優越本質」在那裏，相反地，我原有的一份好感，却一天一天地在減低。有時那個老幹部非常坦白又非常悲哀地說：「我看老同志都是一些老油子，也沒有什麼優點？」不過爲了應付這應接不暇的問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答案：對「革命」來說，老幹部從來沒有脫離的想法，他們遇有重大不如意的事情，總還是想辦法來爭取「組織」的解決，解決不了的，儘管「鬧情緒」和消極抵抗，却很少有「脫離革命」的念頭；新幹部就不然，明知不可能隨便脫離，却動則就有「老子不幹了」的打算。其實，老幹部的所以如此，只有一個客觀的因素，多少年來的隔絕，他們不但失去了家庭，更斷絕了所有的戚友，假如一旦不幹「革命」，他們實在無法在所謂「舊社會」裏生存下去。正如有些首長對「鬧情緒」

而不滿意「組織」的老幹部的嘲笑：「不幹好了，不幹？你們只有去討飯！」

我將這個答案說給那個老幹部聽時，他曾表示十分滿意，並以此來稱讚我的「進步」。在他看來，我的答案正可以說明老幹部的「立場堅定」，當然他從沒有分析過「立場堅定」的造因是什麼。

老幹部對任何問題往往只是瞭解一半，在服從「組織」上，他們只瞭解那屬於好的一半，在未經「組織」同意或爲「組織」所反對的事情上，他們只願意知道那屬於壞的一半。全面瞭解問題，被認爲將使那些出身工農的幹部思想流於混亂，更使那些頭腦單純的戰士難於培養「階級仇恨」，並徒然渙散他們的鬪志而已。

這種一半的教育，使許多老幹部近於頑固。「組織」說好，他們跟着說好，「組織」說壞，他們也跟着說壞。可是，善變的「組織」，一旦把過去認爲好的一變而爲壞的時，那些頑固而被批評爲「經驗主義」的老幹部，却不易隨着立即改變。關於學習「城市知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過去在打游擊的時候，「搞家底」和「搞生產」，曾被「組織」上大事表揚過。游擊生活常常是居無定所，食無定糧，情況緊急時，說不定前後上下的關係都會被切斷，既無救兵，又無供給，確會使失去聯絡的部隊遭遇過很大的困難。所以當時統治者曾明令鼓勵「搞家底」，所謂「搞家底」，就是佔領一個地方以後，盡量「爭取繳獲」，金銀珠寶外幣物資統統要，因爲隨時要準備放棄那個已佔領的地方，這些「繳獲」被珍視爲「革命家底」，失去聯絡的部隊可以憑藉「家底」維持一個時期。所謂「搞生產」，是在佔領久一點的地方，盡量「爭取收入」，種地養猪打魚都可以，當時最受鼓勵的還是跑單幫，或是利用老百姓跑單幫，想盡辦法把「白區」（政府區）的貨弄到「紅區」去，好豐富一下「家底」。

這本是適應客觀環境需要的極平常的事件，只是統治者當時一味地表揚和鼓勵，從未予以分析和解釋，不幸却種下了若干年後意想不到的惡果。

在控制中國大陸以後，老幹部「搞家底」和「搞生產」的興趣不但沒有減低，反而更濃厚起來。被指派接管城市的各單位，都抱有「豐富家底」的心理，進得城來，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東繳西獲」。有時因爲「繳獲」太少，單位太多，又不得不付諸協商。一次一次地「繳獲」，各單位的「家底」確是豐富得驚人，我曾聽說過某一個團部的「家底」就在黃金千兩以上，團部的「家底」沒有向上繳的義務，團部搞團部的「家底」，師部搞師部的，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習以爲常了。「解放軍」的三大紀律之一就是：「一切繳獲都歸公」，不過，只要不被一兩個「同志」吞沒，師部是公，團部又何嘗不是公。

「家底」在城市裏有了新作用，「同志」們的鋼筆、手錶以及菜裏的魚肉都來自「家底」，當然「家底」的分配，也必須按「革命功勛」而比照「生活待遇」的。

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統治者曾以中央的命令禁止搞「家底」，並限令各單位必須將「家底」存入「人民銀行」，可是沒有人那麼愚蠢，肯把黃澄澄的東西去換取支取不便的幾張紙，就是遵守法令的單位，也都先替各級幹部買了大批東西，再考慮去存入幾分之幾，因爲這些「家底」，一向是無帳可憑而由忠實黨員個人保管的。

我所在的機關「家底」不多，聽說只有四百兩黃金左右，主管「家底」的人，曾奉命到香港去買過大批的鋼筆和手錶，回來以後，部長們分得兩套五一型鋼筆和一隻奧米茄手錶，科長除了鋼筆之外，只能分得一隻賽馬牌或是十七鑽的游泳錶，下面重要一點的幹部分得一支紅藍隨意的原子筆，再下面當然就沒有

了。不過在「改善生活」（即俗稱打牙祭）的時候，全體「同志」是都有機會沾光的。

最使人擔心的，「家底」將好景不常，誰都會意識到「家底」終有一天會用完的，到那時，用慣「家底」的人，將會感到怎樣的不便，於是，將本求利繼續補充「家底」的辦法來了，那就是「搞生產」。「搞生產」如我前面所記述，絕不意味着改變物質形態的製造行爲。運送「文件」的回頭卡車帶帶客，拉拉商貨都是「搞生產」，廣州廉價的香蕉，江西的橘子，帶到漢口來賣又何嘗不是「搞生產」，一個到香港「搞生產」的老幹部，曾無意中向我介紹了香港的情形，這對我以後的出走曾有過莫大的幫助，我雖然沒有分到什麼「生產」，但我必須感謝那個「搞生產」的人。

我曾在年終的檢討會上，批評過這種「搞家底」和「搞生產」的錯誤觀念，並直接批評過那主持的人可是，批評對於習慣接受批評的老幹部，並不能起什麼作用。連史大林都在感慨地「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庸俗化」（史氏論文），微末如我更可想而知，何況又是對一件過去「組織」曾一再表揚和鼓勵的事呢？

兩件記憶猶新的事

我週圍的老幹部，從時間來分有這樣三類：一類是爲數不多而歷史最久的「長征」幹部，籍貫多屬於是湘鄂贛川等省份，以幹部來說，他們都是二十個人之中僥倖生存的一個（戰士死亡數字當不只此），所以當年的中小學生，如今均已貴爲部長了，就是那時目不識丁的農民，只要拖過這風險的十七年（所謂長征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也都是團級以上的幹部了，不過，他們所擔負的工作可能很低微，有的只是養養馬管管伙食，或是當個跑跑街買買零碎東西的庶務，我們組織部部長的男褓姆，就是吃中灶的「長征」農民之一。第二類是延安時代即抗日戰爭時代的老幹部，多半是西北和華北的，其中也有些是十年前從平津京滬等地跑過去的知識份子，這一類幹部人數比較多，份子也比較雜，一般都是中層機構的負責者。我前面所經常提到的老幹部多指這兩類。

「四野」範圍內，人數最多的中下級幹部，幾乎全是東北幾省的青年。這些人都是未卒業就被「動員」參軍的中學生，也是統治者從日本人手中直接接管過來的年青的一群。十四個苦難的年月剛剛盼出了頭，跟踵而來的就是恐怖的極權統治，他們對祖國除了曾寄予最殷切的盼望外，竟可憐到一無所知。關於生活方式，過去的與目前的，自由的與極權的，他們都無從比較。在「革命隊伍」中，他們最容易也只有接受統治者的宣傳。他們都已是兩三年到五六年的幹部，大部份都入了黨，不過，時間畢竟是不容情的考驗，他們終於也體驗到統治者僞善與罪惡的雙重面貌，有兩件記憶猶新的事，種下了她們對統治者無可原恕的隱恨。我始終相信，這隱恨總有一天，將會化爲不可抑止的力量。

我在前面曾偶而提到一些關於東北「土改」的事情，這些來自東北的中下級幹部，就是東北「土改」的身受者，也就他們曾親眼看見自己的父母以「封建尊主」的罪名被打死，被清算，被逼上吊投井，被剝皮游街，被趕出家園而沿門乞討。當然，這在統治者看來是「罪有應得」的一群，那我們不妨再聽聽他們之中屬於中農甚至貧農出身的人，關於「土改」的意見。

我和他們接觸的時候，偶而問起「土改」的事情，他們眞是會談虎色變，雖然有的認爲自己是黨員不便講，有的怕冒犯「組織」不敢講。但我們處久了，有時他們會通過一些說話的技巧來告訴我一些，他們每個人都可以講出不止一個的「土改」的悲劇，在悲劇的開端一定都感慨地說：「那實在是太「左」了，東北老百姓眞是什麼罪都受到了！」結束的時候，往往又很怕事地說：「這可不單是我這樣說，連毛主席都說是過左了！」

有些東北幹部提起「土改」，顯出忿恨而無可如何的樣子：「東北人最倒霉，不用提了，反正他媽的便宜了南方人！」（毛澤東檢討「過左」現象以後，曾明令南方幾省緩行「土改」，事實上證明，這只是統治者穩定人心的一種手法，南方人又怎能逃脫這同一命運？緩行明令的墨瀋未乾，「中南區」的「土改」已雷厲風行地搞起來了！）

一個幹部告訴我：他的父親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當他被「鬪爭」的時候，曾堅持過自己有限的一點土地，純屬自己勞動的累積，絕不是什麼剝削之類，結果被農會的幹部用槍托在他的胸口上，重重地打了幾下，當場便吐血死了。被鬪以後的幾天，做兒子的忽然又得農會的通知，說他們原本算中農，因爲幹部的疎忽，一時鬪錯了，農會公開承認錯誤，並說除了已「清算」的衣服和農具一時無法收回外，原有的

八畝田可以退還給他們。這時，他可憐的母親，因爲悲慟於丈夫的死，也已經投井自殺了。當他想去領回土地的時候，農會又發覺了他父母死亡的事情，按照「計口授地」的原則，扣除了他們原有土地的三分之二，最終他領回來兩畝多地。不多久，農會的幹部便來「動員」他參軍，他曾以父母慘死的理由來拒絕參軍，可是那個「動員」的幹部說：這只是個別的錯誤，現在農會已進行了檢討，以後可以保證不再發生。同時並理直氣壯地說：「人民政府最開明的就是能夠公開地承認錯誤，不像過去反動政府那樣，錯就錯到底，誰肯向人民低頭認錯！」

同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是我們一起被派到部隊做短期工作的晚上，我們沿着一條小河，在暗淡的星光下一邊走一邊談，他開頭曾說：「請原諒我，我這個人眞是改不掉，總還是有這麼多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接着他告了我這樣一個悲慘的故事。最後只聽見他說：「不過，那個打人的幹部，畢竟是受到了組織的懲罰」。隔了一回他又說：「東北各地的土改都是一樣，因爲幹部沒有經驗，實在是太左了！」

我看不清他說話時的神情，也無法知道他是用怎樣的心情來追述這件事，不過，他說完這段往事，曾沉默了許久，我再問他任何的話，他都彷彿像沒有聽到。當時我就想，縱然他是盡量抑制着自已的感情，但是內心的創傷還是無法掩飾的。

從這些東北幹部自已關於「土改過左」的「有立場的自白」，已足夠說明「土改政策」的政績是些什麼。一個政策的實施，假如身受者的評論是最權威的話，那麼我曾一再提起關於「土改」的事，實在是多餘的言詞了。

另一件使東北幹部念念不忘的事，可以說是「蕭軍事件」；他們之所以念念不忘，也可以說是「蕭軍

事件的影響」。

蕭軍這個名字，我們該是熟悉的，「九一八」以後，曾因魯迅的賞識以「八月的鄉村」一書聞名的東北青年作家，抗日戰爭的時候，他曾受着抗日熱情的驅使跑去延安，到延安以後，便再也沒有機會從事寫作了，他由「魯迅藝術學院」出來，又被送進了「馬列學院」。以後在「服從組織」的强制下，被派在軍中工作。一直到東北「解放」後，「組織」上爲了要借重這位過去聞名一時的作家，在東北青年心目中的影響，才派他到哈爾濱去主持一張小報（名爲文化報，隔日出版的雙日刊）。不料想，「組織」的如意算盤錯打一着，這位作家掌握了出版武器以後，便不大再接受「組織」的指示了，被抑壓多年的情緒，使他的言論漸趨公正。他首先指責做接管工作幹部的驕矜，視警衛員如軍閥時代的馬弁。繼而論述國共糾紛宜和而不宜戰，並指出久經戰禍的人民確應予以休養生息的機會。最後，作家曾以「論各色帝國主義」爲題的文章，指斥俄羅斯人在東北的暴行。作家的公正言論博得東北青年的擁護，爭相購閱文化報，可是在「公正就是犯罪」的時代，我們的作家是絕不可能幸免的。不過，當時統治者曾因兩個不得已的苦衷，使這張銷行日廣的文化報多延續了兩個月的生命。蕭軍本人是老幹部，不但在東北聞名，就在所有老幹部之中也有相當的威信，假如貿然將蕭軍處置，對一般老幹部和正想大事利用的東北知識青年，無疑地要發生無可挽救的影響。再者，當時正是統治者痛罵國民黨沒有言論自由的時候，假如自己也幹起封閉報館的勾當，尤其是自己老幹部所主持的報館，對夢寐企圖爭取的「白區」知識份子來說，更可能發生一些惡劣的影響。當時的最高統治機構「東北局」，不敢立即採取斷然處置。但是舉棋不定，不等於沒有辦法，統治者開始加派宋之的在哈爾濱另辦一張生活報，專任駁斥蕭軍的任務；另外再派人直接和間接威脅蕭軍，希望使蕭軍登

報悔過並公開自我批判。一番用心又告失敗，宋之的的生活報無人問津，連統治者的幹部，也爭相閱讀文化報。文化報館門口的報牌上，圍滿「解放軍同志」的讀者，同時這位有胆有識而個性强硬的青年作家，始終沒有屈服於任何威脅，報紙照常出版。統治者在無計可施的情形下，再也顧不了甚麼影響，終於將文化報封閉收回，而那位開拓「言論自由」，也就是「言論自由」殉葬者的作家，從此就沒有了消息。只是當「東北局」在「東北日報」上公開「批判蕭軍思想」的時候，曾提到「蕭軍同志已坦白悔過並自願去工廠學習，業經組織送往某地工廠參加學習」的消息。

蕭軍的言論確曾影響了成千成萬的東北青年，就以我所接觸的東北幹部來說，他們常常喜歡這樣說：「那時我們自己的覺悟程度還不夠，沒有人不喜歡看文化報的！」假如我們原諒說話人的環境，我們絕不該計較這句話的上半句，代表說話人的眞正意志的該是那另外的一半，而這另一半正說明了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問題。我深信，假如一旦再有一張文化報出現在中國大陸，所謂「覺悟程度」，將再度變爲莫須有的東西，而那張報紙，無疑地，將是擁有不止四億五千萬發行額的最大銷行的報紙了。」

我所知道的林彪

儘管「英雄造時勢」的思想，被批判爲極端的「個人英雄主義」，但是林彪其人，在「四野」部隊中，還是把他當做了「創造時勢的英雄」一樣地來崇拜，「組織」上也正不斷地在幹部與戰士們心中，從事於爲林彪塑像的工作，從兵團的政治委員到最下層的炊事員飼養員（馬伕），誰都會唱幾首以林彪名字編成的軍歌，最流行的一首是這樣開始的：

「向前，向前，向前！

我們是林彪的戰士，我們是殺敵的好漢，……」。

我曾聽說過，在兩軍陣前，準備衝鋒的一剎那，連隊指導員都會這樣喊：「同志們，我們要做一個林彪的好戰士！」然後才衝鋒陷陣，我們姑且不談這些話在士兵心中的反應怎麼樣，但唯物論者竟在進行「偶像教育」，確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我在見到林彪以前，印象中總以爲至少是一個彪形大漢之類的人物，東北農村裏，小孩子在夜間哭叫的時候，做母親的常常這樣哄勸孩子：「老虎來了，林彪來了！」林彪在老百姓的心中，像一個傳奇中不可思議的人物。

終於有機會見到了這位傳奇人物，我第一次瞻仰到林彪是在北平。雖然他的白面濃眉，寬闊的肩膀和中等身材，糾正了我印象中的形象，但他那種强制性的講話，立即給人以極不愉快與恐怖的感覺，那是在我們被「動員」參軍的會上。

以後我調作機關工作，雖然我是一個不足重視的人，但因爲工作關係，却經常有機會見到林彪，他一如許多老幹部一樣，對京戲有特殊的嗜好。當他每次到劇院看戲的時候，除了他自己帶來的眞槍實彈的四個警衛員以外，「四野警衛團」要加派兩班以上的兵來先行戒備。我們只要接到他準備看戲的通知，在發戲票的工作上，就必須特別愼重，首先要檢最好的票子爲他留出一排座位（普通是八個座位），另外在前三排後三排的四個角上空出四個位子，留給負有保護責任的警衛員的。而那全場的票子，我們只能愼重地發到駐軍的團級幹部，連地方機關負責幹部的贈票都一律停止，票子假如有餘，那則是寧缺勿濫。

他經常是同他的「愛人」一起來，「愛人」是一位歷史頗久的老幹部，從外表上看，她的年紀要大過林彪很多，兩個人都表現得極其嚴肅的樣子（我從未見過他的笑容）。

他喜歡看一些與他嚴肅表情不相稱的輕鬆節目，比如「拾玉鐲」，「玉堂春」一類。關於看戲，他的意見很多。常常指示我們的部長，有時是關於座位問題，有時是節目問題。最初我把「三國誌」一類的戲排做壓軸戲，他對我們部長說：「同志們太沉悶了，晚會的節目一定要輕鬆一些！」他所謂輕鬆，就是指有說有唱的旦角戲。

記得他在一次特別晚會上指定了四個旦角的「五花洞」。四個旦角算是當時的四大名旦，一個是曾與周信芳配戲而露頭角的雲燕銘，一個是甫自上海趕來漢口的曹慧麟，一個是以色相叫座的楊菊嶺，還有一個就是我前文所提被當做「戰俘」的姜畹華。

他不但對我們的京戲工作常常有意見，並曾爲接收戲班子，同「十二兵團」的重要幹部，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兵團曾接收兩個國軍的戲班子，林彪當時在長沙，兵團方面認爲兩個班子各有所長，魚與熊

掌，請「林總」任擇一個，並堅持留下一個給兵團。不料這件事情却觸怒了魚與熊掌兼愛的人，結果，林彪是以命令的方式，把兩個戲班子一齊調到漢口來，而留給兵團的，只是一些不敢言的不愉快而已。

他對於京戲的偏愛，雖然不能肯定地說是爲了女人，但他至少對紅裝艷抹的旦角，確有極大的興趣。除此，我只有在公開的集會中才能夠看到他。一次是「動員」南下工作團最後一批的幹部下鄉和參軍，南工團的那些幹部是因武漢幹部派系之爭而被迫阻於德州的。他們多是平津的知識份子，到武漢以後，才感到半年來捉摸不定的希望澈底破滅。林彪在這次所謂「動員」會上的講話，與以前絕無分別，只是他站在炙熱的陽光下，把演講拖長了五個小時。據說這樣可以使被「動員」的人感動而「自願」參軍。

林彪其人，不僅是被視爲傳奇人物，更是一個戲劇性的人物。他在「動員」兩個軍去河南「剿匪」時，曾不斷地流起眼淚來，這兩個軍是「四野」戰鬪力很强的部隊。部隊的戰士多來自東北，當他們從廣西回到漢口的時候，每個戰士都以爲是復員回家了。可是到漢口以後，才知道要在「華中生根」，並到那些所謂不好搞的地方去「剿匪」，部隊情緒普遍低落，幹部與戰士的「怪話」百出。「組織」除了注重內部整肅外，並請「林總」來「動員」。所謂「動員」，就是替必須服從的命令做一些多餘的解釋，而藉以打通不服從「組織」的思想，也就是意味着以高級首長對不服從者施予鎭壓。林彪在講到東北打仗的苦況時，曾停頓了一會兒，並流出眼淚來，那些天眞的戰士看到「林總」的眼淚，又一次地被欺矇過去。

林彪在許多集會中，不但裝成嚴肅的「英雄模樣」，在唯我獨尊的環境中，確使他已成爲一個有强烈領袖慾的「個人英雄主義者」，他非常喜歡在演講中，不斷地聽到這樣的口號：

「敬祝林司令員健康！」「響應林司令員號召！」

他每講幾句，必有重要幹部起立喊口號，對於打斷他的講話不但不以爲忤，他並有一份似笑非笑的驕矜的表情。

他的「個人英雄主義」，使統治者也感到無可如何。最初起於牽就，由牽就而順從，由順從一變而爲慫恿。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曾說：「林彪雖是一個小弟弟，但他能統帥百萬大軍，這是別人所不能勝任的所以年長如程頌雲（程潛）者，也只能夠做做他的副手！」這樣，這位傳奇人物也就更加自鳴得意了，在實際問題上，據說統治者中央，也只好讓這個小弟弟幾分。

關於林彪其人，我知道的實在很少，因爲在極權統治區內以首長作爲談話資料的，將會遭到嚴重的懲處。我這裏，絕無任何誇大的意味地，寫一點印象記之類，或有助於瞭解這個中共重要統帥的個性吧。

「信教自由」三部曲

我們機關裏，來了兩個新參加工作的女「同志」。一年多的時間把我也顯得老了一些，對許多更新的「同志」，我常有一份同情與沉重的感覺。新的變老了，更新的又被帶進了這個大門，此中滋味只有身受者才會體驗得到，當你體驗到的時候，已經是太遲太遲了，因爲那個大門只是對進來的人開放的。

她們是當地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因爲我們機關裏，需要兩個能在刊物上畫花邊插圖以及寫美術字的幹部，才指定那個學校的軍事代表代爲「動員」而來的。兩個人的工作頗能勝任愉快，絕沒有一點所謂小姐脾氣和藝術家的浪漫作風，不過，新的環境使她們都有點不敢也不好意思多講話，只是任勞任怨地埋頭工作。在「舊社會」裏，這樣兩個人也許不難被尊稱爲模範工作者，但在「思想」第一的社會裏，倒頗有一些「問題人物」之嫌，當然她們也免不掉寫自傳和被「研究」的階段，而那被認爲不敢暴露思想的沉默態度將是首先要被糾正的。

不出幾天，她們的「問題」果然來了，在支部工作的女「同志」，像發現一個不可解釋的秘密地對我說：

「想不到這樣兩個大知識份子，竟是一對落後的教徒！」

所謂教徒，係指信奉天主或基督教的人而言，這在我原是不足爲怪的，不過爲了想知道一點下文，我略表驚異地問她：

「眞的嗎？那將怎麼辦呢？」

「她們在自傳上都承認了，還會假嗎？無論如何，組織上要幫助她們進步的！」她說「幫助進步」的意思，是指「幫助」她們脫離宗教，並進步到反對宗教爲止的。

這是「組織工作者」已認爲毫無疑義的例行工作，絕不能以「人民大憲章」上的「信教自由」，來跟她進行任何辯論的。事實上，一如她對我的瞭解一樣，我確已懂得宗教思想與唯物論是根本矛盾而永遠不能統一的兩件事，由於宗教的存在意義被否定無遺，「信教自由」僅僅是以廣招徠的一種手段罷了。

兩個有宗教信仰的人，被當新奇古怪的對象來研究的，只有在「革命隊伍」裏才會發生。許多老幹部對信教的人都是諱莫如深的，我沒有辦法知道他們想像中的教徒是什麼樣子，不過，他們知道機關裏有了兩個女教徒以後，都興奮地奔走相告，那兩個新「同志」的一舉一動，立即變成了被注視的目標。

對於老幹部來說，兩個教徒是比兩個匪徒更值得卑視。沒有政治意義的匪徒，在未奪得政權的時代，一度曾被當做並肩作戰共同削弱「反動政權」的盟友。出現在改造後的歷史上，更是被當作「人民英雄」來頌揚的一些人。至於宗教，不幸從它誕生一直到今天，始終都被認爲只是代表着數不清的「罪惡」，因而教徒兩個字，怎能不讓那些久經薰陶的老幹部所卑視呢？至於那兩個曾懷着「信教自由」的信心而參加工作的學生，此刻才接觸到所謂「革命實際」，在欲罷不能的工作中，她們只有被迫去接受「組織」所給予的「幫助進步」。

「幫助進步」的辦法是具體而有計劃的，首先是「思想教育」，「組織」開始對兩個教徒說：

「人是由猿猴變的，亞當、夏娃的思想包袱必須拋棄！」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雅片！」

「宗教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信仰任何宗教只代表着一個意義，那就是做統治階級的幫兇！」

「不是消極地脫離宗教，應該是積極地摧毀所有麻醉人民的宗教！」

第二步是由她們自己根據「組織」所提供的原則，進行「自我反省」：

「爲什麼要信奉宗教？」

「什麼人介紹入教，目的是什麼？」

「信教期間，有沒有領受過美國或是教會的津貼？」

「試作對宗教的批判？」

「對宗教是怎樣重新認識的？」

「思想怎樣開始轉變的？經過了怎樣的過程？」

第三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步驟，是「羣衆督促」，這一步驟的具體時間是要看教徒被「麻醉程度」與「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此處所謂「羣衆」，是指有督促義務的黨員和「積極份子」。在督促的進行當中，督促人必須時時提醒，信教就是「落後」，不信教才是「進步」，「落後」與「進步」，永遠是問題的兩方面，打擊「落後」才能刺激「進步」，這是天經地義的原則。

那兩個不幸而信教的學生，開始有了「信教自由」的煩惱，在小組會上，辦公室裡，甚至於吃飯休息的時候，她們週圍的「同志」都會向她們請教：

「你們這樣有知識的人，爲什麼要信教？」

「過去學藝術的人，是不是都規定要信教？」

「是什麼人强迫你們加入宗教的？」

「對組織幫助你們的落後有什麼感想？」

「……？」

這兩個學藝術的「同志」，我沒有太多的接觸，不過，聽說她們過去在學校裡是屬於「進步學生」和「民主鬪士」之類的，可是，當時統治者對「進步」的要求不同，只要是反抗當局措施而能夠分化「反動統治」的，都被稱做「進步」。那時候，還隱縮在地下的統治者，對她們的信教從未計較過，並且她們曾不斷地獲得「信教自由」的保證。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當年最「進步」的一變而爲最「落後」的，假如她們能夠平心靜氣地想，從「發展觀點」來看問題，這實在不是甚麼意料之外的事。不料她們脆弱的神經，却受不了這「進步」的刺激，她們哭了，哭了好幾次。不過，「哭」常常被當是「思想轉變」的開始，最終果然聽說她們在宗教問題上，「改過自新」而澈底「覺悟」了。

下一代的「覺悟」，往往爲那「不覺悟」的上一代所不諒解。收到孩子們「進步」家信的兩個家長，竟跑來想求見我們的首長，兩個家長指責我們機關迫使他們的孩子叛教，並說參加工作的當時，曾一再地獲得學校裡軍事代表關於「信教自由」的保障，因爲他們都是有歷史淵源的宗教家庭。這種被認爲「無理取鬧」的交涉，當然不會有甚麼結果的。最後由兩個無表情的衛兵，拒絕了他們求見首長和責難孩子的請求。

統治者從不承認這種「幫助進步」的行爲，含有絲毫的强制性。「信教自由」是一貫的主張，不但見諸報端並且載諸「憲章」。不過，對於「自願進步」的人，又有什麼辦法呢？難道對一個人的「進步」，還要加以干涉或是阻撓麼？

我同一個朋友談完這兩個教徒的事情，曾肯定地說：「極權統治者所加給於人類的，無形的恐怖甚於有形的恐怖；精神的虐待甚於物質的虐待。」我的話該不是沒有根據的吧！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協理員」與我

我們三個做秘書工作的，與支部四個女同志的關係最爲接近，我們都是隨部長的遷移而遷移的，辦公室也隔得很近，在生活方面因爲人數少又被編爲一個小組，工作之餘，大家都混得很熟，屬於支部無關重要的或是單純對外的「組織介紹信」，也請我來執筆，她們想看戲看電影的時候，我也不能不破格地通融一下。有時她們告訴我一些其他幹部所不知道的事情，當然也叮囑我不能講出去的，這些事情多半是屬於幹部之間的糾紛，處理或解決糾紛是支部的日常工作之一，在她們也許認爲習以爲常的事情，却從未考慮過所給予我的影響如何？她們更沒有想到，因此竟培養了我對「革命」日益不滿的情緒。

其中一個女同志曾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爲了遷就某一個重要幹部不滿意支部所代爲物色的「愛人」，特別提前批准了那個被物色的女人爲正式黨員，入黨兩個字就表示着十足的「進步」意義，用准予入黨的方式來說明那個女人的「本質優越」和驚人的「進步」，而對於那個重要幹部來說，他縱然不滿意，但對於一個黨員女「同志」則不可能隨便遺棄的。

我當時聽過也就算了，不料在年終總結性的檢討會上，告訴我這件事的女同志，受到了極其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的批評。「組織」不准講的話，她竟對一個沒有「組織關係」的人講了，當然要被認爲是目無組織，不准講是「組織」的命令，不遵守命令的當然是目無紀律。「無組織無紀律」的嚴重事件，足以構成死罪的，尤其是一個「組織工作者」。不過，經過幾次的調查，她所洩露的一些事情還算是無關大體，「組織」爲了顧念她的年青無知，僅給予她調離支部的處分。

在那次檢討會上，照例舉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老一套，作爲支部負責人的「協理員」，爲了表示大度的作風，要求我對她本人做一次毫無顧忌的批評。這對我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難題，經過了不短的時間我對她那應屬於被消滅而尙未消滅的個性，已有了深刻的瞭解，她是一個能言善辯而從不肯承認錯的人假如「不虛心」三個字，還適宜於批評老幹部的話，那她將是一個突出的典型，以往我們在一起開過太多的會，我已有了足夠的經驗。這次她却較爲嚴肅地要聽取我的批評，我若不說是不可能的，我想了一下以後非常含糊地兜了一個大圈子而向她作一種試探性的批評。我首先又重複一遍對老幹部「優越本質」的唯一的答案，接着我以不指出任何具體對象的口吻，談了兩件無關重要的事，假如她肯虛心受教的話，她至少應該明白我的用心。我說：「一年多的時間，在老同志身上我僅發現了有一般性的兩點缺點：第一點，用派系來形容或許有些過份，不過，「熟人好辦事」的情形，表現在老同志的身上確實嚴重一些……」。

果如我所料，還沒有等我說完，她就開始反駁，她的反駁，只是着重說我的觀察不正確，她自己並沒有進行「反省」也沒有叫我指出事實。其實，面對着這樣一個有生殺予奪之權的權威幹部，我豈敢無的放矢。我繼續說第二點：

「正當新同志拋棄了家庭，拋棄了原有的享受，從舒適走向艱苦的尖端時，老同志正由艱苦的尖端開始走向舒適，日益嚴重地在計較享受，縱然還不能構成什麼嚴重的腐化現象，也是應該及早提防的。」

這時她知道我確是在批評她了，她立即有些惱羞成怒的樣子，叫我列舉事實。我是一個怕人家笑臉却不大怕人家發怒的人，我當時雖毫無準備，但列舉事實則俯拾即是，我立即收斂了我原有的炯煤怕事的態度，鼓起勇氣說了一大堆，從她去最華貴的理髮店洗頭，擦美國旁氏雪花膏，用任何幹部不得使用的電爐

燒洗臉水，一直說到她房間的華麗。

這裏我介紹一下我們的「協理員」之家，她一如許多老幹部一樣，不習慣於在辦公室辦公，不過，她掌握了房屋分配的特權，這問題就有了兩全的辦法，她選擇了光線最好的三間接連的寬大房間，裏面兩間做臥室，外面一間做爲支部的辦公室，發號施令請示報告只在一牆之隔，當然方便多了。房間的華麗只是我的印象，但是，那些華貴的陳設，絕不是她有限的津貼所能負擔的，只不過在我們機關所接管的傢私中她有權選擇了最上乘的一套而已。除了偶然爲了工作的關係，我很少走進她的臥室，因爲我畢竟是一個帶有授受不親「封建意識」的人。她有一個由褓姆接送在「四野」附設幼稚園讀書的小孩，她有一個模樣不壞不時來歸宿的丈夫，在我們機關中她與幾個部長一樣，是能夠享受家庭生活的僅有的幾個人。

她已年逾三十了，不過，在她的可能範圍之內，她是非常重視修飾和計較生活舒適的一個人。在「革命隊伍」中，一般的婚姻情形，在年齡上，總是男大於女的（往往要大上一倍）；在官階上，男高於女的（女的多數停滯於排級幹部，男的至少是團級以上）；在男女的影響上，多是妻以夫貴的；按照慣例，逢星期六女的到男的住所去歸宿，每星期僅有這麼一次。但是，我們這位「協理員」同志，却是全部例外的一個一個。

「協理員」是支部的實際負責者，也就是代表「組織」的人，所以她的權威一如支部一樣，是無限大的。除了經常的工作，比如，管組織，管調查，管照顧，管獎懲，管學習，以及主管全部的人事工作，另外還兼做黨部的副書記（正書記普通是政委擔任），「鬪爭大會」的主持人，婚姻的介紹者，老幹部的調人，新幹部的軍法官等，她可以隨時出席任何重要與不重要的會議，她可以隨時找任何大小幹部來「瞭解

思想情況」（即個別談話）。如此重要的人，難怪她要生活得講究一些。

那次檢討會以前，她對於我始終保有一個較好的印象，我的工作成績學習成績以及遵守紀律的情形，都還使她滿意。當然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由於工作關係，我幾幾乎變成了一個「內幕人物」，她和其他幾個老幹部的生活習慣和作風，部長們的日常事情，我知道得最清楚，就是她所企圖掩飾的許多事情，我也總可以猜到幾分。最後的一個時期，她索性改變了防範的態度，把我也算做了半個「一家人」。

但是，經過了那次的直言冒犯，我們的「協理員」忽然轉變了對我的態度，也立即否定了我這「半個一家人」。整個的新年階段中，她不但顯得不愉快的樣子，並常常無端地檢查我的工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統治者用以標榜「民主」與「自由」的一句話，可是當我「言尚未盡」的時候，却遭到了如此權威幹部的敵視，權威幹部是代表「組織」的，「組織」更是代表着無上的權威，與無上權威爲敵，我實在無法逆料我的未來。這時，我已有隨時「脫離革命」的決心了。

瘋人的啓示

一個被留在「新華社」工作的燕大女同學，我說同學，事實上我們已都是一年多的幹部了，她悄悄地來告訴我：

「楊楊回來了，她希望你去看看她。」

楊楊也是我們從北平一齊來的燕大社會系的女同學，最初我們被編在一個小組，這兩個女同學因爲不是「組織」以內的人，同時都是四年級的高班生，而年歲也都在二十五歲左右，我們在一個小組時，大家都談得攏，我們談話當然是要避開「積極份子」，而盡量使用被認爲是「小資產階級」的語言。楊楊是一個非常達觀而風趣的人，她有過辦托兒所的經驗，也有一個創辦托兒所的理想。我們到漢口以後才被調分手，她走了以後，彼此沒有通過信息，不過，我知道她同一個被稱爲「大家閨秀」的女同志一齊派到當時駐紮江西的「十五兵團」去工作。這次忽然聽到她回來的消息，我當然有些興奮，心中還以爲她是從前方回總社來彙報工作的，但從那個送信人緊張而又機密的神情，我又感到詫異，立即問她：

「她回來做什麼？」

她更驚慌地做了一個叫我小聲談話的手勢，並在我的桌子上寫了幾個字：

「你去過就會知道！」

我也用筆告訴她：我當時沒有空，要在晚飯後才可以出去，囑她留下楊楊的地址給我。

事情更爲離奇了，她竟寫了一個極其偏僻的小客棧的地址，因爲就我所曉得的，從前方回來的同志，

不是住在自己的上級機關裏，便只能被指派住在「招待所」裏，而楊楊爲什麼要住在那樣一個私營的小店呢？

那時我正負責籌備舊年的駐軍娛樂工作，非常忙碌，當天晚飯後沒有空，直到夜裏九點鐘開完會才按着那個地址去看楊楊，一路上我心中始終是忐忑不安，像毫無線索地在猜一個謎。

那個來送信的女同學已先我而至了，我見到楊楊時使我吃了一驚，她竟丟棄了戎裝而穿着一件極不適體的舊旗袍，蓬亂的頭髮，紅腫了的眼睛與削瘦的面容，更使她失去了原有的達觀和風趣。見到我時她先還塞喧了幾句，可是，當我坐下開始同她談話的時候，她却失聲的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訴說，從她毫無倫次的談話中，我已意識到她確有些神經失常了。

此處，我只能像整理一堆零亂的資料一樣，記述一點她一年來的情形：

她是向老百姓買了一套舊衣服開小差出來的，身無分文從贛州搭乘北上的火車，她沿路上一邊哭一邊裝瘋，來應付火車上的檢票人員和不斷向她索取身份證和「路條」的「解放軍同志」，到漢口後便躲在一家五毛現洋一天的小客棧裡，她希望我們代籌一點錢能夠使她償付店錢和安全地回到北平去。

她同那個「大家閨秀」最初是派去九江，剛到的第一天，就聽見那個機關主管的「愛人」說：「我以爲是什麼了不起的知識份子，原來是一對落後的傢伙！」所謂落後，當然是指她們都沒有「組織關係」這一類的話，她們早就聽得習慣了，禮貌客氣涵養一類的東西，被認爲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護身符，工農幹部本來就是直心眼兒，成見也好，偏見也好，說出來就算是坦白，說出來就值得表揚，工農幹部的話假如還有人來挑剔，那麼，又有誰的話可以代表「人民」的語言呢？

她們原也沒有計較這一類的「人民語言」，不幸這權威的「人民語言」，却註定了她們此後的命運，她們一直處在被歧視的監視中。

半個月之內，很少有人同她們談過話，她們也很少同人家說什麼。可是，她們的任何舉動任何談話，却都在「組織」的縝密關懷中。比如：一個星期就洗一次頭髮，洗頭時用過一個鷄蛋清，洗衣服的次數太多，吃飯的時候挑穀子挑砂子，每次都用紙擦筷子擦飯碗，兩個人鬧「小圈子主義」，連上厠所都拉拉扯扯地非在一起不可，不主動地向「老同志」學習，不同「老同志」說話……這些都變成了黨員同志彙報的材料。

告訴我這些事情時，她曾說：「假如這些就算是我們的缺點，可是，我們連改正的機會都沒有了！」因爲她們經過半個月的「考核」，小組裏就宣佈了她們的「罪狀」，接着就被送到另一個訓練的機構去了（她們被派去再訓練的另一個原因，是爲了她們都是出身于地主家庭。）

那個訓練機構，是專門訓練再度被派來學習的「落後份子」。

訓練的重點是偏重「體力勞動」，所謂「體力勞動」就是做苦工，做苦工絕不是爲了體力的不健康，而是爲了「不健康」的思想，據說做苦工，就可以達成給人「換腦筋」的目的。因爲統治者不但相信「勞動創造人類」，更深信「勞動可以改造一個人」。這兩個女大學生在「勞動改造」中，整天做編草鞋和編床蓆的工作，幸好她們是兩個女人，否則也難免要像在「改造」中的男同志一樣，打牆蓋屋搬磚挑糞什麼都得幹。至於行動，星期天當然被剝奪了，就是想休息一會兒，立即會有人指責偷懶，偷懶的就是「落後」，她們原本是爲了「落後」才被送來「學習」的，假定「再落後」那就不知該怎樣發落了。

訴說的當時，她常自覺有詞不達意之處，不時地加重語氣地說：「你們住在城市的人，根本不能想像！」或是「你們在大關機裡的幹部，根本不能瞭解！」。她有時又感慨地說：「比起在北平和沿途行軍的時候，那的確應該算做天堂了！」

半年的「勞動改造」終於結束了，半年，她們畢竟忍受了這牢獄中的一百八十天。「勞動改造」確有相當成績，她們已有了非高粱米不飽的習慣，每頓要吃上三大碗，沒有菜也照樣可以吃那麼多。「改造」得最有成績的是他們的一雙手，手已是由白變黑，由細嫩變粗糙，最初她們做苦工的時候曾吃過很多的苦頭，手上一層層的水泡和血泡，有刺的山草和編蓆子的針，常常把她們的手刺破而流血，後來居然也會習慣了。告訴我的時候，她伸出兩只刻劃着粗手紋的手給我看，並告訴我，她的手再也不怕甚麼刺激了，拿針刺進去幾分也不會出血的。她一邊凝視着自己的手，一邊悲哀地說：「不過，手上的神經已發生痙攣，再拿起筆來，却不大行了！」

「勞動改造」只在她的飯量上和一雙手上，有了顯著的成績。但是，統治者爲她「換腦筋」的企圖，却澈底失敗了。在內心的深處，統治者已留給她不可磨滅的切齒之恨，雖然當時她不敢也不可能有甚麼反抗的表示，但這切齒之恨，終於促成了她「背叛革命」的勇氣和決心。

經過「勞動改造」之後，她又遭遇到婚姻上的威脅，在「改造」後不久，她即變爲被「組織」物色的對象，在贛州地方，代表「組織」的是一個農民出身的男幹部，比起我們機關裡那個能說善辯的女「協理員」，實在遜色得多。工農幹部說話是開門見山，毫無掩藏地告訴她，「組織」上已經替她物色了一個「老同志」，她當時曾以自己是「落後份子」表示拒絕，那個代表「組織」的幹部竟以入黨來誘惑，說假如

她答應了婚事，「組織」可立即批准她爲「後補黨員」，並說：「落後沒有什麼關係，你可以向那個老同志學習呵！」

工農幹部不但說話是直截了當，做起事來也痛快利落。正當她爲此事而煩惱時，機關中有了權威的傳說，說她已完全同意了「組織」的意見，婚事已成定局，只差「擇吉嫁娶」的一幕了。這時她才不顧一切地沿路裝瘋跑了出來，她雖然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裝瘋」，事實上，當時她的確給我有如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深刻印象。

我像記述一則大綱一樣，簡單地寫下了她一年來的故事，她本身的感覺和過度的刺激，絕不是我的文字所能描述的。試想是怎樣一種壓力使一個素有尊嚴的處女，變成了瘋瘋癲癲？試想是怎樣一種壓力，使一個軟弱的女知識份子會挺而走險？這樣想時，關於我殘缺的記述或許可能有所補足了。

她當時曾頗有諷刺意味地對我說：「你們當然不會跟我一樣地落後，不知你們對這樣一個落後份子，是否還會寄予些微的同情？」當時我沒有說話，我的感覺是沉重的，我豈僅是同情，我何嘗不想如她一樣的挺而走險呢？，可是，我竟慚愧不如，我還沒有足夠的勇氣，裝癡裝瘋在我是行不通的事，不過，我正期待着一個機緣，一個可以使我「背叛革命」的機緣。

歸途中我記起，統治者在「白毛女」一劇上演的時候，曾大事宣傳地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白毛女」是一個大型的歌劇，敘述一個因爲貧窮而裝鬼裝神來謀生的女人。楊楊所給予我的感覺，我倒彷彿見到一個比「白毛女」情節複雜的另一個「白毛女」，「人變鬼鬼變人」的事恕我一無所知，不過，在新社會裏，我却親眼見到了一個「人變瘋人」的活生生的例子。

被粉碎的理想及其他

我有過做一個自由報人的理想，多少年來，曾爲這理想花費了太多的心思。孩提時代，就曾冒味地給一當時的名記者寫過信，而向他述說我這個夢一般的理想，並請他告訴我怎樣來達成這個理想。意外地收到他鼓勵我的信，我當時曾以幼稚的見解同他討論過新聞自由一類的問題，年歲大了以後，自已有機會幹過報人，也曾出版過報紙，我的報紙曾擁有不少的讀者，也曾引起野心家的注意。我爲了自已的理想曾拋棄了溫暖的家庭，忍受了太多的誤解，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可是，在「新」社會裡，我必須爲「革命」，而捐棄我的理想。我不能再强調自已是一個怎麼樣有過理想和重視過精神生活的人，因爲，我已深深懂得「個人理想」，一如地主的田畝一樣，只代表着「犯罪」的一個意義。「新」社會裡，假如還有所謂理想的話，那就是人人必須一致的「無限度的各盡所能，有限度的各取所需」的理想，這也就是絕不可能再前進一步的。人類的遠景。關於這個奴役人類的社會遠景，我留待另有機會時再詳作論述。這裡，我只想說明所有在極權控制區的人民，任何個人的或集體的理想，已全爲這所謂的社會遠景而粉碎，澈底地粉碎了。

一年多的時間，我有如被嵌在一個不能稍作伸縮的機器裡邊，從理想到現實，從精神到物質，我絕不能主動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動地接受配給。我，正如許多知識份子一樣，一踏進「革命實際」，我們都被迫而失去有關個人的所有。在「革命實際」中，我看到許多企圖調換工作而遭拒絕的人，許多不滿意配婚而被懲處的人，許多企圖脫離「革命」而再被「集中學習」的人，許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經過一次「鬪爭

大會」便不明下落的人。正因爲我知道得太多，我與處理這些工作的支部與首長接觸的機會太多，縱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無可忍，但我從未在行動上，語言上流露一點久已蓄意求去的跡象。只是有一次在偶然的機會裡，我曾表示過再回北平學校裡工作的願望，就是這說說而已的願望，便遭到「協理員」兩次兩小時以上的「教育」，同時在小組開會時，每次都提到我這「對革命認識不夠而不安心工作」的思想。從那次以後，我頗有一點自知之明，對於不可能的事情我絕不再來自尋煩惱。

一個清華大學建築系三年級的學生，他在被「動員」之初，曾獲得「動員」幹部的保證，允許他只「革一年命」的要求，一年以後，將再回到學校去完成他那未完成的學業。他參加「革命」以後，一直被派在文工團裡做按裝電燈保管舊電線的事情。一年來，他在「服從的民主」之下，不敢提出違反「民主」的要求。但在「革命實際」中，他已充份體驗到「革命」是怎麼一回事，那形同電燈匠的工作，勢將迫使他忘却大學三年關於建築工程的所學。不過，雖然他的幻想早就澈底地破滅了，但他總算熬過了這度日如年的一年。一年，他視同償還一筆必孥償還的孽債一樣，總算滿期了。可是，革了命的人再也由不得自己，一年前的保證，只是「組織」上「動員」一個沒有「覺悟」的人的方式方法之一，「組織」上深信一個人一旦「進步」以後，再也不會提出脫離「革命」的要求，也不會再有人來計較空口無憑的謊言，事實上，計較也沒有關係，爲「革命」而說謊，「功在革命」難道還不夠冠冕正大嗎？

那個做了一年電燈匠的人，竟還是如此不「覺悟」，他堅持一年前被保證過的願望，首先在文工團團長那裡碰了釘子，又越級去找領導文工團的科長，科長那裡也碰了釘子，再越級來找部長。與我一起工作的一位秘書，就是代表部長處理這個「案子」的人，部長所以受理這個瑣屑的小事，原因是發覺到這個「案

子」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因爲「一年革命論」或「革一年命論」的學生們，領教了「革命實際」以後，都紛紛求去（當然在附屬而又附屬的單位做低微工作的人，還沒有機會見到前此求去者的下場），這位做秘書工作的老幹部先還是採取「說服教育」的方式：

「革命是不能講時間的，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一天，革命就必須貫澈一天！」

「可是，當初我曾獲得過保證。」

「你現在總該懂得這種保證是不通的了吧！」

「但是，我是學工程的，只差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完成了大學學業，否則不是功虧一簣麼？」

「完成不完成，只是一種極端錯誤的傳統觀念，你試想許多爲革命而犧牲的老同志，有些連念小學的機會都沒有，難道你能讀過三年大學，還不算幸運嗎？」

「可是，今天的環境不同？」

「今天的環境假如是比以前不同的話，那只是更艱苦更複雜。毛主席說，今天革命的成就，有如萬里長征才走完了第一步。革命的道路還遠着呢？」

「不過，只要一年的時間，我譬如請一個假，何況我回到學校去，以及二年後離開學校做工作，又何嘗不都是革命呢？」電燈匠近於哀求地說。

「既來革命，就必須服從組織決定，在那裡革命，在那裡才算是革命，只有組織有權來決定。」

「可是，我對革命太不重要了，任何人都可以兼替我的工作，請准許我只回去一年。」

「你對革命固屬無關重要，但革命對於一個落後的人，却是極關重要。請收拾起你的任何企圖脫離革

命的想法！」

「一年革命論者」雖然覺得在交涉上已近於絕望，但却仍然堅持他的要求。那個做秘書的老幹部，經過這次毫未見效的「說服教育」以後，立即改變了原有的態度，盛怒之餘，非常氣憤地說：

「像你這樣一個不覺悟的人，當初爲什麼來革命？」

「我確是不應該來革命的，現在已後悔不及了！」失望者的態度也轉爲强硬起來。

「悔的甚麼？」

「後悔我瞭解革命瞭解得太晚了！」

這時，那個老幹部更加咆哮地說：「你這簡直是侮蔑革命的反革命份子，這還得了？」他轉向坐在對面的我說：「一個人的思想，不經過研究是不肯暴露的，你看，這是多麼嚴重的思想問題！」

這個被認爲有「思想問題」的同學當天被送交支部，由支部辦了判決性的公事，解到保衛部去。被送到保衛部去以後的情形，我無法知道。但我只知道保衛部是訓練情報員和警衛員，包括軍事法廷，軍人監獄，有權處置死刑的一個機構。

當「一年革命論者」被送走以後，那個老幹部盛怒未息地對我說：「殺一儆百，這些人簡直是企圖搗亂革命陣營的！」

後來有一天，我在午夜三點鐘被派去車站，迎接北平來的剛剛受訓期滿而即將分發工作的一批新「同志」，那些人還都是一些身上發抖嘴上說不怕冷的傢伙，聽到他們天眞而幼稚的談話，我眞有說不出的感覺。他們正有着一如那被派做電燈匠的同學的心理，許多人竟在討論打完仗，怎樣回到學校去念書，怎樣

完成他們的理想，怎樣享受家庭幸福的一類問題。一個女同學對另一個女同學說：

「打完仗你到我們家裡去住，我母親最喜歡我的朋友！」

一個人對另一個弄髒了行李而覺得不愉快的人說：

「怕什麼，等打完仗誰還希罕這些舊東西！」

在凍得發抖的時候，他們還有興緻高唱：「沒有一個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一類的蘇聯之歌。

那天晚上，爲了等候來接他們去宿營地的卡車，我一直陪他們到天亮，我有如在夢境一樣，聽他們的談話。我絕沒有爲了我已懂得「革命實際」而驕傲，我却爲他們的即將踏進「革命實際」而悲，而惋惜。因爲他們還不懂得，他們所憧憬即將結束的戰爭，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結束的戰爭，而他們所期望爲時甚暫的「革命」，更是一個無盡無休而欲罷不能的「革命」，自他們被拉進訓練班的大門的那一天起，他們已失去了任何脫離「革命」的自由了。

一個囘倦的旅人

我的能夠出走，與其說是我的決心，不如說是一個難得的機緣，因爲企圖逃出鐵幕而有隨時出走決心的人，我深信那將是一個有份量的數字。不過，假如沒有一個一如我所獲得的機緣，任何決心都只能招致自我犧牲的後果。

毫無疑義地，一年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以及我臨事的機警，更幫助我順利地逃出了極權控制區。開罪「協理員」以後，支部不斷地在調查我的「反動履歷」，我曾在一家被稱爲「反動」報社「幫過兇」的事情被知道以後，更不斷地找我去談話，藉以瞭解我的「思想情況」，當時我曾强調工作忙而加以拒絕，我明知這種拒絕，對我只能有更惡的影響，但是，此時我已決心做一次生命的冒險了。

我久已待期的一位在香港的朋友，寫了囘信給我，告訴我他境遇頗佳的情形，以及盼我去港的願望。當然他還不知到，我是一個已經革了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類的事情，而我的通訊處是由一個朋友家裡轉的。

我已竊取了爲另一個秘書「同志」所保管的兩張「軍用護照」，護照上印章號碼俱全的，只待我添上一個姓名和去處就可生效。這是「第四野戰軍」最上層機構人員所使用的護照，在中國大陸範圍之內，是通行無阻的。在「游擊習氣」還普遍存在的時候，這一紙護照，對於一個奉命出差的人，它是代替了任何身份證和差假證的唯一證件，對於一個未奉命出差而未被覺察的人，也有着同樣的作用。竊取護照以後的兩週，我還不能成行，內心裡空前地有坐臥不安，緊張而又恐懼的感覺，我也第一次體會到做一個「壞

人」的滋味。幸好那個工農出身的秘書「同志」，對於失竊護照的事，一時還沒有發覺。

秘書科的領導幹部，爲了選製一百萬枚「中南區解放紀念章」和十五萬枚「解放海南紀念章」（時距海南易手前兩個月），而專程去上海』我們留下的三個人，在工作上都鬆弛了一些，那兩個老幹部秘書也常藉故找他們的「愛人」去團聚，我自已也感到自由自在得多。當然，我更想到，要出走，此其時也。

走之前，曾做了幾件準備工作，首先我模彷經常添寫護照的那個人的筆法，添寫了護照。爲了途中的某種方便我添了一個「小鬼」（勤務兵）的名子與一個莫須有的名子的我同行，雖然我的心情異常地緊張，但第一張護照竟毫無漏洞地添好了。餘下的一張空白護照，幫忙我做了更多一層的掩護，我用自已的原名在那張護照上添寫去北平的字樣，在我臨行的前一天，並買了一張去北平的車票，軍人購買車票要經過詳密地登記，並發給一張用以報銷的收據。臨行的前一刹，我把這張收據安放在我的抽屜裡。因爲對於許多「開小差」的人，老幹部都慣於相信他們的直覺，都是首先到來自的地方去追捕。無疑地，我那車票的收據更會增强他們的自信，假如他們眞是去北平搜索的話，我也許很幸運地到達海外了。

在這階段中，我天天跑去我們所接管的電影院裡，去看香港出版的文滙報與大公報，我特別留心深圳羅湖間的交通，並同那個熟悉港穗情形「搞生產」的幹部，聽探更多的沿路的實際情形，當然我自已會更小心地，避免暴露出我的企圖。

那時，我已分得獨自一個人居住的臥室，我深信鎖起門來，出去一兩天，很難被人覺察的，因爲那正是我一個人包辦對外工作而極其忙碌的階段。

終於我選擇一個星期五的晚上，託那與我有一碗麵之緣的支部女「同志」，代向小組長請假，我告訴

她，第二天早上我將爲了一件重要而緊急的工作，必須很早就出去一次，早上六點鐘到八點鐘例行的學習會，我不可能參加了。我所選擇的時間，曾經過極其週密的考慮，因爲除了那個已請假的學習會以外，星期六星期日兩天三夜的時間，將很少會發生必須向我接洽的事情，同時我估計也很難會舉行必須有我參與的會議。我認爲「組織」發現我的出走，最可能的時間將在星期一的早上，不過，假如果眞這兩天三夜的時間，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我該平安地到達廣州了。

我原有的一點積蓄和在朋友地方挪借的一點錢，已足敷我旅途所需。就這樣，我拍拍一身塵土，於一個星期五的晚上跳上了更南下的粵漢火車，我原有緊張恐懼的情緒雖更加深了，但我畢竟有一份按捺不住的興奮，因爲假如順利地衝過這一關，我將恢復了被抑壓年餘的自由生活。

我雖身着「戎裝」，但原意打算混在普通旅客最多的列車中，至少可以避免遇見我所相熟的部隊中人，一年多的時間，我在高高在上的所謂大機關裡工作，「四野」範圍內，我自己估計，認識我的人將不會少過兩千人。途中相值，雖不一定會發覺我的意圖，但盡量避免確是太必要了。殊不料我的打算竟行不通，列車中的軍人被指定集中在一節車廂裡。我遲疑了一會兒，終於壯壯膽子又跳上了那節軍車。

在車廂中，我的心弦緊張極了，我將身穿的美軍「巴基」大衣的衣領，遮住了半個面孔，戴上一付看來有如近似的平光眼鏡，縱然這樣，我還是不敢正視列車中的幾十個「同志」。我選擇一個燈光照不到的角落，低頭坐在那裡，像一個長途跋涉的睏倦的旅人。也許有人在笑我緊張失常的神情，不過，與其說我是緊張過度，勿寧說是爲了更愼重的原因，火車未開行以前，不守秩序的軍人，忽上忽下的情形太多了，有的送行，有的談事情，有的幫忙提携東西，我有太多的可能，遇見相識的人，或是單面認識我的人，何況這是在「四野直屬隊」人員往來最多的武昌東站，我的謹愼確有充足理由的。

同路人與「小鬼」

火車開行了，我才恢復了常態，站起來打量一下所有的乘客「同志」，這時，假如遇到一個有重要關係而無法擺脫的幹部，我已有隨時跳車的準備。幸好全車之中，只發現兩個不相干的熟人，我最初也難免吃了一驚，但立刻就鎮定下來，這兩個人是一個駐軍的師部裡做放映電影工作的技術幹事，他們雖然認識我，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同時這兩個有如工人的技術員，我直覺地覺得他們不可能是做特務工作的人。他們告訴我將在岳陽下車，我告訴他們我將去長沙公幹。後來，他們果然在岳陽下車，以後證明他們確是不相干的人。

第一個晝夜，我一直在極端緊張中，列車經過每一個小站，上來的人和下去的人，以及站上的小小騷動，我都非常仔細地注意，直到我更緊張地應付過第一次的檢查「同志」和檢票員，才稍較鎮定一些。車過衡陽以後，我不但每站都落車去看看和自由地在車上走動，更交結了兩個「解放軍」的朋友，藉以排遣我的恐懼和緊張的情緒。兩個東北「參軍」四年的幹部，他們是「四野特種兵」部隊派赴廣州，做「解放海南」的準備工作的。應付歷史很短的東北「參軍」的幹部，我有足夠的經驗。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接觸過太多十年到十五年的老幹部，我有相當豐富的老幹部的知識，我也能非常熟練地運用老幹部習用的語言。對這兩個年青的同路人，我是以十年以上的老幹部姿態出現的，當然我所穿着的而與「連排幹部」不同的衣服，以及我久未修整的鬍鬚，更容易使他們深信不疑的。不過，爲了怕他們對我單身出門感到奇怪，我特意提起我的「小鬼」，因爲出站去買東西，而被掉在長沙。

我同他們談了一些比他們更爲豐富的「四野」現階段的事情，我盡量避免牽涉到「四野」在東北的情形，並告訴他們，我是一年前由華東調來「四野」的，後來我的談話常常是以「當我在華東的時候」開始的。

在整個旅程中，我講了一些華東（三野的前身）的故事，來滿足他們的好奇。這些故事是我聽自確由華東調「四野」的老幹部的口中，只不過，此刻我是以親身經驗的口吻來向他們轉播的。

我告訴他們：我怎樣在上海念大學，怎樣由蘇北去「解放區」工作，怎樣在艱苦的游擊生活中辦油印報，怎樣看到許多知識份子，被迫而做趕死隊。

講到最後一個問題時，我特別注意一下他們的神情，他們確像非常渴望知道似的，有如喜歡聽故事的兩個小孩子。

「那時候黨的路線還不一致！」我首由感歎開始，並繼續講下去：

「誰都覺得知識份子是沒有用的東西，肩不能擔，手不能提，不能種田，不能打仗。一有情況（指遭遇「敵人」），他們又變成組織上最大的累贅。但是這些被認爲沒有用的東西，只是會海濶天空地誇誇其談。講道理，連政委都講不過他們，做起事來便遠不如一個大老粗。那時候，每個縱隊的司令員和戰士，看到知識份子就冒火。」

他們掏出一支烟來給我，燃着以後我繼續地講：

「後來把知識份子集中編了一個隊，當時的司令員對他們說：你們光會說不行，誰能參加實際戰鬪，誰才算有本事。這些血氣方剛的知識青年，聽了當然不服氣，紛紛表示願意參加實際戰鬪。就這樣，他們被送上火線，可是這些未經訓練的人，怎麼能夠打仗呢？後來，在實際戰鬪中，他們能夠生還的，簡直是沒

有幾個人！」

我停頓了一會兒，並搖頭歎惜，他們也在搖頭歎惜。我又加重語氣地說：

「不過，這只是一個開始，當時那些帶兵的司令員，對知識份子的死在戰場，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說是活該。因爲這些難得生還的知識青年，更證實了他們被認爲是最沒有用的東西的大道理。這些事情不但相繼地發生，並普遍到各個縱隊去，當時誰都覺得少幾個知識份子，部隊裡就多幾分寧靜」。

講述的開始，我確有些故意做作和賣弄玄虛的心理，但是看到他們兩個人屏止呼息表示無限憤慨的樣子，後來我竟眞的有些激動起來，一如我初聽這個眞實的故事時一樣。不過，我怕這種「反革命」的宣傳，會影響到我眞正的身份，最終我還是冷靜地做了結束：

「這種嚴重的錯誤，一直到延安有了正確的指示才糾正過來一些。可是，這種風氣一直到今天，並沒澈底地糾正，老幹部對知識份子的歧視，還是繼續地存在，不過，比起那時候當然好得多了，同時，我相信終會好起來了！」

我說「好起來的」的意思，是想到另外一個大問題，當然，他們是無從瞭解的。

東北來的幹部，因爲知識水準較低，和所受特殊教育的影響，他們內心雖對老幹部有一種無可如何地怨恨，但表面上，則頗能做到必恭必敬的樣子。對於我，那兩個東北幹部也毫不例外，在車中的幾天，他們爲我買洗臉水，買烟跑腿，讓出比較寬的地方給我睡覺，彷彿代替了我的一個莫須有的「小鬼」。

我的心情，雖然一直在緊張之中，不過，有他們在一起，我確要感到坦然一些。到韶關以後，我們之中，又增加了一個喜歡喝酒的幹管理工作的老幹部，我更覺得輕鬆了許多。

第一次見到陽光

車過韶關，正是星期一的早晨，我掐指算來，已是兩整天三整夜了，心中再度地緊張起來。我十分擔心由於行車時間估計的錯誤會影響到我的安全，同時我更連想到，發現我失蹤以後，那原在的機關裡不知將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就該在這一天的早上，一個失蹤的消息將傳遍了幾千人，但這個失蹤馬上會被發覺絕不是由於被動的意外，而是有計劃的主動，因爲那張安放在抽屜裡的車票收據，必會很快地被檢出。這不是一個承平的年月，一個人的失蹤，會被視同一個人離開了世界一樣。極權統治者對這個失蹤的人一定不會寬恕，一定會有人重新找出失蹤人的自傳來研究，一定會有人檢查除了身穿衣服而未携走一物的失蹤人的行李，最奇怪的是將猜不透這個失蹤人失蹤的原因，假如不是一「反革命的國特」的話，實在找不到其他的答案。不過，不管「國特」也好，「非國特」也好，必定像找回失物一樣地找回這個人，爲了照顧這個人所遺留下的「不好影響」。就該在這一天的早上，一定會有人像擔任了一個機密而緊要的任務，匆匆地踏上北去的列車。可是，假如這個失蹤的消息，早一天或是早幾十小時被發覺；假如失蹤者的計劃被看穿，同時有人被派到上海，派到廣州去追尋；假如廣州方面早已收到了一份機密的電報，早已派人在車站等候，這個失蹤的人，將怎麼辦呢？這樣想時，我不僅是緊張，更有一份足以使內心顫抖的恐怖，因爲以往因開小差出走所發生的事情，留給我太深刻太恐怖的記憶。

我又有隨時跳車的準備了，我雖在盡量掩飾不安的情緒，但已被三個同路人發現了，幸好他們不是身負特務工作的人，其中的一個，還以爲我是爲了那個莫須有的掉車的「小鬼」而焦急，我也正好把一肚子

10156-764

的焦急與不安，歸罪到那個「小鬼」身上去，我開始抱怨那個「小鬼」帶走了我的公事皮包，我開始大聲罵那個「小鬼」的糊塗，這時我的膽子又壯了起來。看到那個在車上還不斷在喝酒的管理幹部，我彷彿多了一層保護。他一如過去我所見到的日本「皇軍」醉後的情形，一手拿着酒瓶子，一手拿着一片滷魷魚，嘴裡東說一句西說一句。他是天津附近的人，屬於「冀南邊區」的老幹部，他搞過「生產」，據他自己說「搞生產」的時候，很剩了一些錢，他並出示那個兩錢以上的金戒子給我看。我同他保持一種非常親切非常關懷的關係，因爲當我想到幾個可怕的問題時，我已把一個新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抵廣州之前，我們又遭到一次檢查，我對檢查人員故意在抱怨我的「小鬼」，檢查人員看過我的護照，沒有說什麼。只是指着那個被認爲作風不好半醉狀態的老幹部，囑我批評批評他，這時我更比較鎮定了。

在火車只能定期開行，不能定期抵達的時候，我非常滿意車抵廣州的時間，那是午夜後的兩點鐘，廣州當時每晚八點鐘就戒嚴，站外已不能通行，我非常留心地走出車站以後，很有理由地拖住那三個同路人去住一晚小客棧，我唯恐他們對錢有所顧忌，我特別說明，我的出差費比較寬裕，旅店的費用由我負擔，因爲我可以回去報銷。

以那個醉酒的老幹部的名字開了一間房間，我們四個人一起住下來。當晚經過一次「查房」，來檢查的五個人雖是氣勢兇兇，但對我們「解放軍同志」來說，實在是不足道，因爲那只是幾個指槍的老百姓，充其量不過是「土共」或「人民自衛隊」之類，「解放軍」對他們的蔑視一如他們對「解放軍」的敬畏一樣。

第二天早上，兩個「特種兵」的幹部走了，我挽留那個喜歡喝酒的老幹部多住一晚，他也頗爲樂意。

中華民國玖拾年 贈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00284905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133739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002849055

